

● 穆青 著

十个共产党员

新华出版社

● 穆青 著

十个共产党员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个共产党员 / 穆青著. -- 2版. --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21.1

ISBN 978-7-5166-5664-8

I. ①十… II. ①穆… III. ①中国共产党—模范共产党员—先进事迹
IV. ①D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32344号

十个共产党员

作 者：穆 青

特约编辑：侯书明

封面设计：侯书明

责任编辑：徐 光 刘宏森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经 销：新华书店、新华出版社天猫旗舰店、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六合方圆

印 刷：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mm×240mm

字 数：150千字

印 张：16.75

彩 插：4

版 次：2021年3月第二版

印 次：2021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5664-8

定 价：58.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24



穆青雕像

序

今年春节前四天，我在新华社参加一个首都新闻界的春节茶话会。将要散会时，一位新华社的同志走到我身边，小声对我说：“‘老头儿’请你上去，他等着。”

“老头儿”，是新华社上上下下对老社长穆青同志的尊称和爱称。他找我会有什么事呢？我蓦然想起，十多天前冯健同志在电话里告诉我，这几年，“老头儿”一直在为自己几十年来采访过的共产党员典型写追踪性的文章，将要汇集成书，名为《十个共产党员》，在今年“七一”以前出版。“老头儿”很希望我为这本书写个序。我当时真有点不知深浅，竟爽快地答应了下来。等到看了书稿，读了那一篇篇笔力千钧的历史性篇章，我就后悔自己的轻率了：对于这样的作品，一切评价都是多余的；更何况在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新闻界老前辈面前，我还是个“后生”，又何能赘一辞？不过，后悔已经迟了，我深知穆青同志为



人、办事向来认真，自己不轻然诺，也不喜欢轻然诺的人，这回找我，多半与此事有关。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穆青同志那间简朴的办公室。

“老头儿”穿着那件常穿的灰布夹克，神情肃穆地坐在圈椅里，没有像往日那样起身握手，只是示意我在他对面坐下。显然，他想和我谈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

“冯健告诉我，你答应了，我实在高兴。”穆青同志点起一支香烟，用他特有的质朴语言作开场白：“今天请你来，是想说说我为什么想起要出这本书。”

我说：“这正是我最想知道、也最需要知道的。”

穆青同志说：“我写的这十名共产党员，你可能都熟悉：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有铁人王进喜，有工人的旗帜赵占魁，有至死不忘周总理嘱托的农民科学家吴吉昌，有植树老人潘从正，有红旗渠的除险英雄任羊成……”

“这十个人当中，除了焦裕禄、郑永和是县级的领导干部，其他几位都是最普通的共产党员。在他们身上，既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有共产党人的高尚境界，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他们的精神，集中到一点，就是无私奉献。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什么样的人，在他们身上几乎都可以找到答案。他们是中国真正脊梁。”

说到这里，穆青同志的声音微微颤抖了：“这本书虽然只写了十名普通共产党员，是沧海一粟，但是它反映的

是整整一个时代，整整一代人。有了这样的人，我们的国家才有今天的辉煌成就和胜利；有了这样的人，才改变了我们国家的历史进程。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这种精神、品德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几十年来，他们一直活在我的心里，有些人是我在心里酝酿了多少年才动笔写的，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写他们的……”

穆青同志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屋里静极了，几缕夕阳照射在他办公桌上，走廊里隐约传来下班的人们的欢快脚步声。我不敢正视他的眼睛，为了掩饰内心的激动，使劲地记录他几乎一字一顿的政论式的语言：

“现在，有些人已经逐渐把他们淡忘了，甚至怀疑世界上是否真有那样无私奉献的人，怀疑共产党员是否真能做到那样公而忘私。我之所以把这十名共产党员事迹集中成册，就是想让大家看看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什么样子；就是想重现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就是想说明这些几十年前的典型人物的现代意义；就是想借他们的榜样力量来鼓舞今天正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人们的信心……”

“作为一名党培养起来的老记者，我深感由于长期处在领导岗位，这一生写得太少，愧对伟大的时代，愧对伟大的人民。现在，唯一的愿望是把这本书作为党的75岁生日的献礼，也可以说，这是我对党的最后的汇报。——我，就是这样的心情。”



说到这里，穆青同志已经语音哽咽了。我悄悄拭掉夺眶而出的眼泪，轻声对他说：“穆青同志，我完全能理解您的心情。同时，我又非常羡慕您。您是一位幸福的新闻工作者。第一，您有幸亲身经历了跨度达50年的伟大历史性变革，亲眼见到那么多的英雄人物；第二，您有幸写出了那么多震撼人心的作品，至少有两代人受到您作品中英雄模范人物的感染和熏陶；第三，您有幸受到那么多您报道过的主人公们的深情厚爱，比如植棉劳模吴吉昌，把您当作世界上最亲的亲人。这种幸福不是所有新闻工作者都能享受得到的……”

“我记得您说过一句话：‘我深感岁月的更替，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没有多大的意义，关键还在于他是否有一颗为人民奉献的丹心。’您感受到了这种境界，是您的幸福，现在我也在分享这种幸福。”

穆青同志微微地笑了，深情地说：“是啊，老百姓实在太可爱了，劳动人民实在太可爱了。”接着他就兴奋地给我讲起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吴吉昌在病危之际嘱咐老伴：

“我要走了，别的什么也不用带，只要把老穆送我的两本挂历带着”；“老坚决”潘从正，为了让“老穆”看看自己的劳动成果，垂暮之年千里迢迢给他挑来两棵手栽的樱桃树；“除险英雄”任羊成，从广播里听说北京降温，特地从河南林县打来长途电话，嘱咐“老穆”要多穿衣服，

小心别着凉……

讲到这些，“老穆”感慨万端：“我们这代人好在尝到了老百姓保护我们、爱护我们的滋味，所以一辈子也忘不了，总怕自己做得不好，对不起他们；总是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忘了老百姓，要处处想到他们。只要永远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心里就踏实，就有抵制各种错误东西的力量。”

临别时，“老穆”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我相信你会写好的，因为我知道你也是一个有感情的人。”

从穆青同志那里回来以后，我一直寝食不安。他的一席谈，不仅是一堂内涵丰富的新闻课，而且是一堂深刻的人生课、党课。要为这样一本用共产党人血管里流出来的“血”写成的书作序，我越发感到难度太大。“两会”期间，我原以为能够利用会议提供的安静居住条件，从容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的，但事实上根本不行。每天晚上，我一翻开这摞书稿，书中人物气壮山河的事迹，作者感人肺腑的自白，使我完全无法平静下来，经常是彻夜难眠，十多天过去了，竟然一字无成。正如一位古代画家说的：“开图别有沧桑感，只觉含毫咏不成。”最后，还是一位青年记者启发了我，他听了我的叙述，惊喜地说：

“你把穆青同志那番话如实地写出来，不就是最好的序言吗？他的话，就是他的人；读了他的话，也就使人懂



得应该怎样做人，怎样做记者了。这不比绞尽脑汁去分析、评价作品要好得多吗？”

我豁然开朗，照着他的话去做，果然觉得轻松不少。在“清明”后一日的深夜里，凭着难以忘却的记忆，凭着对“老穆”这笔宝贵精神财富的理解，一字一字地写下去，竟不知东方之既白。

花敬宜

1996年4月5日凌晨

目 录

CONTENTS

- 1 序 / 范敬宜
- 3 泪洒偏关
- 19 工人的旗帜赵占魁
- 43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 75 再访兰考
- 86 人民呼唤焦裕禄
- 103 铁人王进喜
- 129 为了周总理的嘱托



- 147 涑水情
- 165 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
- 177 心上的树
- 191 潘从正墓碑
- 195 难忘那双手
- 207 两张闪光的照片
- 223 改革大潮中的老支书
- 239 情系人民



梁 雷

“七七”抗战爆发后，梁雷被任命为牺盟总会雁门战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兼雁北 13 县的游击司令……

他说：“在敌后开展工作，首先要多和穷苦农民交朋友，要向他们指明亡国奴不如丧家犬。”

一次战斗中，梁雷满身重伤倒地不起。残暴的日本鬼子，立即一顿刺刀把他活活刺死，而后再毫无人性地用马刀砍下梁雷的头颅，带回偏关，血淋淋地悬挂在南关的城门上……

他牺牲时年仅 25 岁！

泪洒偏关

(一)

对山西这片黄土地，我有着一种特殊的眷恋之情。

50多年前，我曾在这里第一次穿上八路军的军装，并在贫瘠的晋西北，与日寇血战了整整三个春秋。我的一些同学和老师，许多人都牺牲在这块土地上。特别是最敬爱的老师梁雷，在抗日战场上壮烈牺牲后，残暴的日寇竟将他的头颅砍下来，悬挂在偏关的城门上。每当我回想过去的往事，或看到一些描述师生情谊的文章，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恩师。越是上了年纪，这种感情就愈加撼动着。多少年来，我不止一次地想去偏关祭扫梁老师的坟墓，但始终没有机会如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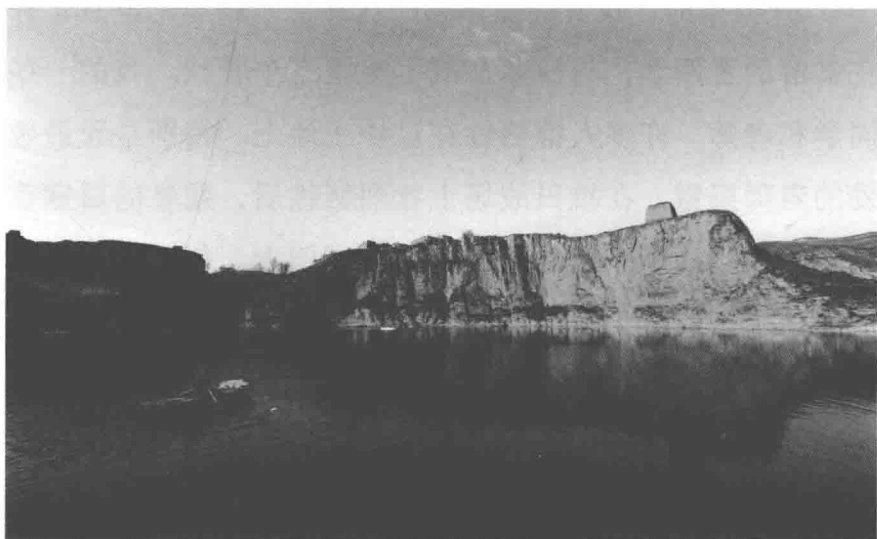
今年年初，我从第一线岗位上退了下来，稍事安顿，六月间便踏上了重访晋西北的路程。一路上经忻州、代县、宁武，冒着黄尘、酷暑，长途跋涉，终于在7月1日黄昏之前，



赶到了偏关县城。

山西的偏关，与雁门关、宁武关并称神州三关。黄河在其西侧的峡谷中蜿蜒而过，隔河相望，便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准格尔旗。县城周围群山环抱，峰峦叠嶂，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千百年来围绕着一关三关险塞，曾洒下多少英雄的血泪，记载过多少惊天动地的史诗。

我无意去欣赏黄河峡谷中的落日余晖，也无心去浏览这边关小城的新姿。一种难以抑制的感情，驱使我茫然寻觅那些遗留至今的老墙旧舍，古树残枝。我似乎觉得它们还该记得梁老师的音容笑貌，还该记得抗日战争的连天烽



2011年5月16日，一名村民在老牛湾黄河中收起渔网。

黄河老牛湾位于山西省和内蒙古交界处，以黄河为界，南依山西的偏关县，北岸是内蒙古的清水河县，西邻鄂尔多斯高原的准格尔旗。（新华社记者任军川摄）

火和当年笼罩着这座山城的血雨腥风。

时光如九曲东去的滔滔黄河之水，恍然间离梁老师牺牲的日子已经 55 年了。我也由一个年幼的中学生变成了满头霜雪的老人。历史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跨度里，有多少风雨，多少悲欢，多少翻天覆地的变化啊！如果梁老师还活在人间，我们师生能在此重逢，那将是多么令人激动的情景啊！千言万语又怎能道尽那绵绵的离情，深深的思念。

那天晚上，我约请几位熟悉偏关抗战史的同志座谈，他们向我讲述了梁雷老师当年在偏关领导抗日直到牺牲的情景。许多过去未知的事实，更增加了我对梁老师的怀念。谈到激动处我再也忍不住满眶热泪了。随行的同志们怕我太疲劳，太伤感，再三劝我早点休息，可他们哪里知道，我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已熬过了整整 55 年。

夜很深了，窗外群星闪烁，偏关小城万籁俱寂，我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梁老师的音容笑貌一直在眼前晃动，耳边老听到他那激昂慷慨的声音。一股股难以压抑的热流涌上心头，往事如潮，不停地在我脑际翻滚……

（二）

梁雷老师原名梁德谦，字雨田。出生在河南邓县梁家



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自幼丧父，是由母亲一手拉扯长大。家贫和母教，使这位穷人家的孩子自幼就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不但聪颖好学，而且刻苦勤奋。当时军阀混战，社会极端黑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农民苦不堪言。梁雷在黑暗中苦苦探求一条能救国救民的光明之路，17岁便秘密地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他刚满18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3年，梁雷由地下党组织的介绍，来到我的家乡河南杞县，在我就读的大同中学教书。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梁老师矮矮胖胖的身材，浓眉大眼，有些少白头。平常老穿着一件破旧的长衫，衣着很随便，没有丝毫老师的架子。他教我们语文和史地，讲课极富吸引力，每讲到激动时便辅之以各种手势，讲到悲愤时，又几乎声泪俱下。他博学多才，讲课总喜欢古今中外，旁征博引，课文外的内容，要比课文本身丰富精彩得多。常常是下课的钟声打响了，同学们还都不愿梁老师走。课余时间，同学们把梁老师的小屋挤得满满的，总爱和他无拘无束地交谈。听他讲国际国内形势，讲抗日救国的责任，讲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梁老师是共产党员，但感到他所讲的都是真理，都是站在时代的前沿振聋发聩的声音。我们这些穷乡僻野的孩子，都是从梁老师那儿得到启蒙，开始树立革命理想的。

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残酷镇压一切抗日救亡运动，到处迫害进步民主人士，政治上的低气压简直令人难以忍受。唯有我们杞县大同中学，在梁雷等进步教师的领导下，各种抗日救亡运动能够蓬勃开展。同学们读进步书刊、唱革命歌曲，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成为莽莽中原少有的一块净土。正因为如此，学校不断受到国民党反动特务组织的监视和迫害。特别是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形势更加紧张。我们两位进步教师，先后被国民党秘密逮捕，眼看着梁雷老师处境更加凶险，才最后不得不被迫离开学校。我还记得当梁老师含着热泪向我们告别的时候，同学们紧紧围住梁老师，一片哭泣之声……其情景之动人，我至今难忘。

以后，抗日战争爆发，学校被迫停办，一批进步师生奔赴延安。我的下一年级的同学，在杞县沦陷后，几乎全部参加了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四师。许多同学都血洒疆场，牺牲在抗日前线。

1937年初夏，我在开封参加初中毕业会考，在姚雪垠老师处意外地见到了梁雷老师。那时，他正夜以继日地为抗日救亡运动奔忙。他热情地对我说：“我曾在报上看到了你写的《迎一九三七年》的文章，写得很好，你说得对：‘1937年没有芬芳，没有花香，等待我们的将是弥漫全国的抗日烽火，将是决定民族生死存亡残



酷的斗争！’”他说，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到了亡国亡族的危险关头，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每一个热血青年都要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他问我：“你打算干什么啊？”我说：“家里的意思还是想让我考高中。”他说：“能考上学念书固然很好，但你的家庭清贫，供得起你在开封上学吗？从现在的局势看，战争一起，这里恐怕也很难容得下一张书桌了。我马上就要到山西去了，如果你上不了学，可以到山西去找我，也可以直接投奔延安……”

就这样，梁老师和我匆匆分手了，万万没有想到，此次一别，竟成了我们师生间的生死永诀……

（三）

1937 年底，我和四个同学按梁老师指引的道路，到山西临汾参加了八路军学兵队。经过几个月的集训，分配到山西岚县的一二〇师政治部宣传队工作。当时，我曾多方打听梁雷老师的音信，得到的仅是他在雁北一带领导游击队同日寇作战，其他就再没有更详细的消息了。

直到 1938 年的夏天，才有同志突然对我说：“听说梁雷同志已在偏关牺牲了！”当时我无论如何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怎奈接二连三的信息都说明这不幸的消息确是事实：

梁老师不仅确已牺牲，而且死得英勇，死得壮烈。岚县距离偏关不算很远，我多想插翅飞往那里看个究竟啊，但那时偏关已经沦陷敌手，在战争环境下又怎能离开部队单独行动呢？无尽的悲痛只好深埋在心底。也就是从那时起，偏关这两个字就像长在我心中的一根芒刺，什么时候一想到它，就感到隐隐作痛。

如今，我终于来到了偏关，对梁老师牺牲前后的情景，才有了比较真实详细的了解。

“七七”抗战爆发后，梁雷受党的委派到山西参加了牺盟会，被任命为牺盟总会雁门战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兼雁北 13 县的游击司令。1937 年 9 月 13 日，梁雷和他的战友率领 30 多人从太原赶赴雁北。他们一路走，一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日。当时晋西北一片荒凉，一片混乱。国民党、阎锡山的军队和地方官员，在日寇未到之前，即纷纷弃城逃跑，一些汉奸、土匪和散兵游勇便乘机祸害人民。梁雷一方面积极组织游击队，一方面还要铲除镇压这些败类，保护群众的利益。

有一次他们来到距敌人较近的平鲁县城，旧政府已经解体，县长携款潜逃。城内风声鹤唳，人心惶惶。梁雷率队到来，给群众极大的鼓舞。人们奔走相告：“八路军抗日来了！”纷纷到城外欢迎。有几个老人见到梁雷就跪地不起，流着眼泪说：“你们是来救我们来了！”



晋西北及雁北地区，素来地广人稀，生活极其贫苦，再加上气候严寒，兵荒马乱，使梁雷他们的生活十分艰苦。有时候，他们路过一些村庄，十室九空，连一只狗也看不见。吃不上饭，睡不好觉更是经常现象。但梁雷始终保持朝气蓬勃的乐观情绪，整天穿一身农民的衣服，乐呵呵地鼓舞大家抗战的信心。

9月下旬，日军开始向雁北逼近。梁雷便把雁北13县的抗日中心建在偏关县城。国民党的偏关县县长逃跑了，他便成为偏关第一任共产党员县长。为了迅速地发展抗日武装，他派遣大批抗日救亡工作队，化装成农民到雁北敌后农村去组织抗日游击队。临行前，梁雷总是一遍遍地叮嘱大家：“在敌后开展工作，首先要注意联系群众，多和穷苦农民交朋友，要向他们指明亡国奴不如丧家犬，不抗日没有活路。”

短短几个月，雁北13县就建立起13支抗日游击队，人数多的200多人，少的也有百余人。在群众支持和掩护下，他们勇敢地抗击了日伪军的进犯，并到处伺机袭击敌人。血与火的战争考验，使这些人民的武装逐步成长壮大起来。不久，就传来了朔县游击队连打胜仗的捷报，传来了右玉、平鲁两县游击队相继收复右玉和平鲁县城的喜讯。从此，晋西北抗日局面一下子打开了，抗日的烽火熊熊燃遍了雁北13县。

梁雷所在的偏关县，抗日活动开展得更更是如火如荼。抗

战歌声响入云霄，送夫送子参加游击队的络绎不绝。新组建的近千人的游击大队群情激奋，斗志昂扬。偏关县在梁雷的领导下，不仅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和党的组织，而且还建立了战地动员委员会、农民救国会以及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组织。同时还创办一份报纸，报名“怒吼”两个字也是梁雷亲自题写的。这期间，梁老师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抗日斗争中。他在一封给姚雪垠老师的信中豪迈地写道：“我正在这里导演一幕戏，背景是荒山加荒山，伴奏是枪声加炮声，演员是雁门关外 13 县的游击队员，演的是抗日健儿反击日伪军的武打戏。观众是四万万五千万不愿做奴隶的中华儿女！它比历史上杨家将镇守边关抗击番邦更加热闹壮烈，更有意义。”又说：“天气越过越冷，但我的血一天比一天热了。”在另一封信里他欣喜地讲道：“由于在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人民自卫队增多，我们已二次收复了平鲁、收复了右玉，保卫了偏关。在雁北各县展开了大规模的游击战，一直伸展到绥远的清水河及杀虎口外……”

1938 年 2 月 25 日，日伪军 2000 余人进犯偏关。梁雷率各路游击队配合八路军一二〇师警备六团开展游击战，重创了日伪军，打退了敌人的进犯。三天以后，恼羞成怒的日寇又调集坂垣师团一部，分两路大军压境侵占了偏关县城。梁雷和县委、县政府的干部一方面组织群众疏散转移，坚壁清野；一方面把游击队主力拉到偏关南山，坚持敌后



游击战争。

这一年的3月18日，该是偏关历史、山西人民抗战史上值得记载的日子。这天凌晨，由于叛徒的出卖，日寇派精锐部队突袭梁雷所部的驻地柏家嘴村。当时游击队主力均被梁雷调遣在外，村里只有偏关县直机关干部和少数警卫战士。战斗来得那么突然，很多干部战士还在睡梦中。枪响以后，梁雷迅速冲出屋门，指挥战士抵抗已经进村的鬼子。在生死存亡千钧一发之际，他一面指挥机关干部和群众突围，一面带领少数战士边打边退，断后掩护。经过半个小时的激战，绝大多数干部战士都安全冲出鬼子的包围，顺着山沟转移了，而最后一个离开村庄的梁雷，因穿件黑色大衣目标显著，却被敌人密集的子弹击中，倒在村外。鬼子立即喊叫着围了上来。由叛徒汉奸指认，鬼子才知道这个满身是血，双目圆睁，紧握着打空了匣子枪的年轻人，就是他们闻名丧胆的八路军偏关县县长，威震雁北的抗日游击司令。当时梁雷尚未牺牲，只是满身重伤倒地不起。残暴的日本鬼子，立即一顿刺刀把他活活刺死，而后又毫无人性地用马刀砍下梁雷的头颅，带回偏关，血淋淋地悬挂在南关的城门上……

群众进出城门，无不低头掩泣……

梁雷牺牲以后，雁北13县的人民群众悲愤万分，纷纷参军参战，誓为梁雷司令报仇雪恨。连当时担任二战区司

令长官的阎锡山也公开发电国民政府行政院，表扬梁雷县长英勇作战，壮烈殉国。偏关的群众和游击队战士几次想把梁雷的头颅抢回来，后被敌人发觉又急忙把它转移到清水河县，挂在那里的城头上。以后几经争夺就不知下落了。

当地群众只得含着热泪把梁雷无头的遗体安葬在柏家嘴村外的高地上，直到解放后才迁往县城。

梁老师是1913年农历正月初二日生，牺牲时年仅25岁。

(四)

第二天一早，我们带着花圈前往城外的烈士陵园。梁雷老师的墓地就建在陵园中。陵园规模不大，迎面立着一座长剑状的纪念碑，上面写着：“为人民而死重如泰山。”在人们的指引下，我找到了梁老师的墓冢。墓很小，用水泥砌成，周围已长满了蒿草。一块一米高的灰黑色石碑立在墓前，上面刻着“梁雷烈士之墓”六个大字。既没有年月日，也没有死者生平的任何记载。墓前种了一棵松树，刚刚长有一人多高，看上去也不过才栽种几年。一种冷落荒凉的感受使人心碎。

我恭恭敬敬在梁老师墓前献上了花圈，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心中刚默默说了一句：“梁老师，您的学生来得太晚了！”一阵心酸，眼泪就再也控制不住了。有那么多年轻人在场，



1993年6月，穆青在恩师梁雷烈士的墓前泣不成声。

我实在不愿意失态，但多年沉积在心底的夙愿、悲痛和内疚，在梁老师面前，怎能不让它尽情地宣泄呢？压抑的呜咽，终于变成了失声的哭泣，泪珠像雨点般地洒落在墓前……

我悲痛梁老师死得太早，抗战初期，他正值英年，真可谓“壮志未酬身先死……”一个正在茁壮生长的栋梁之

材，过早地摧折了。如果梁老师能活到今天，该能为党和国家作出多大的贡献啊！

我悲痛梁老师死得英勇，死得壮烈，但也死得太惨了。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人民的苦难，他把一腔热血洒进雁北贫瘠的土地，不惜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甚至宝贵的头颅。我不敢想象，如今，埋在这墓穴中的仍然是一具无头的骸骨。

我悲痛在那风雨如磐的黑暗岁月，是梁老师把革命的火种播进我们的心田。他是我们的启蒙老师，又是我们的引路人。没有他的教诲，我们这些幼稚的孩子是不可能走

上革命征途的。如今 55 年过去了，大同中学的几百名同学，或牺牲于革命战火，或耕耘于祖国各地，他们没有辜负梁老师的期望，梁老师如果泉下有知，也该感到慰藉了。

我悲痛梁老师远离故乡和亲人，孤零零埋骨塞外，几十年风雨晨昏，未曾有一个亲来看望过他。在大同中学



穆青在梁雷烈士墓前。

同学中，我是第一个，也许是最后一个来到他的墓前，代表那些在世和不在世的同学，用鲜花、用热泪，用一颗赤诚的心来奠祭自己的恩师。我走之后，又会有谁再来祭扫呢？

我默默地绕着坟茔转了两周，随手拔去一些野草，让同行的年轻人为我在墓碑前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才含着热泪离开了这里。这时候，我甚至不敢回头再看看坟墓，不敢最后说一句：“永别了！我敬爱的梁老师。”

.....

车子回去的路上，正驶过偏关古城的南门。梁老师的



人头当年就是被残暴的敌人悬挂在这里的。我让车子在城门前停住，走下车来，久久凝视着这令人心碎的遗址。那城门还是过去的古城门，但城楼已经颓圮，城墙也残破不堪了。城门正对面是一片繁荣的农贸市场，人来车往，十分热闹。但人们可曾知道，就在这古老的城楼下曾经历过多么残酷血腥的搏斗？一个年轻共产党员的头颅，曾震撼了多少同胞的灵魂，掀起了多么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我觉得，这饱经沧桑的古老城墙，是一座无字的历史丰碑，它镌刻着中华儿女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镌刻着一代共产党员正气凛然的壮歌。

我愿这一古城门能永远成为教育和激励后人的历史教材。

1993年9月18日



赵占魁

赵占魁同志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涌现的第一个工人劳动模范。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他始终以惊人的劳动热情，为边区、为抗战生产着农具和军火……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看守着熔铁炉，熔化着坚硬的铁块。正像他用高度的劳动热情，熔化着一切困难一样。工人们说：“老赵是从火里炼出来的。”

1943年，在陕甘宁边区和各个敌后根据地开展了热烈学习赵占魁的运动。但他，不管是在劳动英雄大会上，或者是和毛主席握手的时候，他总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老老实实为党工作的普通工人罢了……

工人的旗帜赵占魁

1942年的9月，由于中央职工委员会的介绍，我第一次访问了模范工人赵占魁同志。那时候，他正在离延安30里的农具工厂里，用两匹马力的鼓风炉，经年累月地生产着农具和军火。没有想到，整整六年后的今天，在解放区职工代表大会的代表团里，我又会见了这位熟识的英雄。



1948年赵占魁在哈尔滨接受穆青的采访。



看起来赵占魁的鬓发已经斑白了，眼睛也开始花了，可是就在这六年巨大的变化中，赵占魁同志却一直沿着党所指引的道路，成长为中国工人的一面光荣的旗帜了。

回忆六年前的情景，追记这位英雄的故事，我感到特别振奋。

惊人的力量

六年前——1942年，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更处在日寇和国民党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由于经济上敌人的紧密封锁，一切物资来源均告断绝，为了自力更生，继续抗战，边区150万劳动人民，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开展着蓬勃的大生产运动。首先在农业上发展生产保证了边区军民足够的粮食，接着便提出工业品的“自给自足”，号召全边区的职工用自己的力量战胜一切困难，增加工业品的生产。完成这一任务在当时边区薄弱的工业基础上，是相当困难的：第一是原材料的来源困难，第二是技术设备的限制，因此如何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发挥工人智慧和创造，提高他们的劳动热情，使之改进技术，增加生产，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时很需要在工人中发扬一种新的劳动态度，那就是能够认识自己主人翁的地位，自觉地爱护工厂、团结

工人、努力生产、提高技术的态度，同时也是一种老老实实，埋头苦干，一切为着革命利益、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无产阶级的宝贵品质。而当时的赵占魁同志，从长期的工作考验中证明，正是具备这一劳动态度和宝贵品质的典型。因此，他的事迹发表后，很快地就被当作了教育全体职工的最具体的教材，而赵占魁同志，作为工人阶级最优秀的模范和榜样，也开始被人们敬爱着，并向他学习。

赵占魁同志的出现，可以说使我们党的政策，和群众的实际行动结合起来了，它调动了群众的热情及积极性，给边区的职工运动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道路。它的作用在于不仅鼓舞了边区工人高度的劳动热情，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整个边区的工业建设向前发展一步。

这是一种惊人的革命力量，而这种惊人的力量，却建筑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全体职工的积极行动上面，同时也建筑在赵占魁同志的模范作用和先锋作用上面。

光荣的路程

赵占魁同志的一生是劳动的一生，而他前半辈子的生活却是牛马生活。他今年 52 岁，是山西省定襄县人。小时，由于家贫如洗，加上高利贷的重压，父亲一直漂泊在口外，



年老的母亲为了生活也不得不离开家庭给有钱人洗衣做饭。赵占魁弟兄四人，他排行第三，从12岁起就和两个哥哥一起给人家当雇工。虽然全家劳动，但得来的血汗钱，除了还高利贷和缴租纳税以外，剩下的不够糊口，因此他的四弟从小就不得不送给别人。

赵占魁17岁那年，父亲被塌下来的破窑砸死了，他二哥听到这消息，连夜奔丧，不幸在途中过河时又被水淹死。这两桩惨痛的事情，强烈地刺激着赵占魁的心。他想挣扎一下，突破这穷困的牢笼，于是就在这年离开了家，去给一个铁匠当学徒，终年伴着风箱铁锤，漂泊在天镇、阳高一带。

三年后，赵占魁又空着两手回来。这时他20岁，到太原做泥水小工，后来又在太原铜元厂里当学徒，干了8年，29岁开始到兵工厂学翻砂，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工资最多的时候才每月12元，扣去伙食房钱，就所剩无几。旧社会里，工头对待工人是非常毒辣的，动不动就罚工，病了不但没人管，请不下假旷了工，一天就要罚三天。赵占魁是个老实人，又害怕失业，迫使他当牛做马，埋头苦累，虽然这样，到1932年工厂缩减时，他既没有人情，又无钱活动，还是被工厂开除了。37岁这年，就是他失业的一年。

38岁时，好不容易才在同蒲路介休车站修理厂当了名铁匠，好歹干了三年。1938年初，日寇占领了同蒲路，他便

跟铁路工人一起，流亡到西安。这时他听到延安是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是工人的家，便由一位铁路工人介绍，在1938年5月，进了安吴堡青训班的职工大队，不久就来到了延安。

在延安他被分配到工人学校学习，这是他从来没有想到的事，活了40多岁，当了半辈牛马，现在居然进学校读书了。他非常感动，在讨论会上，他把过去所受的苦难，和今天的情况做了个对照说：“在旧社会中，我的血快被挤干了，而今42岁才找到了自己的家。”于是赵占魁同志努力识字，积极学习革命道理。事实的教育，使他牢牢地记住了一条：只有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闹革命，受苦受难的人才能翻身。有一天他和党委的一位同志谈话。他伸出两只粗糙的手说：“共产党要不要我这老汉？”那位同志亲切地回答他说：“老赵，无产阶级就是靠两只手来创造世界的。”老赵听了这句话更是信心百倍地要求参加共产党。

由于他老实忠诚努力学习，当年12月，赵占魁就成为一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39年春天，毛主席号召开展生产运动，他便和另一位老工人崔锁贵，一同去找领导同志，要求参加生产，为大家制造工具，早点为党为人民出点力。领导同志耐心地劝导了他许久，叫他再好好学习。到6月间，边区政府为了发展生产，创办农具工厂，调他去当翻砂工人。他兴奋、激动地说：“这可有了为党出力的时候啦。”当他跟另外



三个同学离开学校的那天晚上，党中央委员、职工运动领袖张浩同志又把他们叫去，亲切地叮咛说：“工厂是公家办的，它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人民自己的工厂。你们都是优秀工人，要好好干，好好爱护工厂。”

赵占魁同志把这些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牢记在心里，并变成了实际行动。

像炉火一样的劳动热情

赵占魁一走进农具工厂，就忙于繁杂的创建工作。不久工厂开工了，他便在 2000 度高温的熔铁炉边辛勤地工作着。他惊人的劳动热情，像炉火一样，一直熊熊地燃烧，从不熄灭。一年又一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面，他看守着熔铁炉，熔化着坚硬的铁块，正像他用高度的劳动热情，熔化着一切困难一样。“老赵是从火里炼出来的。”人们对他的这个评语，一点不错。

化铁看熔炉，应当说是一种最苦的劳动，再加上当时边区技术和工具的困难，就显得更加艰苦；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守在 2000 度高温的炉旁，顶着火一样的太阳，那滋味是难以忍耐的，可是赵占魁同志却始终在这种高温下工作着，而且为了抵抗炉火的烘烤还不得不穿着冬天的棉衣（边区没有石棉衣）。从早到晚，老赵

的全身像浴在汗水里，棉袄被汗水湿透了，结成一层层很厚的白碱；草帽也被汗渍得破烂不堪。但赵占魁同志从没有松懈过，也从没有叫过一声苦。他是这里的轴子，一切工作都随着他在转动，因此他常常不停地工作12个小时以上，有时甚至连饭也顾不上吃。平时，他总是打起床钟以前就第一个起来，上工比别人上得早，下工时总让别人先走，然后自己收拾了所有的工具，再围着工厂巡视一周，检查一下是否有人把工厂的东西乱放乱丢。他常常对工人们说：“工厂是公家办的，同时也是咱们自己的，跟旧社会完全不同啦。”

每次下雨下雪，哪怕是在漆黑的夜里，只要天一阴，赵占魁一定把大家叫起来，领着头把院里的工具、成品，都搬到避雨的地方去，一点不让它遭受损坏，搬不动的就找些东西盖起来。他从没有计较过工资，本来按照规定，加工是另加工资的，可是他不要，他说：“在外边作工，费死了劲还时常饿肚子，现在为革命工作，有吃有穿，要那么多的钱干啥呢？”他也很少请假，有了病也不肯休息。

在1941年，他病了一个星期不能起床，头晕，发着高烧，不能工作，只好由他的学徒李有贵来代替看炉，可是李有贵加铁加得过多，炉里化成了一个二三百斤重的铁疙瘩！赵占魁一听到这消息，便马上从床上挣扎起来，拄着一根



棍子来到熔铁炉旁，身体站不住，就坐在地上看了一天炉，终于把那天的任务完成了。1942年4月，他帮助别人试验弹花机，不小心把一个指头轧坏了，轧出了两块碎骨头，大家劝他休息，他不肯，自己把手包扎好，又用另一只手照常工作起来。

1943年6月熔铜时，因为坩埚坏了，一坩埚铜水（热度在2000度左右），一下倒在地上，一部分泼在他的右脚上，脚面马上烧成焦黑！可是赵占魁同志，不但一声疼也不叫，而且坚持不要别人扶，要自己走到医务所去。这种精神，只有战场上那些“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的战斗英雄们，才能够和他相比！后来，工厂把他送到医院去治疗，延安各个工厂、机关、学校都派人去慰问他，党中央的邓发同志也亲自去看他，劝他好好休养，他收到的慰问品摆满了两桌子，还有15000元（按当时物价算，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而他把这15000元，全部捐献给前方的将士了，他说：“前方有许多同志在流血，比我更痛苦得多呢，我不算啥！”到六七月间，国民党反动派企图进攻边区，当时他的脚还没好，正在医院里，听到这消息，他马上坚决要求出院。为了保卫边区，他带着伤又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长期苦难的日子，使赵占魁同志养成了一种勤劳俭朴的习惯，他把这个习惯一直保持着，他看见有人糟蹋一点东西，不论是公家的或私人的，心里便很不舒服！每次从

炉中倒出来的烂炭，他都用筛子筛过，把可用的烂炭烂铁都尽量挑拣出来。他不光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学徒也这样做，他对学徒们说：“自己要节省，对革命的财产更要节省，一块烂炭一片碎铁，都不是容易来的。”当他发现几年前的烂炭堆里有些生了锈的碎铁块时，他就利用休息时间，蹲在那里扒着拣，不一会儿就拣回了好几斤，接着他又发动学徒去拣，一天就拣回了十几公斤。

这些事情看起来，并不惊人，然而他成年累月一点一滴这样做，从不夸耀自己，从不叫苦，这就不是件容易事，这就叫作新的劳动态度。

忘却了自己的人

赵占魁优良品质的另一特点，则是关心同志，爱护学徒，具有高度的为群众服务精神。他是一个四十几岁的老工人，既有很好的技术，又是翻砂股的股长，但对于工人和学徒，却从不摆一点架子。每当休息的时候，他总带着慈祥的笑，和工人学徒们愉快地生活在一起。人们亲切而又尊敬地称呼他“老赵”，他也像长者一样爱护着工人同志们。特别是对于学徒，他决不保守自己的技术，在他的心里，有这样一个信念：“多教会一个徒弟，就多增加一份革命力量”。因此他常对学徒们说：“我要认真教，你们要认真学，边



区跟外边是根本不同的。”

每次开炉的时候，他总是一面工作，一面指点着叫学徒们实际练习。什么时候加炭加铁，分量多少，风力大小，都一遍一遍地给学徒们讲解。有时为了准确，他叫学徒们把炭和铁用秤称过再装在炉里。在翻砂的过程中，一发现什么毛病，他就把学徒们集拢在一起，研究毛病的原因，告诉他们改进的办法。有时在工作时间内，个别学徒偷懒，老赵就耐心地对他说：“过去在外边工厂里，为了混饭吃常常磨洋工；工头来了就假装着使劲干一会儿，在咱们这里可不同，工厂是咱们工人自己的，没有领导人在，也要自动积极地工作。”在几年工作过程中，他从来没有打骂过工人和学徒，有一次一个学徒一连做坏了好几次成品，老赵还是耐心地说：“同志，这是人民财产，咱们要负责做好呵！”就这样，在他的培养下面，好些学徒都很快地成为熟练工人，整个翻砂股的工作也大大地改进了一步。另外，在物质生活上他更是处处关心学徒，有时因工作较重，看见学徒们饿了，就一声不响去买几个饼子来分给大家吃。学徒们有了困难，老赵总是首先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帮助他们解决。因此在老赵的包袱里，再找不到什么多余的或者较好的东西。

老赵爱护工人，又能团结工人，工人中间有时闹些意气、纠纷，老赵总是想尽办法给他们调解，而工人也最爱听老

赵的话，认为他最公正、最诚恳，因此只要他一出头劝说，无论任何人再大的气，都会平下来。有一次两个工人因为争一块菜地争吵起来。甲说地是他窑前的，乙说菜是他种上的，闹得不可开交，老赵知道后即跑去调解，认为地应该归甲，乙种上了有些损失，老赵答应将来收菜时，从自己菜地里分一百斤蔬菜给乙。这样一来，甲乙双方都非常感动，不仅不再争吵而且互让起来。但秋收后老赵仍然把一百斤蔬菜送到乙的家里。

1941、1942年正是陕甘宁边区最艰苦的年份，工厂的生活当然也非常艰苦，因此生活问题常常影响着工人们的生产情绪，特别是工厂的伙食，工人们牢骚最多。而个别落后分子便乘隙鼓动一些工人进行罢工怠工。赵占魁同志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不仅自己始终站在正确的立场从不叫苦，并勇敢地出来接受工会生活管理委员的工作，利用每天下工后的休息时间，经营合作社，管理伙食。想尽各种办法来节省粮食，组织生产，改善工人生活。

在这一工作过程中，赵占魁同志表现了惊人的耐心和仔细，那种忠实负责，为群众的点点滴滴的利益而鞠躬尽瘁的精神，又一次得到充分的发扬。每天当别人下了工，都三三两两出去游戏的时候，老赵不是忙在合作社里，就是在伙房里帮助伙夫挑水、抱柴。有一次中饭煮生了，工人们挤到伙房里一齐吵起来。当时可把老赵忙坏了，他一



面告诉大家不要吵，一面就亲自帮助伙房重做，直到第二次的饭下了锅，他才擦去满头大汗，拍拍伙房班长的肩膀说：

“同志，不行就再煮一锅稀饭，别叫不够吃，大家都做了一晌工，吃不饱不行。”说罢自己端着一碗大家嫌生的米饭，吃着走了。又一次，一个病号晚上来找他，一进门就怒冲冲地说：“老赵，我还没有吃饭呢，你这伙食委员干什么的？”接着又说了很多难听话，可是赵占魁同志却没有计较这些，并且立即走进厨房亲自给那个病号做了饭。

就这样不到三个月时间，工厂的伙食在老赵的管理下得到了大大的改善，在这一点上不仅使那些落后分子无隙可钻，而且节省了粮食，消除了浪费，做到每月还有剩余。工人们的生产情绪，因之又提高起来。

一切为了大家，而完全忘却了自己的人，是多么难得呵！赵占魁同志就是这样的一种人。

光荣和考验

为了发扬赵占魁同志这种宝贵的品质和新的劳动态度，1943年在中央职工委员会及边区总工会的直接领导下，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热烈的学习赵占魁运动，用赵占魁同志具体的模范事迹，教育全边区的工人。边区政府更奖励赵占魁同志为边区工人特等劳动英雄。一时间，学习赵

占魁，开展赵占魁运动的呼声，响遍了全边区的各个工厂，大批赵占魁式的新人物也不断涌现着。不久，敌后根据地也来电响应，从此赵占魁的英名便传遍全国。

这一事实对赵占魁同志说来，是一个极大的光荣，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冲昏头脑，也没有因此而骄傲，相反地，他却更加虚心，更加埋头了。不管是在劳动英雄大会上，或者是和毛主席握手的时候，他总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老老实实为党工作的普通工人罢了，并不比任何人高贵，即令在工作中有些成绩，那也是在党的培养及同志们的帮助下得来的。因此，在火热的赵占魁运动当中，他始终警惕着自己，鞭策着自己，一分钟也不脱离群众，并以最大的努力到处介绍经验，帮助工人们推动这一运动向前发展。

1944年，当张秋凤（晋绥工人劳动英雄）致函向赵占魁同志作生产竞赛的挑战时，他除去勇敢地应战外，在回答他们的信上，更把力戒骄傲松懈，虚心提高一步的志愿作为他们互相勉励的祝词。并且在以后的实际行动中，全部实现出来了。

以后，他被调到另一地区工作，那里的工人们因为知道他是名闻全国的英雄，故意在生活上、工作上给他许多困难，企图看看这位英雄究竟如何。可是两三个月后，他们不仅没有发现赵占魁同志的任何缺点，相反地，却为他那种埋头苦干，爱护工厂，关心同志的优良品质所深深地



感动，从而对他无不尊敬了。

赵占魁同志这种经得起任何考验，始终如一，不出风头的英雄本色，是中国工人阶级宝贵的品质，也是赵占魁同志这面英雄旗帜，至今迎风挺立的有力支柱；特别是当有些劳动英雄仅仅是昙花一现的时候，这面旗帜就更显得五彩绚丽。

二十一个翻砂女工

1946年的5月，当蒋介石匪徒已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内战的时候，赵占魁同志接受了一个新的任务：回到过去的工厂去，组织一切劳动力制造地雷。

当时，工厂里只有很少的翻砂工人，劳动力非常缺乏。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迅速地完成任务，大量地制造地雷，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但老赵清楚地知道，内战的形势是肯定了，任务又是那样紧迫，如果不能克服这个劳动力的困难，提高生产，其结果必将是直接减低边区人民自卫战争的武装力量。

为了解决这一困难，老赵曾想来想去，最后终于把注意力放在该厂21个工人家属身上。他想如果能把这些妇女组织起来学习翻砂，不仅可以解决制造地雷所急需的人力，而且还可以减轻公家对这批家属的负担，从而，从生产中

去教育她们，解决她们的困难。

可是这一工作一开始就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抵抗，部分工厂干部及男工认为组织这些家属妇女根本不顶事，工做不了多少，光麻烦事就不得了。有些干部和工人更认为要自己的老婆去做工有点丢脸，怕别人说他连个老婆都养活不起。个别家属妇女也怕没有做过工，干不了。

针对着这些思想抵触，赵占魁同志在党的支持下，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并和这些轻视妇女劳动的传统思想作斗争，保证一旦把妇女劳动发动和组织起来，绝不会和男工们相差太远。

于是他一个个征求妇女们的意见，动员她们，鼓励她们，经过几天的酝酿，女工翻砂队终于兴高采烈地组织起来了，赵占魁同志亲自领导她们，教给她们技术，带领她们工作。过去整天纺线线、带娃娃被拖在家庭琐事里的妇女，今天居然也穿起工服和男工们一样参加了重工业的军火生产，谁不觉得这是无上光荣呢？

当然，女工们在工作刚开始的时候，无论技术上和体力上都还有许多困难，但最大的困难还是带孩子的问题不能解决。白天妈妈上工了，孩子没人管怎么办？如果大家都把孩子抱进工厂里，那就什么工也做不成了，于是老赵不得不花费很大的力量，来为她们组织工厂的托儿所。

托儿所共分三个组，按孩子们的年龄分，由三个保姆



看管着。每天上工时，妈妈们把孩子交给保姆，晚上下工后再领回家去。保姆由女工们轮流担任，其每月的工资和女工们完全一样。为了经常地解决保姆与妈妈们中间的纠纷，同时检查托儿所的工作，赵占魁同志每周都要给她们开开会，解决些问题，因此，女工们对托儿所的工作，一般说是非常满意的。

孩子问题解决后，女工们的生产积极性便自然地被发挥起来，抢着工作，抢着学习技术，开始时老赵先教给她们打心子，一次做不好，老赵就三番五次非常耐心地教，后来渐渐学会了，就抽出一部分女工来做砂箱，一直到最后让她们端铁水，学化铁，参加全部劳动。因此女工们进步很快，开始时她们的平均产量只能达到十分之三、四，两三个月后就逐渐增加到十分之七、八。而且在赵占魁同志的影响下，她们的劳动热情达到了最高度，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老赵熔铁炉上的风车一转动，不用喊叫，女工们在五分钟之内会立即来到工厂，一个不差。特别是7月间，内战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爆发之后，赵占魁同志更领导着她们日夜加工生产，积极支援战争。

就这样，赵占魁同志胜利地完成了制造地雷的生产任务，并第一次摸索了组织女工生产的方法，为我们的军火工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翻砂女工。

“把孩子交给我”

1947年3月，蒋胡匪军侵入了陕甘宁边区，四月攻占延安后，更疯狂地分兵北上。当时陕北的形势是异常严重的，边区副司令员王维舟将军曾亲自去兵工厂，限该厂在七天时间内，撤离瓦窑堡，所有机器、器材，能搬的搬走，不能搬的就埋藏起来。

这是一个紧张的战斗任务，也是陕甘宁边区工人在十几年和平生产的情况下，所遇到的第一次战争考验。在这次考验里，年长的赵占魁同志，仍然站在全体工人的前面，和他们一起下机器，埋机器，搬运着工厂所有的器材。当他们把这些机器深深地埋在山谷里，并在上面耕起地来的时候，他们的心情是悲愤的。他们说：我们决不能让它丢失一点，我们还要回来的。

整整七天时间，工厂按期完成了紧张繁杂的撤退工作，而敌人的先头部队已越过了延安、安塞，直向瓦窑堡前进。工友们为了保护工厂的安全撤退，组织了工人游击队，用自己工厂制造和修理的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准备着必要时，将用血肉来保护自己的工厂。在这种严重的局势下，赵占魁同志虽然多次要求参战，但组织上始终没有允许。最后，厂长把老赵唤到面前，告诉他：“你年纪老了，不能参战，现在党给你一个更重要的任务：要你带着全厂的家属小孩，



老弱病号转移。”

赵占魁同志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他知道没有牲口，没有行军经验，再加上兵马慌乱，要保证这群毫无走路能力的家属小孩、老弱病号的安全撤退，不仅不是件容易的任务，简直是个千斤重担。但他终于像过去接受任何任务一样，勇敢地担起了这个担子。

家属队一共是 21 个女同志，二十几个 10 岁以下的小孩，加上几个老头，两个病号，一个 50 多岁的小脚老太婆，人数虽不太多，但困难却是严重的。第一天出发，刚走出瓦窑堡 30 里地，就有特务造谣说敌人已经到了瓦窑堡，当时谁也弄不清真实情况，只看见敌人的飞机在头上绕来绕去。于是母亲叫，孩子哭，饭没有吃上就慌慌张张又走了。一路上老赵背儿抱女，搀这个扶那个，70 里地一直走到天黑，好不容易到了南沟岔，老赵也就累得不能动弹了。但他并没有休息，当他把一家一家所有的母亲孩子安置好以后，又忙着领粮食找柴火烧水做饭……一直到深夜才合上眼睛。

一路上，他经常征求家属们的意见，对她们照顾备至。为了避免妇女小孩走路饥渴，每天行军时，他都先派两个人到前面烧水做饭，宿营时也尽量给她们找出炕来。虽然这样，但情况的紧急和行军的困难，却并没有因此减少老赵的负担。

当他们离开工厂的大队，单独住在莫家河的时候，敌

人占领了瓦窑堡，并向东向北大举进攻。晚上，在莫家河的村外，我们后方机关的人马，一批批地经过这里向西转移，一时人喊马叫，传说不一。在这种情况下，家属队的母亲们全部慌乱起来，所有的眼睛都看着赵占魁，但这时候老赵却是非常镇静的。他一面把她们统统集合好，不许乱动，一面便派人去询问厂方的动向。不久厂长派人给他带来一个紧急的命令：立刻向西转移，必要时可分散全部家属，或带着女工们打游击。

老赵简单地传达了这个命令，并要求大家在最紧急的时候，保持镇静，不许乱跑，要死就大家死在一起，要活就一个人也不能丢失。所有的母亲孩子病号都走在前面，老赵派一个人在前面引着走，而自己和另外两个老头却背着家属们背不了的包袱，紧紧地跟在她们的后尾。

这是一条崎岖的山谷，满地的石子，加上漆黑的天气，不到半夜，母亲们带着自己的孩子，便一个一个地掉到后面来。孩子们哭哭啼啼地哭着走不动，母亲们除去陪着孩子们流泪以外，没有任何办法。这时候老赵把五六个10岁到5岁的孩子聚在一起，并且对他们的母亲说：“你们走吧，把孩子交给我。”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一个50开外的人，在黑夜的山路上，在敌人的追击下，带着这样小的五六个孩子撤退，其困难情景是可以想象的。孩子们的小脚统统走得肿起来



了，哭哭啼啼地都伸着小手要赵伯伯抱着走。老赵轮流地背一个抱一个，哄着其他的孩子们说：“××是好孩子，自己走一段”，“××最乖，下来走几步赵伯伯再抱。”就这样抱上抱下，哄哄说说，天亮时老赵终于把孩子们带到了宿营地。当母亲们从老赵的怀里抱回自己孩子的时候，感激的热泪，充满了眼眶。

几天之后，赵占魁完成了这一撤退任务，检查起来，整个家属队的母亲、小孩、老弱、病号，甚至连那个小脚肿起了一寸高水泡的老太婆，一个都没有丢失，也从未发生任何事故。因此没有人不表扬他这种克己、负责、爱护同志的精神，但他却从不再提起这件事。当工厂到达了安全地带以后，像以往数年一样，赵占魁同志又埋头在工厂的恢复工作当中了。

如果说赵占魁过去是从火里炼出来的，那仅是化铁炉里的火，而今天人民革命战争的烈火，更进一步锻炼了他。他经受住了这两重火的考验。赵占魁同志是坚强的。

“人民的天下大了！”

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及解放区职工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今年3月间，赵占魁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全体职工的一致拥戴下，被选为出席大会的代表，随西北代表团一

起来到了东北。

一路上他经过了解放区许多城市，参观了各种各样的工厂。每到一地，解放区的党政军民，特别是工人群众，无不以高度的敬爱，热烈地欢迎着他，谁不愿意看看这位中国工人的旗帜赵占魁呢？谁不愿意从他的身上学习一些宝贵的东西呢？因此在每一个工厂，无论在院子里，在工作间，只要赵占魁一走进来，工人们就立刻围绕着他，争着和他谈话，和他握手；并诚恳地要求老赵给他们讲话，哪怕是一两句也好。

对于这些热情的欢迎，老赵是非常感动的。他认为像他这样一个普通的工人，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由于全心全意地为革命工作，爱护工厂，爱护同志，今天所得到的尊敬是太大了。因此每当工友们要他讲话的时候，他只有衷心地鼓励大家：努力工作，好好学习技术，全力打倒蒋介石。

这次一个半月的沿途见闻，应该说对老赵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在许多次的参观中，他看到了解放区工业的恢复和飞速的发展情形，看见了各种各样他从未看见过的好机器和好产品。大批丰富的原料、资材，和逐日提高的生产效率都使他感到最大的兴奋。他觉得人民的工业是大大地发展了，而自己的技术和知识却远远地落在这种近代化工业的后面。为此一路上他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观察着机器，观察着工人们管理机器的技术，不断地向各地工友们学习。



他说：“比起你们来，我们各方面都是落后的，但好处是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建立了工业，生产了东西。”他坚信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在党的领导下既然能够从无到有，今后从有到发展也是不成问题的。

比起工业设备和工业技术来，赵占魁同志更关心的却是各地工友们的生产情绪和政治觉悟。经过一般的了解，他认为解放区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是很高的，工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这样一个普遍真理：即把工厂当作了自己的家，认识到自己每一分钟的工作，都是在为革命生产物质力量，生产着加速蒋介石死亡的力量。

近代化的工业设备，加上工友们的政治觉悟，广大的解放区，加上千百万人民的支持，革命形势发展的图景，使赵占魁同志喜悦，也鼓舞着他前进。因此在哈尔滨的車站上，向着来欢迎他的工友们，他衷心地說：“人民的天下大了！”

是的，“人民的天下大了”，赵占魁同志，我们热烈地祝愿你这面光荣的旗帜，永远飘扬在工人阶级的前面。

1948年7月写于哈尔滨



焦裕禄

焦裕禄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

他在兰考工作一年零三个月时间里，带领全县 36 万人民，同严重的内涝、风沙、盐碱灾害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病危之际，他深情地要求组织上把他埋在兰考的沙堆上，他说：“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

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河南兰考一村庄的房屋被风沙掩埋（资料照片），风沙、盐碱、内涝是兰考历史上的“三害”。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严重的灾荒的景象呵！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

困难，重重的困难，像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这位新到任的县委书记的双肩。但是，焦裕禄是带着《毛泽东选集》来的，是怀着改变兰考灾区面貌的坚定决心来的。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这里有 36 万勤劳的人民，有烈士们流血牺牲解放出来的 90 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一时就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能杀出条路来。

第二天，当大家知道焦裕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下乡去了。

他到灾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他到贫下中农的草屋里，到饲养棚里，到田边地头，去了解情况，观察灾情去了。他从这个大队到那个大队，一路走，一路和同行的干部谈论。见到沙丘，他说：“栽上树，岂不是成了一片好绿林！”见到涝洼窝，他说：“这里可以栽苇、种蒲、养鱼。”见到碱地，他说：“治住它，把一片白变成一片青！”转了一圈回到县委，他向大家说：“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焦裕禄的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大家议论说，新来的县委书记看问题高人一着棋，他能从困难中看到希望，能从不利条件中看到有利因素。

“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

连年受灾的兰考，整个县上的工作，几乎被发统销粮、贷款、救济棉衣和烧煤所淹没了。有人说县委机关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供给部。那时候，很多群众等待救济，一部分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对改变兰考面貌缺少信心，少数人甚至不愿意留在灾区工作。他们害怕困难，更害怕犯错误……

焦裕禄想：“群众在灾难中两眼望着县委，县委挺不起腰杆，群众就不能充分发动起来。‘干部不领，水牛掉井’，要想改变兰考的面貌，必须首先改变县委的精神状态。”

夜，已经很深了，焦裕禄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披上棉衣，找县委一位副书记谈心去了。

在这么晚的时候，副书记听见叩门声，吃了一惊。他迎进焦裕禄，连声问：“老焦，出了啥事？”

焦裕禄说：“我想找你谈谈。你在兰考十多年了，情况比我熟，你说，改变兰考面貌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副书记沉思了一下，回答说：“在于人的思想的改变。”



“对。”焦裕禄说：“但是，应该在思想前面加两个字：领导。眼前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

两个人谈得很久，很深，一直说到后半夜。他们的共同结论是，除“三害”首先要除思想上的病害；特别是要对县委的干部进行抗灾的思想教育。不首先从思想上把人们武装起来，要想进行除“三害”的斗争，将是不可能的。

严冬，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人们到齐后，他并没有宣布议事日程。只说了一句：“走，跟我出去一趟”，就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了。

当时，兰考车站上，北风怒号，大雪纷飞。车站的屋檐下，挂着尺把长的冰柱。许多逃荒的灾民扶老携幼拥挤在候车室里。他们正等待着国家运送灾民前往丰收地区的专车，从这里开过……

焦裕禄指着他们，沉重地说：“同志们，你们看，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 36 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他没有再讲下去，所有的县委委员都沉默着低下了头。这时有人才理解，为什么焦裕禄深更半夜领着大家来看风雪严寒中的车站。

从车站回到县委，已经是半夜时分了，会议这时候才正式开始。

焦裕禄听了大家的发言，最后说：“我们经常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我希望大家能牢记着今晚的情景，这样我们就会带着阶级感情，去领导群众改变兰考的面貌。”

紧接着，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鼓舞大家的革命干劲，鼓励大家像张思德、白求恩那样工作。

以后，焦裕禄又专门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回忆兰考的革命斗争史。在残酷的武装斗争年代，兰考县的干部和人民，同敌人英勇搏斗，前仆后继。有个地区，在一个月內曾经有九个区长为革命牺牲。烈士马福重被敌人破腹后，肠子被拉出来挂在树上……焦裕禄说：“兰考这块地方，是同志们用鲜血换来的。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就把它让给敌人，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胜灾害？”

一连串的阶级教育和思想斗争，使县委领导核心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站起来了。他们打掉了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无所作为的懦夫思想，从上到下坚定地树立了自力更生消灭“三害”的决心。不久，在焦裕禄倡议和领导下，一个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制订出来了。这个蓝图规定在三五年内，要取得治沙、治水、治碱的基本胜利，改变兰考的面貌。这个蓝图经过县委讨论通过后，报告了



中共开封地委，焦裕禄在报告上，又着重加了几句：

“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面对着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的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

这几句话，深切地反映了当时县委的决心，也是兰考全党在上级党组织面前，一次庄严的宣誓。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焦裕禄深深地了解，理想和规划并不等于现实，这涝、沙、碱三害，自古以来害了兰考人民多少年呵！今天，要制伏“三害”，要把它们从兰考土地上像送瘟神一样驱走，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付出高昂的代价。

他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管做什么工作，必须首先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想战胜灾害，单靠一时的热情，单靠主观愿望，事情断然是办不好的。即使硬干，也要犯“闭塞眼睛捉麻雀”的错误。要想战胜灾害，必须详尽地掌握灾害的底细，了解灾害的来龙去脉，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部署。

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 1800 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亲自去掂一掂兰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分量。

根据这一想法，县委先后抽调了 120 个干部、老农和

技术员，组成一支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和县委其他领导干部，都参加了这次调查。那时候，焦裕禄正患着慢性的肝病，许多同志担心他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加剧病情的发展，劝他不要参加，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同志们的劝告，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依靠别人的汇报来进行工作，说完就背着干粮，拿着雨伞，和大家一起出发了。

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这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从黄河故道开始，越过县界、省界，一直追到沙落尘埃，水入河道，方肯罢休。在这场艰苦的调查中，焦裕禄简直变成一个满身泥水的农村“脱坯人”了。他和调查队的同志们经常在截腰深的水里吃干粮，蹲在泥泞里歇息……

有一次，焦裕禄从埇阳公社回县城路上，遇到了白帐子猛雨。大雨下了七天七夜，全县变成了一片汪洋。焦裕禄想：“洪水呀，等还等不到哩，你自己送上门来了。”他回到县里后，连停也没停，就带着办公室的三个同志



察看洪水去了。眼前只有水，哪里有路？他们靠着各人手里的一根棍，探着，走着。这时，焦裕禄突然感到一阵阵肝痛，不时弯下身子用左手按着肝区。三个青年恳求他：“你回去休息吧。把任务交给我们，我们保证按照你的要求完成任务。”焦裕禄没有同意，继续一路走，一路工作着。

他站在洪水激流中，同志们为他张着伞，他画了一张又一张水的流向图。等他们赶到金营大队，支部书记李广志一看见焦裕禄就吃惊地问：“一片汪洋大水，您是咋来的？”焦裕禄抡着手里的棍子说：“就坐这条船来的。”李广志让他休息一下，他却拿出自己画的图来，一边指点着，一边滔滔不绝地告诉李广志，根据这里的地形和水的流势，应该从哪里到哪里开一条河，再从哪里到哪里挖一条支沟……这样，就可以把这几个大队的积水，统统排出去了。李广志听了非常感动，他没有想到，焦裕禄同志的领导工作竟这样的深入细致！到吃饭的时候了，他要给焦裕禄派饭，焦裕禄说：“雨天，群众缺烧的，不吃啦！”说着，就又向风雨中走去。

送走了风沙滚滚的春天，又送走了暴雨连连的夏季，调查队在风里、雨里、沙窝里、激流里度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方圆跋涉了5000余里，终于使县委抓到了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有大小风口84个，经调查队一个个查

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有大小沙丘 1600 个，也一个个经过丈量，编了号、绘了图；全县的千河万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这种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使县委基本上掌握了水、沙、碱发生、发展的规律。几个月的辛苦奔波，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把全县抗灾斗争的战斗部署，放在一个更科学更扎实的基础之上。大家都觉得方向明，信心足，无形中增添了不少的力量。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夜已经很深了，阵阵的肝痛和县委工作沉重的担子，使焦裕禄久久不能入睡。他的心在想着兰考县的 36 万人和 2574 个生产队。抗灾斗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觉悟也有高有低，怎样才能充分调动起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怎样才能更快地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抗灾斗争？

焦裕禄在苦苦思索着。

在多年的工作中，焦裕禄善于从毛泽东同志著作中汲取营养，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叫做“白天到群众中调查访问，回来读毛主席著作，晚上‘过电影’。”他所说的“过电影”，



焦裕禄（前中）20 世纪 60 年代在兰考沙区现场组织抗灾。（新华社发）

主要是指联系实际来思考问题。他说：“无论学习或工作，不会‘过电影’那是不行的。”

现在，全县抗灾斗争的情景，正像一幕幕的电影活动在他的脑海里，此时此刻，他觉得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方法，是多么重要！

他决定发动县委领导同志再到贫下中农中间去，集中群众的智慧寻求解决困难的办法。他自己更是经常住在老贫农的草庵子里，蹲在牛棚里，跟群众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他带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对群众的无限信任，在广大贫下中农中间询问着、倾听着、观察着。他听到许多贫下中农的要求和呼声，看到许多社队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他在群众中学到了不少治沙、治水、治碱的办法，总结了不少可贵的经验。群众的智慧，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也更加坚定了他战胜灾害的信心。

韩村是一个只有 27 户人家的生产队。1962 年秋天遭受了毁灭性的涝灾，每人只分了 12 两红高粱穗。在这样严重的困难面前，生产队的贫下中农提出，不向国家伸手，不要救济粮、救济款，自己割草卖草养活自己。他们说：摇钱树，人人有，全靠自己一双手。不能支援国家，心里就够难受了，决不能再拉国家的后腿。就在这年冬天，他们割了 27 万斤草，养活了全体社员，养活了 8 头牲口，还修理了农具，买了 7 辆架子车。

秦寨大队的贫下中农社员，在盐碱地上刮掉一层皮，从下面深翻出好土，盖在上面。他们大干深翻地的时候，正是最困难的 1963 年夏季，他们说：“不能干一天就干半天，不能翻一锹就翻半锹，用蚕吃桑叶的办法，一口口啃，也要把这碱地啃翻个个儿。”

赵垛楼的贫下中农在七季基本绝收以后，冒着倾盆大雨，挖河渠，挖排水沟，同暴雨内涝搏斗。1963 年秋天，这里一连九天暴雨，他们却夺得了好收成，卖了 8 万斤余粮。

双杨树的贫下中农在农作物基本绝收的情况下，雷打不散，社员们兑鸡蛋卖猪，买牲口买种子，坚持走集体经济自力更生的道路，社员们说：“穷，咱穷到一块儿；富，咱也富到一块儿。”

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广大贫下中农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使焦裕禄十分激动。他认为这就是在毛泽东



思想哺育下的贫下中农革命精神的好榜样。他在县委会议上，多次讲述了这些先进典型的重大意义。他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应该把群众中这些可贵的东西，集中起来，再坚持下去，号召全县社队向他们学习。”

1963年9月，县委在兰考冷冻厂召开了全县大小队干部的会议，这是扭转兰考局势的大会，是兰考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一次誓师大会。会上，焦裕禄为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的贫下中农鸣锣开道，请他们到主席台上，拉他们到万人之前，大张旗鼓地表扬他们的革命精神。他把群众中这些革命的东西，集中起来，总结为四句话：“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他说：这就是兰考的新道路！是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他大声疾呼，号召全县人民学习这四个样板，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在全县范围内锁住风沙，制伏洪水，向“三害”展开英勇的斗争！

这次大会在兰考抗灾斗争的道路上，是一个伟大的转折。它激发了群众的革命豪情，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有力地推动了全县抗灾斗争的发展。它使韩村等四个榜样的名字传遍了兰考；它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兰考36万群众的心目中，高高地升起！

从此，兰考人民的生活中多了两个东西，这就是县委和县人委发出的“奋发图强的嘉奖令”和“革命硬骨头队”

的命名书。

“当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出现在群众面前”

就在兰考人民对涝、沙、碱三害全面出击的时候，一场比过去更加严重的灾害又向兰考袭来。1963年秋季，兰考县一连下了13天雨，雨量达250毫米。大片大片的庄稼汪在洼窝里，渍死了。全县有11万亩秋粮绝收，22万亩受灾。

焦裕禄和县委的同志们全力投入了紧急的生产救灾。

那是个冬天的黄昏。北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焦裕禄听见风雪声，倚在门边望着风雪发呆。过了会儿，他又走回来，对办公室的同志们严肃地说：“在这大风大雪里，贫下中农住得咋样？牲口咋样？”接着他要求县委办公室立即通知各公社做好几件雪天工作。他说，“我说，你们记记：第一，所有农村干部必须深入到户，访贫问苦，安置无屋居住的人，发现断炊户，立即解决。第二，所有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必须深入牛屋检查，照顾老弱病畜，保证不许冻坏一头牲口。第三，安排好室内副业生产。第四，对于参加运输的人畜，凡是被风雪隔在途中的，在哪个大队的范围，由哪个大队热情招待，保证吃得饱，住得暖。第五，教育全党，在大雪封门的时候，到群众中去，和他们同甘共苦。最后一条，把检查执行的情况迅速报告



县委。”办公室的同志记下他的话，立即用电话向各公社发出了通知。

这天，外面的大风雪刮了一夜。焦裕禄的房子里，电灯也亮了一夜。

第二天，窗户纸刚刚透亮，他就挨门把全院的同志们叫起来开会。焦裕禄说：“同志们，你们看，这场雪越下越大，这会给群众带来很多困难，在这大雪拥门的时候，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应该到群众中间去。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

简短的几句话，像刀刻的一样刻在每一个同志的心上。有人眼睛湿润了，有人有多少话想说也说不出来了。他们的心飞向冰天雪地的茅屋去了。大家立即带着救济粮款，分头出发了。

风雪铺天盖地而来。北风响着尖利的哨音，积雪有半尺厚。焦裕禄迎着大风雪，什么也没有披，火车头帽子的耳巴在风雪中忽闪着。那时候，他的肝痛常常发作，有时疼得厉害，他就用一支钢笔硬顶着肝部。现在他全然没想到这些，带着几个年轻小伙子，踏着积雪，一边走，一边高唱《南泥湾》。

这一天，焦裕禄没烤群众一把火，没喝群众一口水。风雪中，他在9个村子，访问了几十户生活困难的老贫

农。在许楼，他走进一个低矮的柴门。这里住的是一双无儿无女的老人。老大爷有病躺在床上，老大娘是个盲人。焦裕禄一进屋，就坐在老人的床头问寒问饥。老大爷问他是谁？他说：“我是您的儿子。”老人问他大雪天来干啥？他说：“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老大娘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用颤抖的双手上上下下摸着焦裕禄。老大爷眼里噙着泪说：“解放前，大雪封门，地主来逼租，撵得我串人家的房檐，住人家的牛屋。”焦裕禄安慰老人说：“如今印把子抓在咱手里，兰考受灾受穷的面貌一定能够改过来。”

就是在这次雪天送粮当中，焦裕禄也看到和听到了许多贫下中农极其感人的故事。谁能够想到，在毁灭性的涝灾面前，竟有那么一些生产队，两次三番退回国家送给他们的救济粮、救济款。他们说：把救济粮、救济款送给比我们更困难的兄弟队吧，我们自己能想办法养活自己！

焦裕禄心里多么激动呵！他看到毛泽东思想像甘露一样滋润了兰考人民的心，党号召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硬骨头精神，已经变成千千万万群众敢于同天抗、同灾斗的物质力量了。

有了这种精神，在兰考人民面前还有什么天大的灾害不能战胜！



“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

焦裕禄常说，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县委这个“班”带好，必须使这“一班人”思想齐、动作齐。而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就必须靠毛泽东思想。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县人委有一位从丰收地区调来的领导干部，提出了一个装潢县委和县人委领导干部办公室的计划。连桌子、椅子、茶具，都要换一套新的。为了好看，还要把城里一个污水坑填平，上面盖一排房子。县委多数同志激烈地反对这个计划。也有人问：“钱从哪里来？能不能花？”这位领导干部管财政，他说：“花钱我负责。”

但是，焦裕禄提了一个问题：

“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他接着说明了自己的意见：

“灾区面貌没有改变，还大量吃着国家的统销粮，群众生活很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连想也很危险。”

后来，焦裕禄找这位领导干部谈了几次话，帮助他认识错误。焦裕禄对他说：兰考是灾区，比不得丰收区。即使是丰收区，你提的那种计划，也是不应该做的。焦裕禄劝这位领导干部到贫下中农家里去住一住，到贫下中农中

间去看一看。去看看他们想的是什么，做什么。焦裕禄作为县委的班长，他从来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对同志们要求非常严格，但他要求得入情入理，叫你自己从内心里生出改正错误的力量。不久以后，这位领导干部认识了错误，自己收回了那个“建设计划”。

有一位公社副书记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当时，县委开会，多数委员主张处分这位同志。但焦裕禄经过再三考虑，提出暂时不要给他处分。焦裕禄说，这位同志是我们的阶级弟兄，他犯了错误，给他处分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处分是为了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当前改变兰考面貌，是一个艰巨的斗争，不如派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考验他，锻炼他，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让他为党的事业出力，这样不是更好吗？

县委同意了焦裕禄的建议，决定派这个同志到灾害严重的赵垛楼去蹲点。这位同志临走时，焦裕禄把他请来，严格地提出批评，亲切地提出希望，最后焦裕禄说：“你想想，当一个不坚强的战士，当一个忘了群众利益的共产党员，多危险，多可耻呵！先烈们为解放兰考这块地方，能付出鲜血、生命；难道我们就不能建设好这个地方？难道我们能在自然灾害面前当怕死鬼？当逃兵？”

焦裕禄的话，一字字、一句句都紧紧扣住这位同志的心。这话的分量比一个最重的处分决定还要沉重，但这话



也使这位同志充满了战斗的激情。阶级的情谊，革命的情谊，党的温暖，在这位犯错误的同志的心中激荡着，他满眼流着泪，说，“焦裕禄同志，你放心……”

这位同志到赵垛楼以后，立刻同群众一道投入了治沙治水的斗争。他发现群众的生活困难，提出要卖掉自己的自行车，帮助群众，县委制止了他，并且指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从思想上武装赵垛楼的社员群众，领导他们起来，自力更生进行顽强的抗灾斗争，一辆自行车是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以后，焦裕禄也到赵垛楼去了。他关怀赵垛楼的 2000 来个社员群众，他也关怀这位犯错误的阶级弟兄。

就在这年冬天，赵垛楼为害农田多年的 24 个沙丘，被社员群众用沙底下的黄胶泥封盖住了。社员们还挖通了河渠，治住了内涝。这个一连七季吃统销粮的大队，一季翻身，卖余粮了。

也就在赵垛楼大队“翻身”的这年冬天，那位犯错误的同志，思想上也翻了个个儿。他在抗灾斗争中，身先士卒，表现得很英勇。他没有辜负党和焦裕禄对他的期望。

焦裕禄，出生在山东淄博一个贫农家里，他的父亲在解放前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逼迫上吊自杀了。他从小逃过荒，给地主放过牛，扛过活，还被日本鬼子抓到东北挖过煤。他带着家仇、阶级恨参加了革命队伍，在部队、农村和工

厂里做过基层工作。自从参加革命一直到当县委书记以后，他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他常常开襟解怀，卷着裤管，朴朴实实地在群众中间工作、劳动。贫农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有多少泥。他穿的袜子，补了又补，他爱人要给他买双新的，他说：“跟贫下中农比一比，咱穿得就不错了。”夏天他连凉席也不买，只花四毛钱买一条蒲席铺。

有一次，他发现孩子很晚才回家去。一问，原来是看戏去了。他问孩子：“哪里来的票？”孩子说：“收票叔叔向我要票，我说没有。叔叔问我是谁？我说焦书记是我爸爸。叔叔没有收票就叫我进去了。”焦裕禄听了非常生气，当即把一家人叫来“训”了一顿，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接着，他又建议县委起草了一个通知，不准任何干部特殊化，不准任何干部和他们的子弟“看白戏”……

“焦裕禄是我们县委的好班长，好榜样。”

“在焦裕禄领导下工作，方向明，信心大，敢于大作大为，心情舒畅，就是累死也心甘。”

焦裕禄的战友这样说，反对过他的人这样说，犯过错误的人也这样说。

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县委一位副书记在乡下患感冒，焦裕禄几次打电话，



要他回来休息；组织部一位同志有慢性病，焦裕禄不给他分配工作，要他安心疗养；财委一位同志患病，焦裕禄多次催他到医院检查……焦裕禄的心里，装着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1964年春天，正当党领导着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很多人都发现，无论开会、作报告，他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他棉袄上的第二和第三个扣子是不扣的，左手经常揣在怀里。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靠椅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



焦裕禄同志
工作时所坐的藤椅。
(新华社记者严世昌摄)



焦裕禄以惊人的毅力，同病魔作斗争，在他的卧室里、藤椅边、床上，放着墨盒盖、玻璃杯等一类小东西，每当肝痛得厉害的时候，他就拿这些硬东西顶着疼的地方，顽强地坚持工作和学习。（新华社发）

个大窟窿。他对自己的病，是从来不在意的。同志们问起来，他才说他对肝痛采取了一种压迫止痛法。县委的同志们劝他疗养，他笑着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他，他就不欺侮你了。”焦裕禄暗中忍受了多大痛苦，连他的亲人也不清楚。他真是全心全意投到改变兰考面貌的斗争中去了。

焦裕禄到地委开会，地委负责同志劝他住院治疗，他说：“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离不开！”没有住。地委给他请来一位有名的中医诊断病情，开了药方，因为药费很贵，



他不肯买。他说：“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花这么多钱买药，我能吃得下吗？”县委的同志背着他去买来三剂，强他服了，但他执意不再服第四剂。

那天，县委办公室的干部张思义和他一同骑自行车到三义寨公社去。走到半路，焦裕禄的肝痛发作，疼得蹬不动车，两个人只好推着自行车慢慢走。刚到公社，大家看他气色不好，就猜出是他又发病了。公社的同志说：“休息一下吧。”他说：“谈你们的情况吧，我不是来休息的。”

公社的同志一边汇报情况，一边看着焦裕禄强按着肝区在做笔记。显然，他的肝痛得使手指发抖，钢笔几次从手指间掉了下来。汇报的同志看到这情形，忍住泪，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而他，看来还是神情自若的样子，说：

“说，往下说吧。”

1964年的3月，兰考人民的除“三害”斗争达到了高潮，焦裕禄的肝病也到了严重关头。躺在病床上，他的心潮汹涌澎湃，奔向那正在被改造着的大地。他满腔激情地坐到桌前，想动手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铺开稿纸，拟好了四个小题目：一、设想不等于现实。二、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首先是领导思想的改变。领导思想不改变，外地的经验学不进，本地的经验总结不起来。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四、精神原子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

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焦裕禄，从兰考人民在抗灾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从兰考人民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中，已经预见到新兰考美好的未来。但是，文章只开了个头，病魔就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笔，县委决定送他到医院治病去了。

临行那一天，由于肝痛得厉害，他是弯着腰走向车站的。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呵！一年多来，全县 149 个大队，他已经跑遍了 120 多个。他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兰考的群众，兰考的斗争。正像一位指挥员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离开炮火纷飞的前沿阵地一样，他从心底感到痛苦、内疚和不安。他不时深情地回顾着兰考城内的一切，他多么希望能很快地治好肝病，带着旺盛的精力回来和群众一块战斗呵！他几次向送行的同志们说，不久他就会回来的。在火车开动前的几分钟，他还郑重地布置了最后一项工作，要县委的同志好好准备材料，等他回来时，向他详细汇报抗灾斗争的战果。

“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开封医院把焦裕禄转到郑州医院，郑州医院又把他转到北京的医院。在这位钢铁般的无产阶级战士面前，医生们为他和肝病斗争的顽强性格感到惊异。他们带着崇敬的



心情站在病床前诊察，最后很多人含着眼泪离开。

那是个多么令人悲恸的日子呵！医生们开出了最后的诊断书，上面写道：“肝癌后期，皮下扩散。”这是不治之症。送他去治病的赵文选同志，不相信这个诊断，人像傻了似的，一连声问道：“什么，什么？”医生怀着沉重的心情，低声说：“焦裕禄同志最多还有 20 天时间。”

赵文选呆了一下，突然放声痛哭起来。他央告着说：

“医生，我求求你，我恳求你，请你把他治好，俺兰考是个灾区，俺全县人民离不开他，离不开他呀！”

在场的人都含着泪。医生说：“焦裕禄同志的工作情况，在他进院时，党组织已经告诉我们。癌症现在还是一个难题，不过，请你转告兰考县的群众，我们医务工作者，一定用焦裕禄同志同困难和灾害斗争的那种革命精神，来尽快攻占这个高地。”

焦裕禄又被转到郑州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焦裕禄病危的消息传到兰考后，县上不少同志去郑州看望他。县上有人来看他，他总是不谈自己的病，先问县里的工作情况，他问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问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问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怎样？问老韩陵地里的泡桐树栽了多少？……

有一次，他特地嘱咐一个县委办公室的干部说：

“你回去对县委的同志说，叫他们把我没写完的文章

写完；还有，把秦寨盐碱地上的麦穗拿一把来，让我看看！”

5月初，焦裕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县委的一位副书记匆匆赶到郑州探望他。当焦裕禄用干瘦的手握着他的手，两只失神的眼睛深情地望着他时，这位副书记的泪珠禁不住一颗颗滚了下来。

焦裕禄问道：“听说豫东下了大雨，雨多大？淹了没有？”

“没有。”

“这样大的雨，咋会不淹？你不要不告诉我。”

“是没有淹！排涝工程起作用了。”副书记一面回答，一面强忍着悲痛给他讲了一些兰考人民抗灾斗争胜利的情况，安慰他安心养病，说兰考面貌的改变也许会比原来的估计更快一些。

这时候，副书记看到焦裕禄在全力克制自己剧烈的肝痛，一粒粒黄豆大的冷汗珠时时从他额头上浸出来。他勉强擦了擦汗，半晌，问道：

“我的病咋样？为什么医生不肯告诉我呢？”

副书记迟迟没有回答。

焦裕禄一连追问了几次，副书记最后不得不告诉他说：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听了这句话，焦裕禄点了点头，镇定地说道：“呵，我明白了……”

隔了一会儿，焦裕禄从怀里掏出一张自己的照片，颤



颤地交给这位副书记，然后说道：“现在有句话我不能不说了。回去对同志们说，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党相信我们，派我们去领导，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副书记再也无法忍住自己的悲痛，他望着焦裕禄，鼻子一酸，几乎哭出声来。他带着泪匆匆地告别了自己的战友……

谁也没有料到，这就是焦裕禄同兰考县人民，同兰考县党组织的最后告别。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了。那一年，他才42岁。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中共河南省委和开封地委有两位负责同志守在他的床前。他对这两位上级党组织的代表断断续续地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他死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他没有死，他还活着

事隔一年以后，1965年春天，兰考县几十个贫农代表

和干部，专程来到焦裕禄的坟前。贫农们一看见焦裕禄的坟墓，就仿佛看见了他们的县委书记，看见了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那个人。

一年前，他还在兰考，同贫下中农一起，日夜奔波在抗灾斗争的前线。人们怎么会忘记，在那大雪封门的日子，他带着党的温暖走进了贫农的柴门；在那洪水暴发的日子，他拄着棍子带病到各个村庄察看水情。是他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的红灯，照亮了兰考人民自力更生的道路；是他带领兰考人民扭转了兰考的局势，激发了人们的革命精神；是他喊出了“锁住风沙，制伏洪水”的号召；是他发现了贫



焦裕禄同志生前在田间劳动的情形。（新华社稿）



下中农中革命的“硬骨头”精神，使之在全县发扬光大……这一切，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呵！谁能够想到，像他这样一个充满着革命活力的人，竟会在兰考人民最需要他的时候，离开了兰考的大地。

人们一个个含着泪站在他的坟前，一位老贫农泣不成声地说出了 36 万兰考人的心声：

“我们的好书记，你是活活地为俺兰考人民，硬把你给累死的呀。困难的时候你为俺贫农操心，跟着俺们受罪，现在，俺们好过了，全兰考翻身了，你却一个人在这里……”

这是兰考人民对自己的亲人、阶级战友的痛悼，也是兰考人民对一个为他们的利益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的最高嘉奖。

焦裕禄去世后的这一年，兰考县的全体党员，全体人民，用汗水灌溉了兰考大地。三年前焦裕禄倡导制订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经过三年艰苦努力，已经变成了现实。兰考，这个豫东历史上缺粮的县份，1965 年粮食初步自给了。全县 2574 个生产队，除 300 来个队是棉花、油料产区外，其余的都陆续自给，许多队有了自己的储备粮。1965 年，兰考县连续旱了 68 天，从 1964 年冬天到 1965 年春天，刮了 72 次大风，却没有发生风沙打死庄稼的灾害，19 万亩沙区的千百条林带开始把风沙锁住了。这一年秋天，连续下了 384 毫米暴雨，全县也没有一个大队受灾。



1966年，兰考县已经有一半盐碱地经深翻、改良土壤后，变成了良田。垭阳公社黄口大队13队在盐碱地上取得亩产百斤皮棉的好收成。这是社员们正在晒棉，准备把棉花卖给国家。（刘俊生摄 新华社稿）

焦裕禄生前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正由36万兰考人民在兰考大地上奋力集体完成。在这篇文章里，兰考人民笑那起伏的沙丘“贴了膏药，扎了针”^①，笑那滔滔洪水乖乖地归了河道，笑那人老几辈连茅草都不长的老碱窝开始出现了碧绿的庄稼，笑那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压在人们头上的

^① 这是焦裕禄生前总结兰考人民治沙经验说过的两句话。“贴了膏药”是指用翻淤压沙的办法把沙丘封住；“扎了针”是指在沙丘上种上树，把沙丘固定住。



大自然的暴君，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不能再任意摆布人们的命运了。

焦裕禄虽然去世了，但他在兰考土地上播下的自力更生的革命种子，正在发芽成长。他一心为革命，一心为群众的高贵品德，已成为全县干部和群众学习的榜样。这一切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已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推动着兰考人民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大道上继续前进。

焦裕禄同志，你没有辜负党的希望，你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兰考人民将永远忘不了你。你不愧为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好党员，不愧为党的好干部，不愧为人民的好儿子！你是千千万万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巍然屹立的共产党员英雄形象的代表。你没有死，你将永远活在千万人的心里！

1966年2月4日

（本文与冯健、周原同志合写）

豫东灾区采访笔记

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河南的豫东灾区中，一个重灾区，全和
三六六农业人口在荒废的时候，外出的人
比在的人多，人们在大年逃往西北和中原各地，
每天车站上挤满了准备外逃的人，因此
这个“逃往西北”的口号，当时曾广泛地
也知之者，与昔日家叔济，不救济就外逃的
话。

这个地区的水灾不少，人称三灾。
一九六二年秋，为李派焦裕禄同志来
里考察。那时正是灾害最严重的时候，粮食
几乎绝了，一切工作集中全部力量从事农民救济。
但仍因不住外逃之话。群众说，干得不安心
灾区，集体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到处

节选穆青笔记



是一位活跃状态。……和上级机关，随时、整天忙于奔命，实际上只是以一个供给部的作用。

焦裕禄同志一到兰考，看到兰考的荒沙水碱，就禁不住说：这地方真糟呀！兰县确是年轻的好地方。他下决心要改变兰考的面貌。

但当时干部们被灾难压着不气，时以要兰考的干部缺少信心，少数人根本不愿意在这里工作，害怕困难更害怕犯错误。精神状态极不乐观。

焦裕禄说：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群众在灾难中两眼望着干部，干部挺不起腰杆，群众就没有身骨。干部不顶，水牛掉井。要改变兰考的旧貌，必须改变干部的思想。改变干部的精神面貌。

首先

首先，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了所有干部，召开临时常委会。人们到齐后，他正

再访兰考

这些天，我的心情一直平静不下来，我怀着对焦裕禄同志深切的怀念工作着、学习着；这位共产主义战士伟大而光辉的形象，时时刻刻在激励着我，鼓舞着我，教育着我。

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情，最近我又一次访问了兰考。

我第一次访问兰考，是在去年12月下旬的一个大冷天。在县委简朴的会议室里，县委的同志们，向我们介绍了兰考的情况和焦裕禄同志的事迹。从他风雪送粮到车站开会，从追洪水、探流沙到树立样板，从教育干部到关心群众；一件件事实，一个个场面，是那样强烈地震荡着我们的心。特别是他同贫下中农之间，那种深厚的阶级感情；他同病魔顽强斗争时那种忘我的、高尚的品德；他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那种知难而进，敢于在惊涛骇浪中开顶风船的革命性格，强烈地感染着我们，在我们每个人心里激起了汹涌的革命浪潮。那几天晚上，我从没有好好地睡过一夜，一躺在床上，焦裕禄同志的动人事迹，就像电影镜头一样，一幕幕地展现在我的眼前。他的英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鲜明，



越来越高。我觉得他的所作所为，处处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他和贫下中农间那种血肉般的联系，他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的忘我精神，正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尚的品德，他真不愧为县委书记的好榜样。在伟大的革命事业中，我们是多么需要像他这样的好党员、好干部呵！

这次重访兰考，我又东奔西跑访问了好几个村庄。我看到勤劳的兰考人民，高擎着自力更生的旗帜，以兰考大地为纸，饱蘸滔滔不尽的黄河水，正在继续完成焦裕禄同志没有写完的那篇改天换地的文章。而这一切，再一次深深感动了我，教育了我。

在秦寨，这个被焦裕禄同志树为兰考县“四杆旗”之一的生产大队，人们正在向白茫茫的老盐碱地大进军。他们说，老焦临死前躺在病床上，还一心想着俺秦寨盐碱地上长的麦穗；咱贫下中农要是治不住盐碱荒地这一害，就对不住党，对不住俺们死去的老焦；咱就是软骨头。

2月中旬，按节令才立春，红杏枝头刚刚吐蕾，杨柳还未发芽。但在兰考大地上，春天已经提早来了。全县每天有12万人，起早贪黑地投入了改造大自然的战斗。陇海铁路两侧不长庄稼的古盐碱荒地，正在被改造成台田、方田；低洼易涝地区，人们在挖河、修渠，一个完整的排涝系统正在形成；飞沙地里，人们在赶季节栽种泡桐、果树和荆条；高地、平地上，一批机井正日夜开工，这里将逐步改造成

为园田化的、稳产高产的地区。

在土山寨，我访问了贫农王连备。握着他那一双崩满了血口子的手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这位 50 来岁的朴实农民，就是用他这一双战天斗地的手，来纪念同他心连心的人的。

1963 年冬天，土山寨一连八季绝收。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压得很多人喘不过气来。一个风雪天，焦裕禄踏着半尺厚的积雪，走进王连备的茅屋。这时，王连备一家七口，缺衣少食，生活十分艰难。焦裕禄走进门来拨拨灶下没有火，看看锅里没有饭。他转过身站在床前，掀开那条破旧的毯子，只见三四个孩子穿着单衣挤在草窝里。他抱起一个最瘦小有病的女孩，摸着孩子的小脸，眼泪止不住地往下直掉。他说：“这都是自然灾害这个强盗给我们带来的苦难……”他给王连备一家批了救济布，救济款，嘱咐他快给孩子们把棉衣穿上。几天以后，他第二次又来王连备家，具体解决了给孩子看病的困难。这时，焦裕禄同王连备并肩坐在灶窝里，他指着地上的一根草棍对王连备说：“咱们贫农可不能像这个草棍这样老躺在地上不动。”说着他把草棍慢慢扶直起来。他说：“国家的救济就好比这样扶你一把，要想站起来，还得靠自己。”他问王连备：“你能出力吗？”王连备说：“能，庄稼人有的是力气。”第二天，他就派人给王连备送来一把铁锹和一辆架子车，让他去给粮站拉



脚。以后，王连备家生活有了着落，孩子的病也治了，两口子便积极地参加了除“三害”的斗争。

过了些时，焦裕禄又来了，一进门便问：“孩子的病好了吗？”王连备两口子一同说：“好多啦！”焦裕禄看到孩子果然比以前胖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会跑吗？来，下床走几步我看看。”孩子下床走了几步，焦裕禄连忙把孩子抱起来，紧紧地搂在怀里。王连备两口子看在眼里，感动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就这样，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焦裕禄一连到王连备家探望了六次。他不仅关心着王连备一家大小的生活，更关心着王连备思想觉悟的提高。他每次都给王连备讲些愚公移山、奋发图强和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道理，也从王连备那里了解不少抗灾的办法，听到不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深厚的阶级感情，使他和王连备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了。

以后，王连备听说焦裕禄病倒了，曾几次利用到县里拉粮的机会想去看看他，但几次都没有找到。有一次他又到县委去问，有人告诉他说焦书记下乡去了，他只好失望地走出来。这一次他拉了800斤粮食，车子非常重。走到县城北门外上一个高坡时，他走走停停累得浑身大汗，怎么也拉不上去。正在这时候，他忽然觉得车子一轻，一股很大的推力一直把他推上了坡顶。他连忙回过头来一看，

不禁吃惊地叫道：“焦书记，是你呀！”焦裕禄猛抬头一看，也笑着说：“呵呀，连备，我还没看出是你哩。”原来焦裕禄和几个同志骑着车子从乡下回县，看到他拉不上去，就一齐下车帮他推起来。

王连备一把拉着焦裕禄，往路边一坐，说：“我正要来看你哩，听说你病了，好了没有？看你瘦成这样子，还帮我推车子……”

焦裕禄说：“我没啥病，瘦是叫自然灾害欺负的，什么时候咱把自然灾害制伏了，我就会吃胖的。”说罢，哈哈大笑起来。停了一会儿，他又用责备的口吻对王连备说：

“你身子没恢复好，为啥拉这么重的车？”

两个人亲亲热热地谈了老半天，才恋恋不舍地分手。从这次以后，王连备再也没有看到过焦裕禄。

这最后的一别，是一幅多么动人的、寓意深刻的图画呵：一个共产党员、县委书记，受了党的委托，谨记着毛主席的教导，亲手把自己的阶级弟兄，一个个推上了高坡，送上了坦途！

焦裕禄逝世的消息传来，王连备一家大小难过了好几天。以后，他就把对焦裕禄的怀念变成力量，全部用在劳动上。当年焦裕禄给他的那把铁锹，木把已经磨细了好多。每次当他攥住这把铁锹，他就想起了老焦。这个在旧社会经历过多少辛酸，被自然灾害拔拉了几个个儿的老贫农，



1966年，穆青在河南农村。



用牙咬着嘴唇，一声不吭，一个劲儿地在挖河工地上挖呀挖呀。一双手崩了许多血口子，他还是一声不吭地挖呀，挖呀……

这两年，土山寨大队翻了身，他全家日子好过了，有了新的棉衣，但他整天还是穿着当年焦裕禄救济他的那件旧棉袄。他说：“我穿着它打心眼里觉得暖和，觉得有劲。”我去访问他的那天，谈起这件棉袄，他说他要变个主意。他准备脱下来，把它拆洗缝补一下，放起来不穿了。他说：

“人不在了，东西不能让它再没了。以后，啥时候看见它，啥时候就能想起共产党、焦书记对俺的好处。”

几句朴素的话，表达了多么深厚的阶级感情啊！

赵垛楼的老饲养员刘宗行，是焦裕禄到兰考以后，向全县推荐的第一个贫农英雄。灾情严重的1963年，村里一部分人到丰收区逃荒去了，把集体的7头牲口都撇给了他。他看见牲口那么瘦，心里很难过。他把牲口拉到家，拍着牲口说：“只要我死不了，你就死不了。”那时候，一无草，二无料，喂7头牲口能是容易的事吗？刘宗行全家8口人，每天出去拣树叶、挖草根不让牲口亏嘴。冬天，冻土坚硬，茅草根非常难挖，刘宗行的二女儿累得吐血，脚上手上的皮褪了一层又一层。他的三儿子是个瘸子，也天天爬在地上给牲口拔草。一个冬天，全家辛辛苦苦总共挖了18万斤草根。牲口没有料，家里只剩下150多斤红薯干，刘宗行每天抓一把喂牲口，等到他老伴发觉的时候，已经喂完了。他老伴问：“咱那些红薯干哩？”刘宗行说：“不是你吃啦？”他老伴顿时明白了，是老头子自己舍不得吃，拿去喂了牲口。她感动得流着泪，再也不问下去了。春天，青黄不接，牲口草没有了，刘宗行把一亩自留地里的麦苗也全割下来喂了牲口。结果，七头牲口都保存下来了。

有一天，焦裕禄来到他的饲养室里，拉着他的手，肩并肩坐在地铺上，请他介绍经验。他实打实地把自己喂牲



口的经过和难处，给焦裕禄说了。焦裕禄眼里含着泪水听完了刘宗行的话，说：“你谈出了喂牲口的最重要的经验，我要带你到全县去做报告。”后来，焦裕禄又到刘宗行的饲养室来过几次，两个人从此变成了知心人。刘宗行每次到县上来总要去看看焦裕禄。他说：“只要能见见他，听他说说话，就觉得心上有劲。”有一次县上奖励劳模，焦裕禄问刘宗行想要什么？刘宗行说：“你给我一身皮袄，我也不稀罕；给我一辆架子车让我拉肥垫圈吧！”他这种处处为集体的精神，得到焦裕禄衷心的称赞。

这两年，队上考虑他年纪大了，喂牲口的活太累，想让他休息，可是刘宗行坚决不肯，他说：“我要干到死，不说年纪。”

离开兰考的前一天，我又特地到许贡庄去访问了贫农孙玉堂，这是焦裕禄生前一再表扬的贫农硬骨头中的代表人物。在灾荒最严重的岁月里，他曾离开过许贡庄到外地逃过荒，在焦裕禄的教育帮助下，他从一个灾民变成了抗灾斗争中的英雄。他第一次见到焦裕禄是在一次全县干部的集会上。当时焦裕禄说：“咱穷人在旧社会给地主扛长工，那时说咱没吃没喝，有理；现在，权是咱的，地是咱的，咱又不缺胳膊少腿，为啥自己不能养活自己？”为这几句话，孙玉堂和生产队长宋保中，头抱头哭了半天。从此，他们领导社员烧窑卖砖，挖沟修田，决心奋发图强、自力更生。

他们四次退回国家的救济粮，十几次退回国家的救济款，把公社送来的一粒粮、一分钱都让给了最困难的兄弟队。

孙玉堂说：“当许贡庄硬着腰杆子站起来的时候，老焦又费了多少心血呵！许贡庄的贫下中农中，哪家的面缸，他没有看过？哪家的锅盖他没有揭过？有时是天亮，有时是黄昏，他在村边转来转去，只怕俺贫下中农受屈。”

1963年冬天，孙玉堂在窑上烧砖，只穿了一件破夹袄，因为没有睡足过觉，两眼熬得通红。焦裕禄同志来到窑上，蹲在他跟前关切地问道：“国家救济你一件棉袄吧？你顶不住冷。”孙玉堂挺挺胸脯说：“黑里白里在窑上，不冷，我不要。”焦裕禄就喜欢他这种硬骨头精神，说他穷，穷得有志气！

孙玉堂有一个坚强的性子，他深沉的感情，不大容易外露，但是提起焦裕禄来，仍免不了多次避过脸去偷偷地擦泪。许多人都说，焦裕禄生前为许贡庄操碎了心。现在，他的坟地正选在许贡庄的旁边，从坟地的高坡上，可以看到许贡庄贫下中农一片耀眼的新瓦房。正像孙玉堂所设想的那样：“让焦书记天天看着俺许贡庄的变化吧。”

全兰考有149个大队，36万群众，我两次到兰考，所接触的只不过是其中的极少数。兰考人民对党、对焦裕禄同志的深情，比山高，比海深，这里记述的几个故事，也不过是高山之一砾，沧海之一粟。



焦裕禄同志的革命精神，不仅感动了兰考的干部和群众，而且越过高山大河，在全国亿万人民的心目中，树起了一块光辉的样板。

在县委停留的最后一天晚上，对着微弱的灯光，我拆看了第一批从全国各地寄到兰考的信件，那是一些多么激动人心的文字呵！人们用满腔的激情，和一颗颗火热而赤诚的心，向兰考党组织，向焦裕禄同志的战友和家属，倾诉了自己的心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他们当中，有些人沉痛地检查了自己的缺点，下决心要向焦裕禄同志学习，有些人要求兰考县委能够允许他们到兰考最艰苦的地方锻炼。有些人怀着深沉的阶级感情关怀着兰考的群众，兰考的生产；有些人还不留姓名地为兰考的群众寄来了《毛泽东选集》或其他御寒的衣物。有一封来自吉林边远地区的信件，向县委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请给我寄来兰考大地上的一撮沙土吧，焦裕禄同志曾为它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要把它当作鞭策自己的力量！”另一封信上，一个在艰苦地区工作的同志，坦率地叙述了他过去如何不安心工作的情况，看了焦裕禄事迹以后，他在信的末尾，用鲜血写下了这样几个大字：“决心干一辈子！”

读着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信件，我禁不住心潮澎湃，热泪盈眶。透过一张张信纸，我深深地感觉到我国人民高涨的革命激情和巨大的战斗力量。是什么，使这些素不相

识的人亲如骨肉？是什么，把这些山南海北的人，在感情上紧紧地融合在一起？它不是别的，是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理想；是焦裕禄的革命精神；归根结底，是光辉的毛泽东思想。

当我再一次告别兰考，回到郑州的时候，骤然大雪弥漫，气温下降到零下十一二度。广播里传来江苏、安徽的消息：那里的广大干部，冒着风雪，踏着焦裕禄的脚印，走进贫下中农的门坎，问寒问暖，解决群众的困难去了。新闻虽然十分简短，但它反映了一个可喜的趋向：一个焦裕禄不幸逝世了，成千上万个焦裕禄，必将不断涌现，不断成长。我想：这就是当代我国可以在全世界引以自豪的最大的特色。

1966年3月



人民呼唤焦裕禄

进入 90 年代，在中华大地兴起学雷锋新潮的同时，人们深情地呼唤着另一个名字——焦裕禄。

在这声声呼唤中，我们三个当年采写焦裕禄事迹的老记者重访兰考，专程到焦裕禄墓前敬献花圈。花圈的挽带上写着“焦裕禄精神永存”七个字，表达了我们对这位忠



1990 年，穆青、冯健、周原向焦裕禄墓敬献花圈。

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人民的好儿子的崇敬和思念。

焦裕禄去世已经 26 年了。兰考人民在黄河故堤的一个沙丘上，修建了焦裕禄烈士陵园。陵园里，参天的泡桐绿荫蔽日，蓊郁的松柏密密环绕。白色大理石砌筑的墓地上竖立着一面屏壁，上面镌刻着毛泽东的题字：“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我们默默地站在墓前，望着那高大的墓碑，环顾兰考大地，思前想后，禁不住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一)

24 年前，当我们第一次踏上兰考这块苦难的土地，兰考的“三害”——内涝、风沙、盐碱还在猖獗地为害人民。一年 365 天，多一半漫天黄沙飞扬。我们住在县委招待所，清晨起床，衣被上总是蒙着一层黄尘。白色的盐碱每年不仅要碱死几万几十万亩禾苗，还侵蚀着千家万户的墙脚和锅台。内涝渍死了大片庄稼，有幸捉住苗的，一亩地打下几十或上百斤粮食就是上好年景。

今天，兰考 1800 平方公里大地和 98 万亩耕地，大变了样了。

“看到泡桐树，想起焦裕禄。”这是传唱在兰考的一首新民歌。焦裕禄当年为了防风固沙，帮助农民摆脱贫困，



1990年6月，穆青、冯健、周原在兰考焦裕禄生前种的泡桐树前合影。

提倡种植泡桐。20多年过去，兰考全境的飞沙地、老洼窝、盐碱滩，都已经长起大片大片纵横成网的泡桐林了。1963年焦裕禄亲手栽下的那棵麻秆粗的幼桐，已经长成双人合抱的大树，人们亲切地叫它“焦桐”。全县半数以上的耕地实行了农桐间作，一亩地每年仅桐树就可以增值200到240元。我们一路所见，不仅在兰考，而且在豫东平原，在中州大地，在千里公路沿线，在雄伟的黄河大堤，到处都是亭亭的泡桐英姿，到处都是绿色的海洋。

东坝头是黄河下游一个最险要的地段，从三门峡、花园口奔泻而来的黄河激流，在这里按照人们的意志，回旋了一个马蹄形，从巍峨的石坝脚下乖乖地折向东北，奔向

大海。滔滔黄河历史上多次泛滥，给这一带留下了 271 个大大小小的沙丘。每当刮起 5 级以上大风，黄沙蔽日，天昏地暗，一夜之间沙丘就能搬家。24 年前，我们来这里采访，举目黄沙茫茫，不见树木。这次，我们再访东坝头一带，茫茫黄沙已经不见踪影，眼底尽是一望无际的麦海。农民开着汽车、拖拉机，赶着牛车，正忙着收割麦子。微风起处，漾起层层金色的麦浪，一个个旧日的沙丘，变成了郁郁葱葱的刺槐林，极目望去，宛如飘浮在金色麦海里的一个个绿岛。

我们沿着曲径登上名叫“九米九”的大沙丘。头上绿叶盖顶，脚下青草铺地，林子里阵阵凉风宜人。盛夏的阳光从华盖般的槐叶缝里流泻下来，像撒下一条条金色丝线。



2018 年 6 月 19 日在河南兰考东坝头乡张庄村附近拍摄的蜿蜒的黄河河道。（新华社记者冯大鹏摄）



24年前，我们曾吃力地爬上这个沙丘，流沙灌满了我们的鞋袜。那时，沙丘顶上刚刚种上稀疏的刺槐苗，迎着寒风有气无力地摇曳着。

邻近“九米九”的下马台，原是临大路的一个村庄。因为沙丘移动，村舍、水井被淹没，村民弃家外逃，这里就变成了一个方圆50亩的大沙丘。焦裕禄从1963年春天开始，组织农民在这里挖泥封沙，栽种刺槐，如今也早已成林了。

72岁的护林老人王心茂告诉我们：“下马台大沙丘今天变成了‘元宝垛’，全靠老焦当年领着大伙种树治沙。”王心茂一家人就住在林中小屋里，年年月月守护着这片焦



1990年穆青、冯健（左一）、周原（右一）重访兰考时与农民亲切交谈。

书记留下的林子。他爱树如命，说：“谁要砍死一棵树，就是砍我一条腿；谁要撅折一根树枝，就是断我一个指头，我决不答应！”这句话，表达了老人对党、对他心目中的焦书记多么深沉的感情啊！

当年受到焦裕禄称赞的“四杆旗”之一的韩村，也许是兰考农村今昔变迁的一个缩影。

韩村周围是洼地，常年渍水，土地碱化。24年前我们来这个村访问时，饥寒交迫的农民含着泪告诉我们：1962年全村27户人家，每人只分得老秤12两高粱穗。贫穷像蛇一样缠着这个村庄。在那许多人感到沮丧的年代，他们人穷志不短，硬是不要国家的救济粮和救济款，自力更生，到老洼窝里割草卖草，换来三头毛驴和农具，忍饥挨饿，坚持生产。就在这个时刻，焦裕禄来到韩村，他从韩村人身上看到了千斤重担不弯腰的志气，深深地被感动了。他把韩村的代表请上表彰大会的主席台，号召全县学习他们的精神。这次我们又到韩村，看到人们引来的黄河水把洼地淤高了，低洼的荒草窝长出了一坡好麦子、好花生，昔日的盐碱地也种上了棉花。当年的茅屋都换成了一色的砖瓦房。全村51户，有22户买了拖拉机。

我们怀着急切的心情，来到兰考火车站。20多年前，这里的一切令人触目心酸。那时冬春季节，有多少兰考的灾民在这里啼哭饮泣，有多少家庭在这里骨肉离散。站台



1986年3月，穆青和周原在兰考考察当年的沙丘。

上堆着从全国各地运来的救灾粮，站内站外，货运列车的棚顶上，都坐着衣衫褴褛的灾民。这一切，仿佛是我们昨日所见，依稀历历在目。而眼前，车站的一切完全变了。整洁的站台修了花坛，东来西去的客货列车井然运行。新建的75000平方米货场可以同时装卸100多个车皮。最近5年，兰考火车站每年平均装车外运的粮食、棉花、桐材、油料等有1亿多公斤。焦裕禄深夜到火车站含泪看望农民弟兄离乡背井、外出逃荒的凄苦场景，已经作为历史的一页翻过去了。

焦裕禄临终前曾说：“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党组织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

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多年来，兰考的党和政府抱定“一张蓝图画到底”的决心，领导人民改天换地。焦裕禄用生命绘制的那张蓝图，今天已经变成兰考大地的现实。

兰考人深情地说：“咱焦书记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二）

曲曲折折的历史没有磨灭刻在人民内心深处对焦裕禄的思念。随着时光的流逝，一种呼唤焦裕禄的激越之情，像江河大海的波涛，在共产党员心中，在人民群众心中，更加激荡不已。

今年以来，已经有 30 多万人来到焦裕禄墓前凭吊。

当年那个大雪封门的日子，焦裕禄去梁孙庄推开柴门访问过的那位老人梁俊才已经去世，双目失明的张晴老大娘还健在，已经 89 岁了。她还记得，那天她用颤抖的双手上上下下摸着焦裕禄，问：“你是谁？”焦裕禄说：“我是你的儿子！”去年，张晴大娘家里收获 1000 公斤小麦，750 公斤花生。今年清明节，她要人拉着架子车专程送她到焦裕禄坟前，按照农村古老的习俗烧了一堆“纸钱”，她说：“如今俺富了，老焦有钱花吗？”

一个又一个农村妇女，从家里带来新蒸的白面馒头，



摆在焦裕禄墓前，哭着喊着，要他们的焦书记走出墓来尝尝味道。他们永远忘不了，焦裕禄和他们一起吃糠咽菜的艰难日子；永远忘不了焦裕禄端起大家凑来的“百家饭”，眼泪簌簌滚下来的情景。如今家家过上了好日子，焦书记却不回来了。

埭阳乡刁楼村 70 多岁的老农马全修，身患关节炎，走路靠双拐。今年清明节，他披着老羊皮，艰难地走了十几公里路，来到墓前，恭恭敬敬行了三鞠躬礼。他对陵园工作人员说：“老焦是万里挑一的好人呀！我怕活不久了，趁还能走动，赶来看看他。说不定啥时候死了，想来也来不了啦！”

从葡萄架村来的一位 60 来岁的妇女，在墓前哭得很伤心。工作人员问她：“有什么为难事？”她说：“我只有一个儿子，自从娶了媳妇，再也不肯管我了。我生他时，生活多么艰难啊！焦书记关心我，救济过我，还送我一块喜庆的红布。那时候，吃不上，喝不上。如今吃喝都有了，儿大心变了。一生孩子的气，我便想起老焦，想起那块红布。唉，要是老焦在，这种事他能不管吗？”

陵园工作人员还对我们谈了一件事：清明节前，陵园松林里一位来自民权县的老农踽踽独行。问他来干什么，他说来看看。问他的姓名，他不肯说。工作人员又问：“你心里有什么事？”老农哭了。他说：“我心里有话，没有

地方诉呀，来跟老焦说说……”

群众过上了好日子，思念焦裕禄；群众有了困难，想起焦裕禄；群众心里感到有了委屈，也要到焦裕禄墓前来哭诉。

兰考人心目中，焦裕禄没有死。在村头、田间，在农舍、牛屋，在农村饭场，在夜半梦乡，他们似乎还在跟焦书记倾诉自己的心里话。

广大群众呼唤焦裕禄，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他们是在呼唤党一贯同群众血肉相连的好传统，呼唤党的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好作风。

（三）

焦裕禄去世 26 年了。其间，人民共和国 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走过洒满阳光的坦途，也经历过阴云满天的坎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伟大的里程碑，开始了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

从北京到河南的千里农村，我们看到处处绿树成荫，一派生机勃勃。昔日低矮的茅屋，很少见了，少数富裕的农民又拆去刚住了几年的砖瓦房，盖起了独家独院的小楼。强大的电流给广大农村注入了新的活力，农业生产插上了翅膀，乡镇企业有如雨后春笋，家用电器飞进了寻常百姓家。



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再固守传统的耕作习惯，发出了向科学技术要产量要效益的呼唤。前几年，他们是从城里“抢财神”下乡；近年来，那些先进的农民在庭院在承包田里试验深层开发，自己开始走向农业科学殿堂了。20多年前连捉苗都很困难的黄河故道农村，现在已有成片农田三种三熟、四种四熟了。

特别令人兴奋的是，一批又一批年轻的干部，相继走上了县委书记、县长的领导岗位。他们同千百万农村基层干部一起，长年累月，勤勤恳恳，为党为人民默默地工作着。祖国大地山河巨变，无不凝聚着他们的辛劳和汗水。这些80年代以来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有从农村基层提拔上来的，更多的是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在党的哺育下，他们具有较高的科学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经过实践的磨炼，身上也闪现着60年代县委书记焦裕禄的精神风貌。

他们是新时代大潮中的中流砥柱！

但是，在新形势新任务面前，也有少数干部经不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受到不正之风的影响和腐朽思想的侵蚀。他们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抛到了九霄云外，背离人民，违法乱纪，成为大潮奔泻中的泥沙。

当前，值得严重注意的是，在有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干部作风不正，官僚主义严重，有禁不止，有令不行，甚至滋长了腐败现象。

有的人随意侵犯群众利益，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一切向钱看。群众气愤地把这“三乱”比做新的“三害”。

有的人挥霍公款大吃海喝，群众指着他们的脊梁骨说：“你们把酒杯捏扁了，把筷子吃短了，把椅子坐散了。”

有的人不为群众办事，只顾自己“窝里斗”，对群众疾苦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有的人弄虚作假，文过饰非，还向上邀功请赏，争名争利。

有人的贪赃枉法，胡作非为，不止自己侵吞公款公物盖私房，还为亲朋故旧、七姑八姨谋私利、捞便宜……

有一个老贫困县，十年九灾，被称为“洪水招待所”。全县 128 万亩耕地，有 123 万亩旱不能浇，涝不能排；人均收入 200 元以下，温饱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农民形容自己的苦日子是：“泥巴房子泥巴床，除了泥巴没家当。”这样一个长期贫困的老灾区，那里的干部本该发扬焦裕禄精神，咬紧牙关，艰苦奋斗它几年，领导群众摆脱贫困。但令人痛心的是，1988 和 1989 两年，这个县一面吃着国家救济粮，用着国家救济款，一面竟然作出决定，让下级机关给领导干部“送红包”；而全县得“红包”金额最多的是原县委书记。

这些腐败现象，使广大群众心不平，气不顺，在干群之间、党群之间无形中筑起一道高墙，它隔断了党与群众



的联系，玷污了党的形象，造成了许多不安定的因素。

60年代初，我国外有压力，内有经济困难。焦裕禄那种敢于“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气概，“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自己”的情怀，不啻是黑云压顶时一道耀眼的闪电。正是以这种气概和情怀，我们的党克服了历史上的一个个危难而一往无前。现在，我们国家也面临着外有压力、内有困难的形势，依然需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精神，需要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作风。这就是成千上万人一往情深地怀念焦裕禄、呼唤焦裕禄的真正原因。

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的决定郑重指出：“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决定谆谆告诫全党：“在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共产党员更加需要自觉保持清正廉洁，坚决反对腐败行为。如果听任腐败现象蔓延，党就有走向自我毁灭的危险。”

这历史性的决定，像警钟长鸣！

(四)

我们在河南农村访问，同地委、县委的许多干部交谈。他们在学习焦裕禄的活动中，有深切的感受，有各自的经验体会，内心也有些隐忧。

许多干部尖锐地指出，焦裕禄是县委书记的榜样，学习焦裕禄，重点是领导干部学，不能只领导别人学，自己不学。人民怀念焦裕禄，表现了群众对党的干部的殷切期望。绝不能辜负群众的期望！当“班长”，要事事、处处与焦裕禄相比，在自己身上找差距；要像焦裕禄那样善于团结“一班人”。搞“窝里斗”的，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学不了焦裕禄。

60年代，焦裕禄领导群众同严重的自然灾害作斗争，让兰考群众吃饱穿暖。今天，新的任务、新的困难正考验着我们的干部，学习焦裕禄不仅要领导群众同自然作斗争，还要同侵入自己肌体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进行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斗争比起同自然灾害的斗争还要艰苦得多。县委书记们谈到这一点时，强调说，学习焦裕禄，一定要从世界观上学，要付出代价，作出某种牺牲，经历思想上痛苦的磨炼。不能摆花架子，不能搞形式主义。

书记们谈到焦裕禄“心里装着全体人民”时，都很动情。他们举出许多事例说，只要与群众心连心，处处为群众着想，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群众就信任你、拥护你，工作就会一呼百应；国家有什么困难，群众也会支持国家渡过难关，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如果你心里没有群众，和群众离心离德，违背群众利益，再大的好事，就是干部喊破嗓子，群众也是百呼不应。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真理。



“千金易求，人心难得。”这是自古以来中国人民的箴言，是关系我们党盛衰兴亡的一个大问题。

从兰考到开封，我们瞻仰了曾任开封府府尹，近千年来一直活在人民心中，为人们敬仰传诵的包拯的塑像。这座新建的包公祠里，有一块古石碑，上面铭刻着开封府历届府尹的名字。人们纪念包拯，崇敬包拯，前来参观的人都要站在石碑前抚摸一下他的名字。年深日久，石碑上“包拯”二字被摸出了一片很深的亮光光的凹痕。

我们从包拯又想起了焦裕禄。焦裕禄不是封建社会的“包大人”，他自称是“人民的儿子”。包拯在开封府为官只有一年零三个月，但这位妇孺皆知的“包青天”，留给后人的是几天也讲不完的清正廉明的传奇故事。焦裕禄在兰考实际上也只是工作了一年零几个月，而他却给人民留下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和许多无价的精神财富。

“我是你的儿子。”焦裕禄的这句话，表达了一个伟大的真理。这是一个震撼历史的声音。他喊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的全部忠诚。

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位人民的儿子的英名。

1990年7月9日

（本文与冯健、周原同志合写）



王进喜

“铁人”王进喜常说：“一个人没有血液，心脏就停止跳动。工业没有石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上行的，都要瘫痪。没有石油，国家有压力，我们要自觉地替国家承担这个压力，这是我们石油工人的责任啊！”

他恨不得一拳头砸开地层，让乌黑发亮的原油哗哗地喷射出来……

他说：“我就不相信石油只埋在外国的地底下。总有一天，要使我国石油流成河！”

铁人王进喜

我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大庆油田的英雄代表，铁人王进喜同志逝世已经一年多了。

当人们听到我国石油产品已经做到全部自给的时候，听到在我国辽阔的大地上接连发现令人鼓舞的新油田的时候，谁能不衷心怀念在那艰难的年代，开创大庆油田的闯将，那曾经为发展我国石油工业建立功勋的铁人呢？

人们怀念铁人，不仅由于他对发展我国石油工业做出了卓越贡献，重要的是，他用自己毕生的革命实践，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先锋战士的光辉形象。他为我们留下的“铁人精神”，永远激励着我国人民勇往直前。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铁人

1960年春，正当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一声春雷，传来了我国发现大庆油田的喜讯。遵照毛主席和党



中央的决策，我国石油战线集中优势兵力，在大庆展开一场规模空前的石油大会战。就在这个时候，铁人王进喜，从玉门率领一二〇五钻井队，千里迢迢赶来大庆。

从玉门开往大庆的列车，穿过一座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在祖国原野上奔驰。王进喜禁不住心潮起伏。1959 年在北京出席全国群英会期间见到的一切，重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那是他第一次到北京，看到大街上的公共汽车，车顶上背个大气包，他曾奇怪地问别人：“背那家伙干啥？”人们告诉他：“因为没有汽油，烧的煤气。”听了这话，他没有再问下去。心想：“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没有汽油怎么行呢？我是一个石油工人，眼看让国家作这么大的难，还有脸问？”他越想心里越沉重，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心情也一直不能平静。休息时间，他一个人悄悄地躲在一边，闷着头抽烟……

每当想起这些，他感到那煤气包像千斤重担压在自己的身上。他曾多次向战友们说：“一个人没有血液，心脏就停止跳动。工业没有石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上行的，都要瘫痪。没有石油，国家有压力，我们要自觉地替国家承担这个压力，这是我们石油工人的责任啊！”

王进喜和他的战友们，就是带着这种要为国家承担压力的高度责任感，来到了大庆。当他看到天南海北前来参



1959年，被誉为“铁人”的大庆油田一二〇五钻井队队长王进喜（中）和工人们在井架上。（新华社发）

加会战的几万名战友，看到铁路沿线摆了几十里长的堆积如山的设备器材，看到就要开发的一望无边的大油田的时候，浑身充满了力量。他满怀激情地站在大荒原上，随手扒开积雪，从地上抓起一把土来，嘿！这是什么样的土啊？黑乎乎的！这时，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覆盖在这黑土下大片大片的油层。他撩开身上的老羊皮袄，大声地对战友说：

“看，这儿就是大油田，这回咱们可掉进大油海里了！同志们，摆开战场，甩开钻机干吧！把石油落后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



当时，那股高兴劲，使这个性格刚强的老工人，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在旧社会，他6岁拿起讨饭棍，拉着被地主逼瞎了双眼的父亲四处讨饭的时候，他没有流过眼泪；八九岁给地主放牛羊，成年披着件破羊皮，光着下身，赤着脚在大山里跑，动不动挨地主棍棒的时候，也没有流过眼泪；刚15岁，他被拉进玉门油矿当苦力，满身被把头、矿警和美国“技师”用鞭子、青铜棍抽打得一道道血印子的时候，他压抑住满腔怒火，从来没有流过眼泪。而今，在毛主席的号召下，眼看全国石油战线千军万马会师大庆，一场开创中国石油工业广阔前景的大会战，就要在这里打响了，这个老工人，高兴得热泪直流。他恨不得一拳头砸开地层，让乌黑发亮的原油哗哗地喷射出来

三月的大庆，朔风呼号，滴水成冰。一下子几万人从全国四面八方汇集到大荒原上，面临着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没有公路，车辆不足，吃和住都成了大问题。

王进喜带领一二〇五队，一连好几个晚上，围着篝火讨论怎样对待困难。工人们异口同声地说：拿下大油田，哪能没有困难？但是，国家缺油才是最大的困难。我们决不能在困难面前低头，有天大的困难，也要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大油田。

群众那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给了王进喜极大的鼓舞。他向战友们说：“我们工人阶级就要有这样的雄心。

现在我们流点汗，吃点苦，为的是快快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强大，只要国家有了油，咱们再苦再累也高兴。”

王进喜和英雄的大庆工人们，就是这样在困难的时候，困难的地方，困难的条件下，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夺油大战。

那时候，钻机还没有运到，他们天天派人到车站去等。王进喜更是坐不住，睡不稳，到处调查访问，了解地层的



大庆油田钻井第二大队大队长王进喜（左二）和工人们一起钻井。（新华社记者雪印摄）



情况。不几天，钻机到了，但是吊车、拖拉机不够用，60多吨重的钻机躺在火车上卸不下来。大家都很着急。王进喜说：“没有吊车，咱们有人在。毛主席不是说人是最可宝贵的吗？只要有人在，咱们就能想办法把钻机卸下来。”

全队的小伙子们被队长那浑身的劲头和激动的神色所鼓舞，“上呀！”一声呐喊，便行动起来。大家一鼓作气，从清晨干到太阳偏西，硬是用绳子拉，撬杠撬，木块垫，把钻机从火车上卸了下来，运到井场，又花了三天三夜时间，把40米高的井架矗立在大荒原上。

眼看就要打井了，可是，水管线没有安好，开钻没有水怎么行？大伙说，“咱们用盆盆端！”有人不同意，说：“你们见过哪个国家端水打井的？”王进喜理直气壮地说：“就是我们的国家！”

他带领工人们同井场附近的农民一起，终于奇迹般地用人力端来几十吨水，提前开了钻。

1960年4月14日，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巍然的井架披着金色的霞光，井场上一片繁忙，王进喜大步跨上钻台，握住冰冷的刹把，纵情地大喊一声：“开钻了！”这声音威武雄壮，气吞山河！正像王进喜在一首诗中所写的那样：“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

经过五个紧张的日日夜夜，这大庆会战的第一口井终于喷出了乌黑发亮的原油。王进喜和工人们围在井场的周

围，眼看着那高高喷起的油柱兴奋得忘掉了一切，一个劲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这封闭千年的大油田啊，终于乖乖地打开了大门。

这是用世界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方法打出来的油井。这口井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工人阶级，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但战斗的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在第一口井打好以后，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

5月1日，天刚蒙蒙亮，王进喜在井场上指挥工人放井架“搬家”，忽然一根几百斤重的钻杆滚下来砸伤了他的腿。王进喜痛得昏了过去。等他醒过来一看，井架还没有放下，几个工人在围着抢救他。王进喜急了，对大家说：“我又不是泥捏的，哪能碰一下就散了？”说完，猛地站起来，举起双手，继续指挥放井架，鲜血从他的裤腿和鞋袜里浸了出来……

油田领导和工人们把他送进医院。可是在这热火朝天的会战中，他怎能安心住下来呢？一天深夜，王进喜深一脚、浅一脚地从医院回到钻井队，只见他手里拿着拐棍，腿上的绷带沾满了泥。大家赶快帮助他收拾床铺，让他休息。可是，还没有等安排好，王进喜已经拄着拐棍上井去了。

打第二口井的时候，王进喜的腿伤还没有好，成天拄着双拐在井场上来回指挥。一天，轰隆一声，钻机上几十



斤重的方瓦忽然飞了出来：井喷的迹象出现了。

井喷，就是埋藏在地层深处的水、原油和天然气，突然夹带着泥沙，在地层的高压下迸发出来。如不赶快压住，不仅井毁人亡，连那高大的井架也要被吞没到地层里去。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王进喜忘记自己的腿痛，立刻奔上前去。压井喷需要用重晶石粉调泥浆，井场上没有，他当机立断决定用水泥代替。一袋袋水泥倒进泥浆池，没有搅拌机，水泥都沉在池底。这时，王进喜奋不顾身，把双拐一甩，说了声：“跳！”就纵身跳进了泥浆池，用自己的身体来搅拌泥浆。看到这情景，几个年轻小伙子也跟着跳了进去。他们整整奋战了三个小时，险恶的井喷终于被压



铁人王进喜用血肉之躯奋力搅拌泥浆。（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下去了，油井和钻机保住了，王进喜的手上身上却被碱性很强的泥浆烧起了大泡，同志们把他扶出来时，腿疼得使他扑倒在钻杆上，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脸上滚下来。

王进喜哪里是在打井？他简直是在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取石油！在那战斗最紧张的日子里，他成日成夜地奋战在井场上，饿了，啃几口冻窝窝头，困了，倒在排好的钻杆上，盖件老羊皮袄，头枕钻头休息一会儿；天下雨了，头顶雨衣不离开井场。为着一个宏伟的目标，他把自己的一切置之度外。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来抒发自己的革命豪情：“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天南海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干！干！干！”

有一回，他帮助一个井队制服井喷，在井场上两天两夜没有合眼，回到大队时，浑身上下都沾满泥浆，两只鞋用绳子绑着，已经分不清鞋和脚了。吃饭的时候，吃着吃着，碗掉在地上，人却靠在墙边睡着了。工人们见他一天天消瘦，眼眶越来越深陷下去，都关切地要他注意休息，他却说：“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井场附近的老乡们，日日夜夜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们深深地被王进喜这种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感动了，他们向工人们夸赞说：

“你们的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啊！”

从此，“铁人”这个光荣的名字很快便传开了。“向



铁人学习！”“发扬铁人精神！”响遍了整个大庆油田。

在开发大庆油田的日子里，王进喜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在打井上。他不仅使自己所在的井队上得猛，打得快，而且主动帮助别的井队打得快，打得好。别的井队缺少零部件，只要他们有，就马上派人送去；打井遇到困难，他总是亲自带人去支援。他说：“我们一个井队打得再快，也拿不下个大油田，要让所有的队都打上去，超过我们，那才叫人高兴哩！”

为了早日拿下大油田，他争分夺秒地奋战在井场上，不允许任何环节有片刻的耽误，丝毫的差错。有一回，他的井队打完井，射孔层位老确定不下来，不能“搬家”，他就径直跑到地质指挥所去质问。人家劝他不要急，说顶多耽误一会儿打井。他听了这话，当场反驳说：“为什么要耽误一会儿打井？时间是党的，是国家的，谁也没有权力白白浪费！”

他这种严格的精神，不仅对别人，更用来要求自己。一次，他的井队工作出了差错，领导在大会上批评他们。那天，王进喜去晚了一会儿，刚走到会场门口，有个工人对他说：“慢点进去，领导上正批评我们哩！”王进喜爽朗地说：“看你这个同志说的，披红戴花的时候，让我抢着往头里去，受批评了，就叫我躲起来当狗熊，我才不当这个狗熊呢！”说完，他就一直走到前面坐下来。事后，他对那个工人说：

“领导批评我们，是对我们关心，是为了把工作搞好，我们有错误就改，这才叫对工作负责啊！”

他经常对人说：“干工作光有一股子干劲，猛打猛冲是不行的，张飞还粗中有细嘛！打井一定要注意质量。要对油田负责一辈子，就要对质量负责一辈子。”他每打完一口井，都要发动大家认真总结经验。一次，他们队打的一口井，质量稍差些，王进喜干脆让大家推倒重来，并且在以后年年都带领工人去看这口井，要大家记住这个教训。就是检查合格的井，他每隔一段时间也要回去看看，征求采油工人的意见。后来，油田上推广了他们这个“回访”经验，成为一项固定的制度。

1963年，油田指挥部号召打直井，要求井斜由原来的五度缩小到三度。这在当时是很高的质量标准。领导同志问王进喜：“你准备怎样干？”王进喜说：“依靠党，依靠群众，按毛主席的教导去实践。”

回到队上，他和老工人、技术人员一边调查研究地层情况，一边改革钻头钻具，边干边总结经验，终于用40年代的老钻机打出了当时全油田第一口斜度只有二度多的直井，以后又降低到只有半度多，为全油田创造了打直井的宝贵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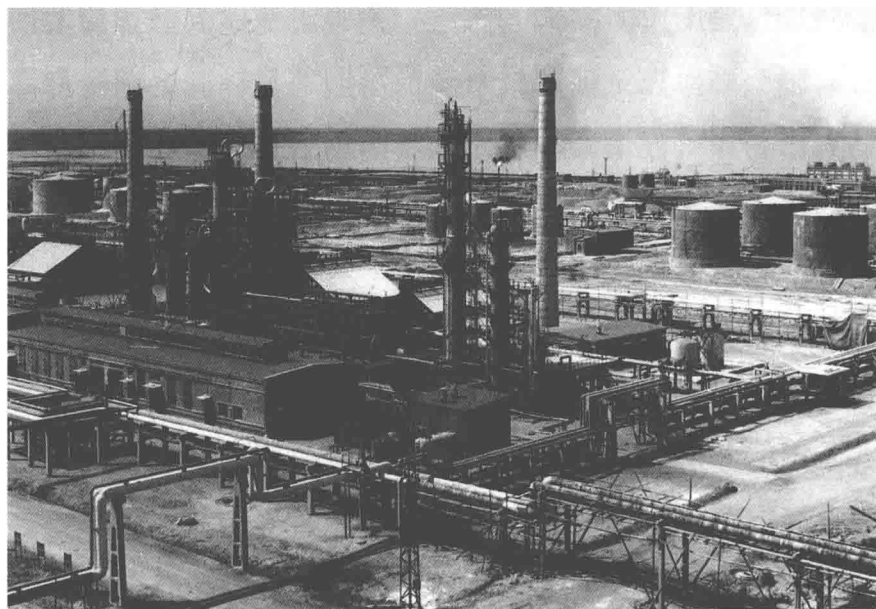
王铁人和英雄的大庆工人们，就是这样，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夺得了石油会战的光辉胜利。1960年6月1日，



大庆运出了第一批原油；会战第三年，便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了大油田，为发展祖国石油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

1963年的一天，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传来：我国石油基本自给了，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铁人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他扬眉吐气，到处同人谈论这件大喜事，同大家分享胜利的喜悦。

1964年，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工业学大庆”的伟大号召。这一年，王进喜代表大庆工人光荣地出席了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见到了日夜思念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当时，他是多么高兴啊，他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滚滚热泪。



1965年拍摄的大庆油田炼油厂一角。

他经常向别人说：“我是个普通工人，没啥本事，就是为国家打了几口井。一切成绩和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的，我自己的小本本上只能记差距。”

在艰难的日子里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1967年初，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阴谋从极“左”的方面破坏大庆油田的生产。他们散布谣言，刮起一股妄图否定大庆道路、砍倒大庆红旗的妖风。一天夜晚，灯火通明的会议室里挤满了人，一场激烈的大辩论正在进行。许多当年参加大庆石油会战的老工人，用亲身的经历愤怒地驳斥他们的无耻诽谤。一个家伙当场跳了出来，疯狂地叫嚣说：“大庆红旗是假的，铁人也是假的。”

王进喜听了，怒火满腔。他把披在身上的老羊皮袄往后一甩，站起来大声说道：“我是铁人还是泥人，关系不大。大庆这面红旗是谁也动摇不了的。大庆，是毛主席的大庆，是全中国七亿人民的大庆。大庆红旗，是大庆工人阶级按照毛主席指引的道路闯出来的。谁敢诬蔑大庆红旗，我们就一拳头把他砸到地底下去！”

铁人的话，说到了大庆工人的心里，全场立即爆发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辩论会成了捍卫大庆红旗的誓师会。群众扬眉吐气，那股妄图砍倒大庆红旗的反动气焰当场被打了下去。

然而，那些人并不甘心失败。他们使出了另外一手，对王进喜进行卑鄙的人身攻击。他们编造了许多谎言陷害王进喜，企图从政治上搞垮铁人，砍倒大庆红旗。

斗争一场接着一场，大庆油田的生产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许多问题引起了王进喜的深思。

一天傍晚，他独自一人来到会战时打的第一口油井的井场上。灿烂的夕阳照射着采油树。这油井，是他和工人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发大庆油田的见证；那泥浆池、卸车台，那当年住过的地窝子，亲手挖出来的土水井，都能说明他和一二〇五钻井队的战友们是怎样走过了创业时期那段艰苦的里程。如今，眼望着大庆油田的宏伟景象，他想，大庆的道路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发展我国工业的道路。大庆的工人艰苦创业为国家生产石油，这有什么错呢？想到这里，他更加坚定了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那些反对大庆的人见造谣和中伤没有压垮铁人，他们又施出了最后的卑鄙手法，妄图用强制手段迫使铁人就范。一天，几个坏家伙暗中策划和操纵一些人把王进喜关进一间密室，手持皮鞭和铁棍，拿出一张事先写好的诬蔑大庆红旗的纸条，强迫王进喜签字。王进喜愤怒极了，冲着那

些家伙斩钉截铁地说：“我识字不多，可是你们写的这几个字我还认得，你们就是把刀架在我脖子上，也别想让我划上一笔！”

这个铁打钢铸的英雄面对一次次残酷的迫害，始终没有屈服。

在“文革”期间最紧张的日日夜夜，王进喜几乎每天都身背干粮袋，步行几十里路，到各个井队去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有个井队的一些人因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提出要“停产闹革命”。王进喜特意从一百多里外赶去，恳切地对大家说：“‘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给我们工人阶级下的命令，我们的生产一分钟也不能停。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油，支援世界革命需要油，我们一定要把革命和生产的重担挑起来。”

有一段时间，王进喜身体不好，多年得下的胃病和关节炎又发作了，经常浑身疼痛。有时半夜痛醒了，他一声不吭，第二天清晨，又照旧背着背包出发了。工人们感动地说：“老铁真是把全部心血都花在油田上了。”

1968年5月大庆革委会成立的时候，广大工人一致推选他担任大庆革委会的副主任，1969年4月他又光荣地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胸怀远大目标

王进喜从一个普通的石油工人成长为党的中央委员，完全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他出生在甘肃玉门赤金村一个贫农家庭，从小讨饭受苦。解放前，他在玉门油矿当了十来年徒工，没有上过钻台，没有摸过钻机的刹把，连一套铺盖都没有捞到。解放后，经过民主改革、反封建把头、诉苦等运动，他觉醒起来，打碎旧社会加在他身上的一切锁链，做了国家的主人。在党的培养下，他当了司钻和钻井队长，思想进步很快。不久，便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起初，王进喜对党有单纯报恩的思想。经过学习他逐渐认识到，共产党员心里要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干革命，单纯报恩是远远不够的。从此，他更加自觉地把打井同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把井场当成革命斗争的战场，一个心眼就是要为国家多打井，打好井。

1959年，全国群英会奖给他一套《毛泽东选集》，他学习毛主席著作更加勤奋、认真。文化程度低，好多字不认识，不会写，这成了王进喜学习的一大难关。但是，他顽强地坚持一边学文化，一边学习毛主席著作。开始学习《矛盾论》的时候，他不会写“矛盾”两个字，就在本子上画了一个贫农、一个地主，用来表示矛盾的意思。一次，他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写了一封信，请人帮助修改，改了

他又抄，一连抄写了二十遍。别人说：“我替你写吧。”王进喜说：“我不是为了写信，我是想学文化，好读毛主席的书。”他经常用一个老工人的话，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我学会一个字就像搬掉一座山，我要翻山越岭去见毛主席！”在大庆石油会战的几年间，他就是用这样惊人的毅力，边学文化边读书，刻苦地通读了《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思想给了王进喜无穷的智慧，给了他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50年代，他率领钻井队，大战祁连山，7年间钻井进尺7万多米，等于旧中国从1907年到1949年42年间全国钻井进尺的总和；60年代，他奋不顾身投入大庆石油会战，为甩掉我国石油工业落后帽子建立了功勋。他常说：“现在，革命需要油，人民需要油，我们国家要有十个八个大庆油田才行。我这一辈子，就是要为国家办好一件事：快快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

在他成为党的中央委员以后，王进喜亲自组织了一个废旧材料回收队，他和工人们一起，风里、雨里、泥里、水里，连一颗螺丝钉、一小块废钢铁都捡起来，为国家回收散失的废旧钢材。

这件事，受到广大工人和干部的赞扬。但有些人不明白王进喜为什么要去关心这样一件琐细的事情，个别人还说什么“搞回收没出息，不光彩”。王进喜把回收队带到十年前会战的第一口井边，对大家说：“艰苦奋斗的传统



永远不能丢。把散失的材料拣回来，重新用来建设社会主义，意义大得很！”

在他的带动下，大庆油田许多单位都成立了回收小队或修旧利废小组。他们把回收来的许多钢材修好配好，重新安装成井架，有的废旧设备修复了再用。王进喜高兴地说：“这些井架、设备，不光大油田用得上，有的还可以交给地方，让大家都打井，都搞油。这样，我们国家石油工业的发展就会更快了。”

当我国发现新油田的喜讯传来，另一场石油会战就要开始的时候，王进喜兴奋得彻夜难眠，恨不得立即带领队伍去摆开新的战场。在大庆讨论支援新油田建设的会议上，他激动地说：“快快拿下新油田，这是有关国家战略方针的大事，我们要选精兵强将，把最优秀的队伍开上去。我主张：给人，要给思想觉悟高的；给物，要给优质的；给设备，要给成套的。保证调出的队伍，开上去就能打硬仗，打胜仗。”

大家一致赞同铁人的意见，很快便组织了一支优秀的队伍，配备成套设备送到新油田。可是，紧接着上级机关又在北京召开第二批支援新油田会战的会议。这一次，大庆油田担负的支援任务比第一次更繁重。有的同志扳起指头一算，大庆油田的人员设备大量减少，油田建设还要迅速扩大，担心将来完不成任务。铁人毫不犹豫地鼓励大家说：“担子越重越光荣，困难越大越有闯头，有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就是千斤重担也敢挑。我们要把建设大庆、

开发新油田的任务都承担起来。”

英雄的大庆工人说得到，做得到，他们坚决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任务。1970年，大庆油田虽然人员设备都减少了，新建的生产能力却大大超过了前一年，原油产量提高百分之三十以上。

1970年春，王进喜受大庆委派，率领代表团到新油田慰问。新油田丰富的资源和沸腾的景象，使王进喜非常激动。他抱病带领大家深入到各个井队、车间、工地，开座谈会，找老工人谈心，征求对支援工作的意见，日日夜夜都在紧张和兴奋之中。一天，他到一个钻井队，遇到了过去的老战友，他把大衣一撂，大步走上钻台，接过刹把就干起来。王进喜兴奋地对老战友说：“我们要想办法争取大钻机一个月在地球上钻它五个窟窿。会有那么一天，打着打着，钻头咕咚一声掉下去，掉到地下大油库里……”铁人的话说得老战友和工人们心里开了花，井场上一片欢笑。

慰问结束后，王进喜带领慰问团的同志立即赶回大庆。有个同志抱怨说：“老铁太不理解我们的心情了，路过北京，也没叫看一看。”王进喜拍着他的肩膀说：“小伙子，你不理解我的心情，快快拿下新油田，咱们可是一分钟也不应该耽误呀！”王进喜回到大庆以后，很快又派出“不卷刃的尖刀”一二〇二钻井队和大批物资，再一次支援了新油田建设。



多少年来，许多外国“专家”一直在散布“中国贫油”的谬论。王进喜从来听不得这些话。他说：“我就不相信石油只埋在外国的地底下。”为了石油，王进喜日日夜夜思虑着，奔波着，战斗着。他身边经常带着一个小本子，每次上级机关开会，他都到技术部门细心地搜集世界各国石油发展情况的资料，详细地摘录：各产油国总产量多少，按人口平均数多少，以及打井、采油的新纪录、新技术等等。他仔细研究这些情况，一心想着怎样更快地把我国石油工业发展上去。他对人说：“井没有压力喷不出油来，人没有压力就干不出好的工作来。”他曾反复地设想过应当组织多少个勘探队，多少个钻井队，要在多长的时间内把我国一切可能含油的地方统统普查一遍。

他豪迈地说：“总有一天，要使我们石油流成河！”

鞠躬尽瘁，奋战终生

1970年4月，王进喜在新油田学习慰问结束，立即又赶到玉门参加石油工业现场会。长时间的过度劳累，使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了。玉门会议没有开完，领导上见他身体很不好，决定派一个医生送他到北京治疗。铁人坐上火车，却一心想着早些赶回大庆去传达会议精神。车过兰州时，医生担心他受不住旅途劳累，再三劝他留在兰州住

一个时期，王进喜怎么也不同意。他忍着病痛坚持说：“没啥，病也是纸老虎，顶它一下就过去了，还是赶回大庆要紧。”

10多年来，严重的胃病和关节炎一直折磨着铁人，但他从不把自己的病痛放在心上。领导上多次要他住医院治疗，他总是那句话：“没啥，老病了，工作这么忙，哪顾得上这些？”有一年，他勉强到一个地方住院疗养，可是，没有多久就待不住了。他觉得耳朵里听不见钻机响，眼前看不见井场沸腾的景象，生活中就像缺少了什么。最后还是提前出院回到了油田。

这一次，他病得很重，经过医生仔细检查，确诊是胃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同志们万分焦急，决定留他在北京住医院。在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下，有关部门集中了北京和一些地方的优秀医生为他治疗。动手术前，领导上把真实的病情告诉了他，铁人镇静地说：“请领导和同志们放心，这没啥了不起，我是共产党员，既不怕苦，也不怕死。”他又鼓励医务人员说：“你们放心大胆治疗，治好了，我继续干革命，治不好，你们也可取得一些经验。”

王进喜住院整整7个月。他身在医院，心里却时刻关怀着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关怀着大庆油田。一天，他听说我国又发现一处新油田，兴奋极了，他对人说：“我们这个国家就是块宝地，不是什么‘贫油’，是‘富油’啊！一定要抓紧勘探，我病好了拼命再干他几十年。”



中央有关部门和大庆的领导同志去医院看望他，铁人又反复提到新油田的事，并且建议大庆回收队成立一个修理车间，把收回来的废旧钢材、井架和钻机都修复起来，大力支持地方搞石油工业。他说：“我们国家石油工业还不发达，我们要想办法多成立地质队、钻井队，把全国可能产油的地方都普查一遍，浅油层交给地方，深处油层由国家开采，这样上下一起办，大家都发挥积极性，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就更快了……”

医院里的医务人员和大庆来探望他的干部、工人们都说：铁人成天思念的、谈论的不是自己的病，而是国家的石油，大庆的生产，新油田的建设。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心也没有离开我国的石油工业！

每次大庆的领导和同志们去看望他，他都要详细地询问：工人们打了多少新井？有什么新创造？还有什么困难问题？

在住院期间，他不仅经常考虑工作上的问题，连职工生活方面的许多细小的事情，也都想得周到。雨季到了，他问职工家属住的房子漏不漏；冬天下雪了，他问油田边远地区家属住地的供水管线冻了没有；听说有的职工调往新油田工作，他又问他们的家属有没有人照顾；连因公牺牲八九年的工人张启刚远在陕西家乡的老母亲，他都一直挂在心上，问老人家生活上有没有困难。他还深情地对回

收队的同志说：“你们回去要养一二百头猪，盖个温室，多种些新鲜蔬菜，逢年过节给每个钻井队送一些去。他们常年在野外打井，最辛苦，流动性大，没有条件搞这些。”

同志们见他说话很吃力，劝他安心养病，先别想这些事。他说：“我是共产党员，怎么能不想……”说着说着，眼睛湿润了。

在昏迷状态中，他经常断断续续地自言自语，讲的都是有关大庆油田的事，好像他已经回到了大庆，在井旁工作着，或和战友们亲切地交谈……1970年11月初，他的病情急速恶化了，已经不能起床，还恳切地对守候在他身旁的医护人员说：“让我回大庆看看吧，我想看看同志们，看看大庆油田。”

铁人想同志们，同志们也想念铁人。他住院期间，每天收到大庆和全国各地的来信，这些信充满了战友的情谊，也带来了许多振奋人心的喜讯。

周恩来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听到铁人病危的消息，曾先后来到医院看望他。

燃化部和大庆油田的领导同志、铁人的老战友们，日夜守候在他的身旁。

剧烈的病痛猛烈地折磨着他。铁人用他那顽强的意志，和病魔展开了最后的搏斗。当他从昏迷中再一次苏醒过来时，这位工人阶级的钢铁战士，用他那模糊的眼神看着身



边的领导同志和战友们，最后握住他们的手，用断断续续的微弱的声音留下了自己的遗言：

“要搞好团结……

一定要把大庆的工作搞好……石油、石油……”

接着，铁人从枕头下边摸出一个小纸包和一个小本子，颤颤地交给守候在他身边的领导同志。当人们打开纸包一看，里面是党组织为他母亲、爱人、孩子长期生病，补助给他的钱。小本子上记着哪年哪月补助多少。这些钱一分也没有动。

看到这情景，同志们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1970年11月15日夜，为我国石油工业奋战了一生的铁人，我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儿子，王进喜同志与世长辞了。

铁人逝世的消息传到大庆，成千上万的大庆工人、干部、解放军指战员、职工家属和孩子们，无不万分悲痛。他们谁也不能相信，这个曾经为开发大庆、建设大庆、保卫大庆而英勇战斗的铁人，会永远离开了他们。一连好多天，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们来到追悼铁人大会的会场，一次又一次含着眼泪向铁人的遗像告别。

一个忆铁人、学铁人的群众运动，迅速地席卷大庆，席卷全国。

1972年1月26日

（本文与高洁同志合写）



吴吉昌

在“文革”中，吴吉昌受到了近百次的批斗。在恐吓和辱骂声中，他始终不屈地回答：“我研究棉花，一不图名，二不为利，我是在完成周总理给我的任务！”

他说：“我不能死，我要活着跟大鬼小鬼斗，坚决完成总理交给的任务！”

“我相信迟早会重见青天。到那个时候，总理把我找去，问：‘老吴同志，任务完成得怎样了？’我能光向总理诉苦吗？我能空手去见总理吗？不行，啥也别想挡住俺！”

为了周总理的嘱托

——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

1966年1月。寒风呼啸，中南海的湖面上披着冰甲。周恩来总理刚在全国第五次棉花生产会议上作完报告，又立即请几十位植棉劳模来国务院会议室座谈。

当头裹白毛巾，身穿黑棉袄的农民科学家吴吉昌进门时，总理指指自己右侧的座位说：“老吴同志，坐这里来。”

总理对大家说：“毛主席又给咱们任务了。主席指示：要粮棉并举，学会两条腿走路；要继续研究解决棉花脱蕾落桃问题。主席把任务交给我，我依靠大家。”

总理和大家亲切地谈了一个多小时。临走时，他握住吴吉昌的手，炯炯有神的目光凝视着吴吉昌说：“我把解决落桃的任务交给你了，你把它担起来！”吴吉昌迟疑地说：

“中，可我是个大老粗，一没文化，二来岁数也大了……”总理打断他的话问：“你多大了？”吴吉昌答：“57。”总理说：“你57，我67，毛主席比我们都大得多。我跟你



说，再过 20 年，我 87，你 77，咱们一起用 20 年时间，把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完成，行不行？”热血涌上了吴吉昌的脸，他紧紧握着总理的手，响亮地回答：“行！”

这就是吴吉昌不平凡的战斗历程的起点。

从此以后，吴吉昌把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的嘱咐，看作党的重托。他准备为此付出自己全部的心血。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为了完成这个庄严的使命，竟会遭遇那么残酷的迫害，经历那么严重的斗争。

十几年来，他走过了一条光荣而又布满着荆棘的道路。



吴吉昌的家在山西闻喜县东镇公社涑阳大队。这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在科学上具有一种顽强的探索精神。人们说，没人去的地方，吴吉昌也要闯三回。他在植棉技术上先后探索创造了“冷床育苗”“芽苗移栽”等九项科研成果，《人民日报》曾发表过社论，推广他的经验。由于他对祖国的贡献，毛主席和周总理曾多次接见过他。

这次他回到家乡，立即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和周总理交给的任务，并组织群众进行了直播、移栽、套种等各种对比试验。吴吉昌日夜在棉田里观察研究，连吃饭都端着碗蹲在地头。人们说“棉花迷”变成“棉花疯”。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吴吉昌十分兴奋，他决心在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但是，他没有想到，这场运动竟带来了无休止的动荡和混乱。林彪和“四人帮”一伙蓄意颠倒敌我，混淆黑白，抛出“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口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在这股阴风的煽动下，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把吴吉昌当作斗争对象。他们攻击他研究棉花是推行“技术第一”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抄了“黑劳模”吴吉昌的家，拿出他培育的一包包棉花良种，诬蔑说：“看哪，这就是黑劳模偷藏棉籽榨油吃的证据。”

吴吉昌受到了近百次的批斗。在恐吓和辱骂声中，他始终不屈地回答：“我研究棉花，一不图名，二不为利，我是在完成周总理给我的任务！”

那些人见吴吉昌不低头，就撤销了他大队长的职务，进而捏造罪证，诬陷他是反革命。他们对吴吉昌进行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用棍打，用火烧，好几次打得他血流满面，昏迷不醒。他的腿给打伤了，左臂一连五次被拧得脱了臼，终于成了残废。

当时，吴吉昌想，什么痛苦他都可以忍受，只要能让他搞棉花就行了。哪里知道，那些人偏偏剥夺了他研究棉花的权利，禁止他下地，强令他每天打扫全村的街道。

从此，树影斑驳的村道上，人们每天都看见吴吉昌弯



着残废的手，拖着打伤的腿，艰难地跪在地上打扫。人们记得，这街道两旁的白杨树，还是几年前吴吉昌领回来的奖品。那时，县里要奖给他一辆自行车，吴吉昌拒绝了。他说：“成绩是大家的！”他要求改奖一千棵白杨树苗让全村栽种。如今，这些白杨已经有碗口粗了。可是，为全村赢得这些荣誉树的人，却受到这样的折磨。白杨在迎风呼号，那是为老汉在呜咽，还是因不平而愤怒？！

看到这情景，许多贫下中农心里多难过啊！为了减轻老汉身心的痛苦，大家不约而同地出来，默默地帮助他打扫。

长期的折磨，使吴吉昌患了重病。从外表看来，他面孔蜡黄，两腿肿胀，身似朽木，但在内心深处，一种严肃的使命感，仍然像烈火一样，熊熊不息。周总理那“我把任务交给你了”的声音，不断在他耳边回响……

有一天，他扫街发现几颗丢落的棉籽，高兴得连忙揣在怀里。他想，不让明搞，我就暗搞；不让在大田里搞，我就在自家院里搞。他回到家里，用一个瓦盆装了土，把棉籽埋进去，放在炕头上。不久，棉籽萌芽了，越长越高，他怕被监视的人发觉，就把棉苗移栽到院里洋姜丛中，隐蔽起来。一听到有人敲门，就连忙用鸡罩罩住……当时，他真是想不通呵，为什么在光天化日之下，有些人可以目无法纪，任意把人民的生命财产当儿戏！而他，想为国家作出点贡献，却不得不偷着去干！

夜深人静，他独自在院里蹒跚、徘徊，看着那些缺少阳光而不能结桃的棉苗，一遍又一遍地自语着：“总理呵，您知道不知道，他们不让我完成您给的任务！”

吴吉昌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了，最后竟卧床不起。那些人既不许吴吉昌外出就诊，又不准医生登门，还向他勒索所谓“专政费”，连监视他的人的工分和饭费，都要吴吉昌负担。他老伴汤素莲无可奈何，不得不变卖衣物。

吴吉昌无医无药，生命垂危，看来是没有指望了。老伴悄悄地为他安排后事。她用灰水染了一块布，裁制老衣，一边裁一边伤心地想着：老伴生平爱的是棉花，总不能让他穿着破衣烂衫死去。买不起棺材，农村又无法火葬，家里还有一对大瓮，合在一起，让老伴蜷缩着躺在里面罢。

一天下午，吴吉昌叫喊起来，豆粒大的汗珠不停地从脸上直往下落，终于痛得昏迷过去……汤素莲慌了，怎么办哪？总得找人合计合计。但那时左邻右舍都被迫跟她家“划清界线”，她怎么肯去连累别人呢？她跑到本村吴吉昌妹妹家里去了。妹妹是亲骨肉，来了。有个老贫农叫李茂德，是五保户，他说：“我无儿无女，我不怕！”也来了。大家赶到炕头，一看这阵势，都说不中了。于是，汤素莲和他妹妹慌手慌脚地给吴吉昌剃了头，穿上了老衣……

就在这个时候，吴吉昌睁开了眼睛。亲人们流着眼泪围在他的身边，要他交代后事。他摇摇头，很久很久，才



断断续续地说：“我不怕死，可我不能死……我还没有完成总理给我的任务……”

吴吉昌病危时的话，传出以后，揪疼了全村贫下中农的心，大家千方百计想挽救他的生命。社员李桂英听说有一种偏方，能治他这种病，偏方需要小鱼配制，她就让自己的爱人带着孩子，到涑水河边去破冰捞鱼。这件事悄悄地一传二，二传三，人们纷纷到河里捞鱼去了。从此以后，吴吉昌家里的人经常发现秸秆编的院墙脚下，有人在夜里偷偷地把一碗碗用小鱼配制的药塞了进来……

事情传到了外村，仁和大队有位老医生叫白秀珍，悄悄把汤素莲请去，递给她一副针管和四十支针药，抱歉地说，我没法亲自给吴劳模治病，你自己学着注射吧。一个农村老婆婆学打针，不用说有多艰难，一连扎了七针，药水都进不了肌肉，顺着大腿往下流。但是为革命必须活下去的决心，鼓舞着这对患难夫妻。吴吉昌说：“我不能死，我要活着跟大鬼小鬼斗，坚决完成总理交给的任务！”

病，居然奇迹般地好起来了。

二

1970年春天。一场冰雹，把棉苗打成光秆。可是棉苗不管枝断叶残，仍然顽强地继续抽芽。就在这时候，大病

初愈的吴吉昌拄着拐棍出现在村头。人们三三两两兴奋地传告着：老汉又站起来了！

那些要打倒他的人，怕他东山再起，继续蛮横地禁止他侍弄棉花，勒令他每天必须带着干粮早出晚归去村外割草。就这样，老汉拄着拐棍，背着草筐，整天孤独地踽踽在田野上。

一天，吴吉昌离村走了五六里，来到北街大队。眼前是一大片棉田，绿油油的棉苗正在疯长，他多么想去提醒社员注意呵。但他想，自己当时的“身份”和处境，人们会不会听他的话，会不会因此招来新的祸害呢？一连两天，他围着棉田看了又看，转了又转，内心斗争非常激烈。

直到第三天，当社员们走出棉田，围在一棵大树下面休息时，他终于鼓起勇气凑了过去。人们用同情和关切的眼光看着他，沉默着。半晌，吴吉昌好像自言自语似的说道：

“棉苗长得不错呵。”队长立刻回答说：“就是挂桃少。”老汉说：“那是因为后期管理没跟上。”这时候，一位中年女社员冲口说：“吴劳模，你给指点指点吧。”吴吉昌凄然一笑，摆摆手说：“好妹子，不敢再称劳模了。”那位女社员噙着眼泪回答：“老大哥，俺们心里明白……”

亲切的称呼，简单的对话，沟通了压抑着的共同的思想感情。吴吉昌立刻放下草筐，向棉田走去。他抚摸棉苗，就像抚摸着自已久别重逢的孩子，两手颤颤发抖。长期埋



在他内心的感情，一下子都迸发出来了。

第二天，社员来到棉田，发现老汉早已在那里了。从此，就像是誰立下了规矩：吴吉昌每天来这里传授技术，进行科学试验，休息时候大家就自动地你一把，我一把，替老汉割草。傍晚收工时，人们心疼他有病，路又远，就把装得满满的草筐，悄悄送到涑阳村口，再让他背回去。

这一年，经他亲自指导的 20 亩棉花，平均亩产皮棉 146 斤，开创了这个大队的丰产新纪录。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惊奇。事情终于让那些迫害吴吉昌的人知道了。他们立刻召开大会，说吴吉昌到别队去搞科研，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又强令吴吉昌去瓜园“立功赎罪”，永远不准他再进棉花地。

但是，瓜蔓真能把吴吉昌拴住吗？

吴吉昌人进了瓜园，心还在棉苗上。有一天他偶然发现，瓜把式在甜瓜苗刚长出两片真叶时就打顶，这样在两片真叶的腋心里就很快长出两根蔓来，坐瓜早，瓜又多，又不脱落。吴吉昌马上就联想到棉花上去：如果运用这个办法让棉苗长出两个秆，早现蕾、多挂铃，不就能增产了吗？

一种按捺不住的强烈愿望，促使他不顾一切束缚要去进行试验。他趁别人不注意，偷偷地蹲到瓜园旁边的棉田里去，选了两株刚长出两片真叶的棉苗，做上记号，打了顶。过了几天，这两株苗果然都长出两根秆来。吴吉昌兴奋极

了，每天出工收工，有事没事，都要寻找借口到那里去看看。夏天棉田干旱，他宁可自己忍着干渴，把老伴给他准备的水，都偷偷给这两株试验苗喝了。这两株试验苗是吴吉昌的希望，是困苦的时候他心中唯一的安慰。

但是，想不到的横祸又发生了。棉苗正在现蕾开花的时候，因为紧挨道旁，给过路的牲口踩掉了。一见这情景，吴吉昌颓丧地坐在路上，暗暗叫起苦来：“天哪！是你存心不让我完成任务吗？”

老伴知道这些事情后，埋怨他说，“你种的是瓜，迷的是花，人家不准你搞，你偏要搞。等将来你的事情水落石出了，再研究不行吗？”

满腔悲愤的吴吉昌听了老伴的话，激动地说：“我相信迟早会重见青天。到那个时候，总理把我找去，问：‘老吴同志，任务完成得怎样了？’我能光向总理诉苦吗？我能空手去见总理吗？不行，啥也别想挡住俺！”

三

林彪反党集团被历史的洪流冲走了。1973年2月，吴吉昌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他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担任了涑阳大队革委会副主任。

老汉总算盼到了这样一天，可以不偷偷摸摸地研究棉



花了。可是，从周总理布置任务起，珍贵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七年！

吴吉昌像久困在笼中的鸟，一旦获得解放，他就要立即展翅高飞了。为了时时提醒自己不忘总理的嘱托，为了处处能观察和研究棉株理想的株型，他特意在家里的檐下、墙头、窗前、树上，到处挂起一株株棉花。这银花满目的庭院，迎着太阳发出灿烂的光华！

二月里，涑水河里的冰雪还未消融，大地寒气仍在袭人，吴吉昌棉花“早育复栽”的试验开始了。他在苗床旁边搭起一个简陋的窝棚。刚抹的稀泥还在滴水，他就往冻土上铺了一层麦秸，回家搬行李去了。

汤素莲看到老伴卷起被褥，连忙拦住说：“你……你还要不要老命了？”吴吉昌回答说：“在家里我能合上眼睡觉吗？我宁愿死在地里，也不能待在家里。”

还能有谁比汤素莲更懂得、更体谅吴吉昌的心情呢！她眼圈一红，松开了手，望着老汉夹起被褥，拿着一把镰刀走了。

晚上，老贫农赵发全也夹着被褥跟着吴吉昌进了窝棚。

涑水河畔一片寂静。月光下窝棚四周的冰柱，闪着凛冽的寒光。两位 60 多岁的老汉，提着马灯，拿着镰刀，像忠于职守的哨兵，警惕地守护着苗床。棉苗移栽到麦茬地里以后，白天吴吉昌顶着太阳观察棉花生长、开花；夜里

他蹲在地里倾听棉花落铃落蕾的声音，有时还风趣地对棉苗说：“你休息，我不休息！”

一个个日日夜夜过去了。他，终于摸清了棉苗的脾性，逐步认识了落蕾、落铃、落桃的时间，跟水、肥、光、温等条件的辩证关系。

这一年，涑阳大队两亩八分“早育复栽”的试验棉田，平均亩产皮棉 186 斤。吴吉昌搞的一株双秆的试验，也获得了初步成功。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四人帮”又掀起了一股破坏生产，破坏科学研究的逆浪。

1974 年，山西省棉花科学研究所负责人来到涑阳，邀请吴吉昌参加棉花栽培技术经验交流活动。端午节，当他们正在稷山县参观时，运城地委一位负责人乘坐小卧车来了。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个负责人一见吴吉昌就训斥道：“你这个人就是技术挂帅，专搞唯生产力论。”他吩咐省棉科所负责人说：“吴吉昌技术再好，我们也不能用他，不准再带他出来传授技术，不准推广他的植棉经验。”说罢，钻进汽车，把门一关，一溜烟地开走了。

吴吉昌就像头上给人猛击一拳，站在路边发愣。他愤懑地想：这到底是为什么？林彪不是摔死了吗？难道又出了奸臣？



吴吉昌在察看棉花生长情况。

果然，接连不断的打击来了。有人说，对吴吉昌落实政策，不把他当阶级敌人看待，够宽大了，他再也不是什么植棉模范。有人说，吴吉昌的双秆棉是唯生产力论的活标本，他不问政治，专弄棉花，念的是“复辟经”，

干的是“回潮事”……一顶又一顶大帽子压到了他的头上。

尽管吴吉昌不断进行斗争，但是缚在他身上的绳索还是越捆越紧。省科委发给他的科研经费他领不到手；发给他用于棉花试验的化肥给别人挪用了；发给他的抽水机具还没有运到就被别人半路劫走了……这年夏天天旱，棉叶开始打蔫。那些过去迫害吴吉昌的人又对棉田实行了断水、断电，逼得这个残疾的老汉只好跟小姑娘一起抬水救苗。

乡亲们都为他担忧，有人劝他说：“算了，这么大年纪了，可别斗了，弄那个棉花干啥？”他说：“那可不行，总理要我创造经验，解决棉花落桃问题，全国有7500万亩

棉田，一株棉少落一个桃，一亩地就能增产十多斤皮棉，这可是件大事。棉花就是俺的命，啥也别想挡住俺！”

用什么办法冲破这重重压力和层层封锁呢？吴吉昌反复考虑了很久，决定要离家出走。他对老伴说：“这里不让搞，就到外地去，走到哪里就在哪里革命，沟死沟埋，路死插牌，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呢？再说，我走了，也免得连累你们……”

老伴越听越伤心，但听到最后一句，火了。她说：“你忘了？当年你受林彪的祸害，给打成反革命，俺哪有一天跟你分开过？现在你要走，咱俩一起走，能活，活在一起，要死，埋在一堆……”说罢，呜呜地哭个不休……

常言说，“穷家难舍，故土难离。”在“四人帮”的重压下，这个倔强的老汉和他患难与共的老伴，决心离家出走，是多么万不得已呵！当年他爷爷从山东逃荒来山西，走过这条路，但那是为了活命；今天，他被迫走这条路，竟是为了革命，为了完成党交给他的庄严使命！

就在这十分困难的时候，传来了周总理对吴吉昌十分关怀的消息。

多年来，周总理几次询问吴吉昌的情况。起初，传来的消息说，吴吉昌是反革命，总理嘱咐一定要查清情况，向他报告。后来，总理又询问这件事。有人说，吴吉昌躺倒不干了。总理说：我不信，老吴同志是不会躺倒不干的，要让他继续革命嘛！



有谁能描写吴吉昌听到这一消息后的心情呢？他感动得哭了。他沉痛地说：“我对不起总理对我的关心，我没能完成任务……”

这是一个多么要强的人呵！

四

1974年10月，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的两位干部，避开一些人的阻挠，直接来到涇阳，邀请吴吉昌去陕西大荔参加全国棉花栽培技术协作讨论会。吴吉昌连忙拔了四株棉苗作为标本，匆匆上了火车。这位长期被迫孤身奋斗的科学尖兵，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队伍。

来自各地的许多植棉模范和科学家济济一堂。当吴吉昌拿着我国植棉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双秆棉”登上讲台，全场的秩序乱了。坐前排的拥到他身边去，坐后边的站了起来……

吴吉昌一连讲了三个半小时。可是，他始终没有介绍，这项科研成果是在一般人想象不到，忍受不了的条件中奋斗出来的。

就在这次会议上，吴吉昌第一次听到总理患病的消息，他心里很不安，一连几夜都没有很好入睡。会议一结束，他立刻赶回家去，带着别人送他的两斤金针菜，还有家乡

产的糯米，匆匆忙忙上北京去。

吴吉昌来到首都接待单位。他一再要求见见周总理。接待人员问：“你有什么问题要解决吗？”吴吉昌捧出带给总理的礼物，解释说：“周总理很关心我，一向对我很好，现在他病了，我老远跑到北京来，就是为了看看他，盼他早点好……”一次、两次……他都重复着这几句话，一连在北京逗留了18天。

这是多么难以忍受的18天呵！他有一肚子话想对总理说，但又不忍心把他这几年的遭遇告诉总理，生怕总理知道了会愤怒，会伤心。他只想对总理说，当年布置的任务已做出一些成绩，这样，总理会高兴的。后来，他知道周总理已住了医院，就一连给总理写了三封慰问信，怅怅地回去了。

吴吉昌来京探病的事，周总理事后终于知道了，他托人带给吴吉昌两句话：“保重身体，继续前进！”

从此以后，吴吉昌天天注意收听广播。总是关心有没有总理病愈出院的消息，有没有总理接见外宾的新闻。谁知道1976年1月9日，像晴天霹雳一样，电台突然播放出不祥的哀乐。周总理逝世了。

这巨大的打击和难言的悲痛，几乎把吴吉昌击倒了。当他踉踉跄跄从外地赶回家乡时，沿途的村庄、道路、田野在他的泪眼中都像蒙上了一层薄纱，模糊着、颤动着。



“再也见不到总理啦！”“再也见不到总理啦！”他失魂落魄地推开自家的院门，那些悬挂在檐下、窗前、墙头、树上的一株株棉花，在他的眼前一下子都变成了痛悼总理逝世的白花……此时此刻，吴吉昌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悲痛，倒在炕上失声痛哭起来了。

在涑阳大队贫下中农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吴吉昌向大家回忆了多次见到总理的情景。他含着眼泪又一次向大家说：“当年总理对我说：‘再过20年，我87，你77，咱们一起用20年时间，把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完成，行不行？’可是总理今年只有78，还不到87呵！为什么这么早就先走了呢？这么多年他老人家没有来得及听我一次汇报，总理呀总理，现在我到哪里去向您汇报呢？……”

五

“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碎后，吴吉昌获得了彻底解放。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他努力攀登科学高峰，继“一株双秆”之后，又培育出一种“多秆两层”新株型的棉花。

1977年的8月，中国农林科学院组织13个省市的近百名科学家和植棉能手来涑阳参观。他们走进两亩“多秆两层”棉花试验田，都不肯出来了。他们有的数苗，有的数桃，有的掏出皮尺来量果枝节间的距离。展现在人们面

前的上万株棉苗，每株上面长多少果枝、结多少桃，每个桃长在什么地方，好像都是经过人们巧装布置的一样。

人们看到，这种新株型的棉花，上下两层都能充分利用光照，中间通风，平均每株成桃 28.3 个，比“一株双秆”棉增加 5 至 6 个桃，比单株棉增加 11 个桃。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成就。在解决棉花脱蕾落桃这个科学难题上，吴吉昌已经从栽培体系方面闯出了一条道路。大家兴奋地跟吴吉昌握手，热烈祝贺说：“毛主席指示要解决脱蕾落桃问题，你算是把它抓住了。”

在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 80 周年的日子里，吴吉昌作为五届人大代表参加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盛会。这个 69 岁的老人听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心情十分激动。他说，现在离周总理交给我完成任务的时间还有 8 年，我决心提前 5 年，攻下落铃关，实现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的遗愿。

吴吉昌已被邀请出席即将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他对祖国科学事业的贡献是可贵的，但更可贵的是他对党的感情，是他那种无私无畏，自觉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精神。为了完成党交给他的庄严使命，在迫害面前，他不屈服；在挫折面前，他不灰心。他在经历一次又一次打击之后，倒下去爬起来，永远是“啥也别想挡住俺”这么一句话。在乌云密布、群魔乱舞的日子里，这个纯朴的老农，昂首挺立，用自己的行动为人民谱写了一首悲壮的正气之歌！



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像吴吉昌这样的遭遇，连同产生它的时代背景，都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斗争仍然存在。吴吉昌那种为了真理，为了祖国的科学事业，为了党和人民的重托，“啥也别想挡住俺”的革命精神，将教育和鼓舞人们去披荆斩棘，进行新的长征！

1978年3月16日

（本文与陆拂为、廖由滨同志合写）

涑水情

(一)

今年初夏，晋南的涑水河河水不大，但沿岸 300 多亩芦苇却长得格外茂盛。站在闻喜县涑阳村桥头一望，风吹苇动，绿浪起伏，萧萧的芦苇随着弯曲的涑水河直铺天际。

这里就是全国劳模吴吉昌老人的家乡。

到老人家里看看，是我多年来的夙愿。特别是 1987 年以后，他因患前列腺癌在北京动了大手术，这件事愈发沉甸甸地压在我心头。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回想起与老人交往的情景，心潮难平。屈指一算，吴吉昌今年已是 81 岁的老人了。

端午节的前一天，我终于来到了涑阳村。那天，晴空万里，微风拂面。老人早早就在家门口等我，一见面就拉着我的手，高兴得不知说啥好，又像怕人听见似的小声对我说：“人家都说想啥梦见啥，俺夜里做梦，梦见地里的



棉花长得可神气哩，就等着你来看了。可不知为啥，一转眼都冻死了，急得俺直跺脚，棉花死了，俺还让你看啥呀？一伤心，眼泪哗哗流下来，梦也醒了。俺寻思，是不是老天爷给俺通个信儿，你忙得顾不上来啦？”我笑着说：“你看梦一点也不灵，我不是来了？”老人不住地点着头，拍着心窝说：“俺心里盼着你早点来哩！”来前，人们说老人身体还好。我握着他的手，细细端详着，发现他因兴奋涨红的脸膛微微有些浮肿，手脚也不像以前那样灵便了。

吴吉昌的小院不大，院当中摆不下4张八仙桌；除正房外只有几间东屋。但院里却很有生气。两棵高大的泡桐



穆青和吴吉昌夫妇在一起。

树华盖般把小院遮得绿荫满地。一棵刚能结果的山楂树，生机勃勃，已经长得够得着屋檐了。因为院里来了一群人，十几只鸽子扑簌簌地飞起又落下；十几只母鸡咯咯叫着；一只大白鹅把脖子伸得高高的警惕地瞧着人们；只有猪圈里的两只半大肥猪，若无其事地趴在圈里一动也不动。

我喜欢老人这所农家小院，祥和、恬静，充满生活气息。

老人把我让到东屋。屋不大，放一张圆桌，坐一圈人已经满当当的了。墙上挂满了照片。有老人和周总理在一起的，也有和彭真同志及其他人的合影。我们采写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一文的剪报被装在镜框里，高高挂在正墙上。

我们一起兴致勃勃地观看墙上的照片，回味着一次次相聚的情景。那是老人住院动手术前我们在医院的合影；那是在我办公室里照的；还有一张照片是老人 1979 年抱着我的小孙孙照的。他指着这张照片说：“你那小孙孙那年才两三岁吧，看俺抱着多虎实！现在怕抱不动哩！”我笑着说：“是抱不动了，一晃过去多少年了？他已是 13 岁的毛头小伙子了！”说得老人哈哈大笑起来。

我对老人说，城里人都是把照片夹在相册里保存着……他摇摇头说：“那不如俺们挂在墙上看着中意。”他指着一张照片说：“还记得吗？你在北京还请我们老两口吃过一顿高级饭。”



这事我确实记得。那是1985年10月间，他们老两口到北京，我为了让他们吃些山村人稀罕的海味，就专门在海味餐厅请他们吃了一顿饭，谁知道这顿饭竟给老人闹下了笑话。

原来，他从北京回来后，就向人说起这件事。听的人想知道我请他吃什么稀罕物，可是老人却啥也说不上来，只是向人比画着说，吃饭时腰里要先系上一个白围裙。

“系白围裙干啥？”听的人想不通，以为北京请人吃饭还让人下厨房哩，以后才知道那是餐巾不是围裙。惹得大家好笑了一阵。

当时，有人还追着问：“究竟吃些啥？”老人说：“吃啥俺也记不清了，反正就是不让俺吃馍，没上馍……”
“啊……”听的人都感到奇怪。因为在当地，不吃馍就不叫吃饭。既然请人家吃饭，为什么偏偏忘了上馍呢？老人十分认真地重复说：“是没馍，穆社长请俺吃的饭是没吃馍呀！”人们说，这也许是他一生中唯一一顿没吃馍的饭，所以记得特别清楚。

听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笑了。我拉着吴吉昌的手，对他说：“上次我没有给你吃馍，这次你也别给我吃馍中不中？”“那不中！”，老人笑着说：“俺早就让媳妇磨好面了，你还得多吃几个白馍。”

据我们分社的记者告诉我，老人为留我吃顿饭，可尽

了心了。

我来的前一天，老人就赶到县里，和我们记者住在一间房里等我。半夜，老人突然醒了，也可能他根本就没睡着。他叫醒了我们那位记者，心事重重地说：“你说，你们穆社长那么忙，真会从北京到俺家来吗？”老人索性披衣起床，怔怔地呆坐在床沿上。沉默一会儿，又说：“俺想请穆社长在家里吃顿饭，你看中不中？”记者说：“当然可以，也应该！”“可县里想把穆社长留在县里吃饭。俺家是比不上县里，可俺的青菜、麦子，都是自己种的，更有乡土味儿，穆社长打老远地来了，不在俺家里吃顿饭，俺这辈子心里也不踏实啊！”说着又突然从床沿上站起，好像自言自语地说：“不中！明天俺得趁早赶回去。把菜洗得干干净净，把煎饼摊得薄薄的，馍蒸得白白的。俺不在家看着他们干，不放心。俺想好了，明天，县里人要拉穆社长走，俺就叫娃儿把大门闩上，闩上大门他就走不了啦！”

（二）

和老人坐下，他三句话不离棉花。

十几年前我写他是“棉花迷”，现在他已是81岁的高龄了，仍初衷未改。一谈起棉花，他就两手比画着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这情景，使我想起许多难忘的往事。



1980 年底，老人进京开会，兴冲冲地带着两株棉花来看我。棉株足有半人高，枝枝条条都缀满拳头大的银花。累累棉桃，让人不敢相信那是地里长出来的。我还从没见过一棵棉花上会长出那么多棉桃。老人指着棉花，深情地对我说：“俺就是个摆弄棉花的，棉花就是俺的命，啥时候你看见这棉花了，啥时候就看见俺了。”他指着另一株棉花说：“这株花是送给邓大姐的，周总理嘱托我的事就要完成了。这花，是给周总理带个信儿。”

1982 年，老人到北京来，又给我捎来 2 斤新棉花，让我絮褥子。从山西晋南的闻喜到北京这么远，一个老人带着这么一大包棉花，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便对他说：“以后再来，千万不要带东西，路远多受累。再说北京哪里买不到棉花？”老人摇了摇头说：“俺知道北京有，可这棉花是俺自己试验田里种的，老伴特意弹的，绒长，暖和着哩！俺就是想让你絮个褥子铺在身下一准暖和，你身子暖和了，俺心里也就暖和了！”几句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我想老人的一片真情，我怎能不领呢？

1987 年，老人不幸患了前列腺癌，先是发了一个电报给我，不久，便来到北京住进了肿瘤医院。当时正值我要出国访问，在出发的前一天，我赶忙去医院看他。只见老人瘦多了，两只眼睛都塌陷在眼窝里了。两撇总是翘起的胡子也软塌塌地耷拉着，脸上条条皱纹都挤到一起了。人

显得一点精神也没有。见到老人这样，我心里一酸，眼泪差点掉出来。他见我来了，拉着我的手强打着精神对我说，他这次的病来得厉害，怕再见不到我了。我说，“哪能哩，这是北京最好的医院，你的病动了手术会好的。”我们谈了大约一小时，临别时，我告诉他，因为有早就安排好的出国访问任务，不得不按期出访，医院里的一切，我已交待给高秘书，他会常来照顾的。

半个多月后，我从国外回来，听说手术很成功，老人恢复得很快，我悬了十几天的那颗心，总算放了下来。

以后我多次到医院去看他，老人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有一天他悄悄地对我说：“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的房顶都像长着棉花一片白。俺一闭眼，就好像又回到俺那试验田了。”他很认真地说：“你是社长，你能不能给他们医院说说，让俺赶早出院回家。”

我说：“那可不行！你得好好住院治疗。”

他说：“眼看就要到3月了，离种棉花还有20多天，俺回去今年还要搞一个大的棉花科研项目，青芽结桃。”他怕我听不明白又解释说：“青芽按过去老办法都要统统打掉，因为它不结棉桃，俺要让它们都挂桃结花。你想想，如果俺不出院回去，错过了种棉期，那试验就搞不成了。”

我说：“不行！身体重要，棉花这事可以先放一放。”



他显得有些着急，固执地说：“哎哟，别人不知道俺，怎么连你也不知道俺啦？俺这命就和棉花连着的呀，种不上棉花，完不成周总理交给俺的任务，俺还要这命干啥？”听着老人这滚烫的心里话，望着他手术后苍白的面容，我能说什么呢？

我知道，他认准的事，谁也劝不动。最后，他终于提前出院了。

那年，我特别关心老人的身体和他的试验。秋后，我收到他请人代写的一封信，说他身体已经康复。“青芽结桃”的试验也成功了，在他的试验田里，亩产皮棉达到 224 斤。这些好消息，使我着实替他高兴了好几天。

(三)

在老人东屋南墙上，挂着一张奖状。那是晋中行署和地委专门派一位副专员给老人送到家里的，上面写着“为晋中棉花高产立下大功”。平平常常的几个字却记录着老人一些不平常的事迹。

1979 年晋中平遥几千亩棉花遭了雹灾，被打得只剩了光杆杆。棉农们纷纷要犁了棉花抢种谷子。老人听说了，急忙赶去，细心查看了土质、地温、苗情，说啥也不让犁。棉农们都不信，说“哭不活的娃娃，救不活的棉花”。怕

听了吴劳模的话，连一茬谷子也落不下。老人好说歹说才给留下了100亩光杆棉花。经过他的精心救治和培育，秋后收花，亩产皮棉竟达105斤。人们这才信服了，吴劳模一下子成了“吴神仙”。远远近近都来学习他的植棉技术。

这以后，老人一身黑裤褂，头裹白毛巾，先后十下晋中，使晋中全区的棉花由原来的亩产40至50斤提高到150斤左右，最高一亩地产皮棉300斤。

以后，辽宁省锦西县网户村600亩棉花遭雹灾，也打成光杆杆。网户村的村长和支部书记拿着《为了周总理的嘱托》那篇文章，千里迢迢找到涇阳，要见吴吉昌。他们说，我们



植棉能手吴吉昌（左）在棉田里介绍他的植棉经验。（新华社发）



全村人只求吴劳模一句话，是犁了还是留下？当时老人正发高烧，躺在炕上输液。人们都劝来人回去吧，老人听说了，气得一下子从炕上坐起来，说：“一棵棉苗就是条命，人家大老远来就为求医救命，一刹刹也不敢耽搁，快请人进来！”

老人躺在炕上，先问地情、土质、气候、苗情，然后一句一字地讲，手把手地教，讲着讲着，索性坐起身来，一把将胳膊上输液的针头拔下来，感动得网户村的村长和支部书记含着热泪说：吴劳模您快躺下吧，身体要紧！老人却摇摇头：“俺这条老命不要紧，是你们那 600 亩棉花要紧！”

前几年，政府为照顾他，把他的大儿子调进附近一家国营大厂当工人。老人却一遍遍给儿子儿媳作工作，到底把儿子拉回到棉田里。他给儿子讲了一个理：“咱国家现在要用金子到国外买棉花，如果搞成一项试验，一棵花少落一颗桃，能给国家省下多少钱？咱可不能为了自个，忘了周总理的嘱托！”

有一次吴吉昌去一家棉纺厂参观，厂里的工人们听说吴劳模来了，都围上来。一个青年工人说：“吴劳模你费了一辈子劲多打的那点棉花还不够我咯哒两下的呢！”老人笑笑，掰着指头认真给他算起账来：“俺不多算，一棵花俺让它少落一颗桃，1 亩地按 3000 株花算，500 个棉桃出 1 斤花，你算算 1 亩地能增产多少花？俺闻喜县有 13 万亩棉花，咱

运城地区有 400 万亩，全国有 7500 万亩棉花，你再算算，全国能增产多少？怕你这个厂几辈子都吃不完哩！”

老人这笔账，算得在场的工人干部情不自禁喝起彩来，大家说吴劳模真不愧是全国劳模，心中时刻装着的是全县、全区、全中国。

我了解老人，更尊重老人，就是因为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一颗为党为国呕心沥血的老共产党员的责任心。

(四)

往事如织。我顾不上细细回味，院里的乡亲们都要和我这个北京来的稀客合影留念。我们搬了凳子，在小院当中摆了一排，我先和老人全家合影。正在照相，他家养的那只大白鹅下了个又大又白的鹅蛋，人们拿给我看，我接在手里，鹅蛋还有些微温。谁知咔嚓一声，人和鹅蛋都被拍到照片里去了。人们笑说这张照片太有意思了。照完相，我把访问朝鲜带回来的一瓶人参酒和其他一些补养品送给老人。我说：“你老辛苦一辈子，应该好好补养补养身子，祝你健康长寿！”在场的乡亲们都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老人高兴地笑着，像孩子似的把酒先举到鼻子前使劲地闻了两下，又举过头顶让众人看。嘴里不住声地说：“谢谢，谢谢！”然后交给老伴，叮咛她“找个妥当的地方千万放好。”



我和老人说笑着走出吴家小院，去看他的棉花试验田。

走在路上，我提出要看看老人当年不要奖一辆自行车，要求奖给村里的 1000 棵白杨树苗，我估计兴许那些钻天杨早该成材了吧！没想到老人说：“没了，都砍了！卖了！盖了学校了！”我问：“一棵也没留下？”他说：“一棵也没留下！”我不禁长长叹了口气，说：“该留下几棵么，也好教育教育后人！”听了我的话，老人只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试验田在涑阳小学后面，棉田已长起 3 寸多高。一垄垄都铺着雪白的塑料地膜。老人一到棉田，竟精神得像个小伙子。他跑前跑后地给我们讲棉花的习性、爱好、栽培、管理，1 米多宽的棉花垄，他竟一步就跨过去。

在试验田的温室里，有一排老人专门留下的棉花标本。一株是一个品种，每一株也都是他科学试验的成果。

老人抚摸着棉株，讲解着每株棉花的生长特点，仿佛是抚摸着孩子，说道着娃娃们的脾气秉性。他告诉我，这叫“一株双秆”，一株棉花长出两个秆，如果这枝秆长快了，就叫它长慢点，等等那枝秆，用两个指头在它的枝颈上轻轻一捏，“咔吧一响，三天不长，只长果枝，不长头顶。”等它们兄弟俩长得般高般齐了，肥力再跟上，一准结一大嘟噜。

都说吴吉昌是植棉神仙，只有当你看见他站在棉田里



吴吉昌与穆青在棉花试验田里。

心灵手巧地摆弄棉花时，你才会感到，老人的聪明才智和他毕生精力并没白费。一个农民一辈子侍弄棉花，在当地农业科学工作者帮助下，已经取得了12项全国公认的科学实验成果，应该说，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早已全身心地融进这“银白色的事业”中去了。

回到老人的小院里，我又参观了他的正房。这是他老两口的住室，一个大火炕几乎占据了全室的1/3。正房正墙上端端正正地挂着我送给他的挂历，那是我拍的海外风光。老人的老伴告诉我，去年我送给他的那本，老人也像宝贝似的珍藏着，反复交代家人：“俺老了，离该走的日子不



吴吉昌在家庭午餐上向穆青敬酒。

远了，等俺走时，啥也不带，就把老穆送给俺的这两本挂历给俺带上。”听着这深情的话语，当时我只感到一股热流直涌心头，眼睛一下子湿润了……

午饭，吃着老人亲手种的新鲜蔬菜，喝着玉米渣稀饭，我又特地吃了一个蒸馍。这些农家饭菜，对我来说既香甜又可口，确有种说不出的亲切感。老人把一盅山西汾酒捧到我眼前，我不大会喝酒，但盛情难却，接过来，只略一犹豫，便一饮而尽。谁知竟像吞下一团火。

“好辣！”我连忙放下酒杯禁不住喊出声来。老人看着我的窘相，惬意地笑了。他告诉我，去年他家光麦就打

了2400多斤，吃也吃不完。我说：“想当年，你跑到北京，对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还想不通，跟我发牢骚说：咱共产党到底还搞不搞社会主义了？我给你讲了半天道理，你还不大通哩！”老人不好意思地笑了：“这道理从你那儿回来俺就琢磨上了。后来想通了，俺现在也早就致富了，还是按党说的办，承包了好。”

饭后，县和专区的同志催促我上路，老人高低不让走，说他还要给我表演一下他老家山东的抬花轿哩。我知道他是想留我多待一会儿，便鼓掌欢迎。于是老人把白手巾往头上一裹，嘴里哼着抬花轿的小曲，便当场舞蹈起来。只见他手舞足蹈，扭腰甩胯，左一脚，右一步，走出了一套套花样。那神态，那舞姿，逗得乡亲们一阵阵大笑。但当这满堂笑声过后，一阵悲凉之感却蓦地涌上我的心头。我了解老人的心情，更感激他的美意，但他毕竟是81岁的高龄，又是一位身患重病的老人啊！没有那种真挚深沉的感情的冲激，他怎能有如此神奇的活力，难得的兴致！

眼看就要分手了，老人默默不语，我心里也不好受，只一个劲地叮嘱他快去北京复查一下身体。同志们一再催促我上车，而老人却突然拉起我的手悄悄地说：“让俺再陪你走几步……”说着便向汽车相反的方向走去。我们手拉着手默默地走着走着，50米、100米，走过去又绕回来，我看见老人浮肿的脸紧绷着，眼睛里闪耀着湿润的泪光。



车开了，我不敢回头看，我知道老人正呆呆地望着我，
望着我……

1990年8月27日



潘从正

潘从正千辛万苦栽培的苗圃和防护林，历经劫难，几起几落，但他并没有气馁。他说：“他毁，俺栽。他再毁，俺再栽。俺是为国家，为子孙后代！”

“俺不怕穷，只怕乱。今后可不能再折腾了！越折腾越穷，将来国家靠什么？只有大家齐心搞建设，国家才能富起来。”

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

1965年冬天，记者一行在豫东平原采访，有两位先进人物的事迹使我们深为感动：一位是兰考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另一位是宁陵的植树老人潘从正，人们称他“老坚决”。当我们报道了焦裕禄的事迹之后，原打算向读者介绍这位长年累月与风沙搏斗的老人，没想到由于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这一计划被中断了。在以后那些风云变幻的岁月里，我们虽然散失了当时的全部笔记，但这个刚毅、纯朴的老人的形象，却始终在我们心头萦绕。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对老人的强烈思念，驱使我们重访旧地，发现这个已经77岁的老人就像一颗尘封土埋的明珠，虽已湮没无闻，但仍然闪耀着光芒！这次重逢使老人十分激动，他整夜无法入睡，向我们倾诉了自己的遭遇和感慨。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还没有结尾的故事，像一滴水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千世界。



—

那是 20 多年前的事了——

当时宁陵县万庄村刚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散沙似的庄稼人，开始拧成一股劲，迫切要求改变风沙造成的贫困状况。一向热爱种树的共产党员潘从正，决心把全部精力都使在造林上。

在沙荒地地带造林哪来那么多树种呢？他肩上搭着布袋，怀里揣着桑剪，走遍了周围几十里路的村庄和城镇。迎面来了熟人，他看不见，但老远有一棵树，他就瞅着奔去了。落在树下的楝豆、柏壳、榆荚、椿排、槐籽，这些任凭人踩马踏谁都不要的东西，他都珍贵地拣起来装进布袋；每逢农村赶集，他随着卖水果的挑子转悠，看到小孩吃水果，他就蹲在旁边，等候拣拾扔下的果核。有时候他还背着粪筐，沿路拾粪。谁家房前屋后栽有梨树、樱桃、泡桐，他就跑去央告，让他把树根刨开，倒上些粪，培土封好，等开春发了杈，他再来分些树根。就这样日积月累，老汉把许多用材树、果木树的子子孙孙都请到沙荒地带来了。

为了培育这些树籽、树根，老汉的家里简直成了育种场。屋里所有的坛坛罐罐、麻包、布袋，都装满了树种、果核，连房前屋后巴掌大的地方，也都铺上粪用来沤种。为这，老伴不知跟他吵过多少回。有一次，他在做饭的砂锅里也

种上花椒籽，气得老伴直骂他：“老东西，你别吃饭啦，就吃你的树苗吧！”老汉嘿嘿笑道：“你别恼，要吃饱饭，还得先造林！”

由于“老坚决”坚持育苗，几年以后，这一带破天荒地出现了一片片茂密的树林。为了表彰老汉对绿化沙荒的贡献，1956年，人民政府把他选为河南省的林业劳模。

没想到从1958年秋天开始，平地刮来一股猛烈的“共产风”，闹得人们杀猪砍树，人心惶惶，刚培育起来的林木被一扫而光！甚至知了飞来，都找不到树落。风沙又从万碧风口无遮无拦地呼啸而入，麦苗被连根拔走，大片大片农田眼看着变成了沙丘起伏的荒滩。

在许多人唉声叹气的时候，潘从正并没有气馁。他说：“毁了头一茬，再种第二茬！”在集体和群众的支持下，他离开村庄，跑到清水河畔找了一块高低不平的撂荒沙地，决心创办一个苗圃，扎下营盘，跟风沙持久作战。他挖了一个地窖子，篷上茅草，搬来铺盖，就在这里安了家。一年四季除了逢年过节回家团聚团聚外，他一直坚持在这里育苗。一天晚上，他倒下身子呼呼睡熟了，没察觉夜里起了大风，只迷迷糊糊感到这夜似乎特别长，身上盖的特别重。等他醒来伸手一摸，被上已蒙着四指厚的沙土。他连忙翻起身来拱门，地窖子已给沙堆封死了。老汉费了很大的劲，才从里边扒个洞钻了出来。



老伴前来送饭，得知老汉差点被沙丘活埋，心疼得流了泪，她决意搬来跟老汉做伴。她的闺女埋怨说：“俺爹把家丢了，你也不要家了。”娘说：“傻妮子，我能忍心叫你爹让沙老虎吃了？”

老伴随身带来了锅碗瓢盆，抱来了羊羔和猪娃，还跟来了一条狗。小小苗圃从此增添了生气。老汉起早贪黑，侍弄树种树苗，老伴喂猪养羊，帮助老汉攒粪改土。春天，播下的树种萌发了绿芽，老两口像照看初生的婴儿一样，白天盖上瓦片挡沙遮太阳，夜晚揭开瓦片让它接饮露水。飞沙把苗埋了他们赶快扒开，刮倒了连忙扶起，拔走了又接着重栽……

在“老坚决”的眼里，苗圃像是一座兵营，育苗就是培训跟风沙作战的士兵。

1962年，大队组织社员把32000多株幼树移栽到万碧风口时，“老坚决”兴奋得就像老师带着自己的队伍开上了前线。幼树横成排、竖成行，布成了一片拦截风沙的阵地。

1965年的冬天，记者来到万碧风口，看到这里开始形成一道绿色的屏障，高层耸立着泡桐、大官杨，中层是柏树，底层是一丛丛白蜡条、紫穗槐等灌木。在它的保护下，原来废弃的700多亩飞沙地又种上了庄稼，大队小麦平均亩产量由1960年的80斤上升为200多斤。

老汉当年创业的地窖子还在，但他已搬到新盖的三间

瓦房里去了。苗圃里增加了几个青年人，面积也扩大到了30亩。周围的泡桐、洋槐、榆树已经成林，苹果、扁桃、樱桃、梨、枣开始挂果。当时，“老坚决”正集中精力培育一种名叫金顶谢花酥的优质梨苗，每天都有附近的或外县的人前来购买。仅卖各种树苗一项，苗圃每年就能为集体创造近3000元财富。

在苗圃的库房里，我们看到许多麻袋和条筐，里面装着各式各样的树种。老汉指着这些种子幽默地说：“别小看它们，将来它们就是冲天拔地的森林！”

二

记者离开这里不到半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林彪、“四人帮”猖狂推行极“左”路线，漫天卷起一股“否定一切”的旋风，到处是一片“打倒！”“砸烂！”的喧嚣。全国基层党组织被迫停止活动，城乡闹哄哄地进行着夺权和斗争……

在这样一场风暴的冲击下，万碧风口新树起的防护林带也未能幸免于难。潘从正在劫后来到现场，好像走进一片凄凉的墓地，往日郁郁森森的树林如今只剩下了一排排残骸！他，像被人剜了心一样，扑倒在地呜呜痛哭了一场。

老汉拖着缓缓的脚步，无可奈何地回到苗圃去了。他



像一只蜗牛，缩回自己的壳里，不时探出头来，警惕地注视周围发生的一切。这时，他心里唯一的希望，就是保住那些仍在生长的幼苗。

但是，祸事终于来临了。1967年的一天，几个自称“造反战士”的人挑着旗子闯进苗圃，动手就拔树苗。平常行动迟缓的老汉，这时突然像雄狮样敏捷地窜出来，拦住他们怒吼：“树苗犯啥错误了，你们要造反？”

一个孤老汉，怎么能是那伙人的对手呢！他们连推带搡地把他架回村，立刻召开批斗会。据那伙人说，老两口离开家来到沙荒地是为了搞“复辟”，把苗圃办成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潘家场”……这些“罪状”老汉都听不懂，不过，最后发布的“勒令”，他还是听明白了：“立刻滚出苗圃，永远不准回来！”老汉又气又急，只觉脑中嗡地一声，原本有病的双眼突然发黑，什么也看不见。

会后，儿子扶着瞎了眼的爹到宁陵县医院诊治，医生说：“快转地区医院，治慢了眼会全瞎。”他们又赶到商丘市，在地区医院抢救了20多天，慢慢地老汉能影影绰绰看见人影了，他急着要返回苗圃，儿子难过地说：“爹，你多大岁数了？落到这步田地还不回家！”这话触动了老汉的满腹心事，他哇地一声哭道：“树苗就跟俺的儿子一样，俺扶着它们一个一个向上长，要不守着，准要给全毁了！”

老汉不顾“勒令”，坚决回苗圃，“造反战士”们就

用停发口粮、不给工分的办法，想迫使他低头。可是几天过去了，这个倔强的老汉始终不向那伙人告饶。

老汉在旧社会种过几十株柳树，灾年别人逃荒要饭，他就守在家里吃树叶。这个辛酸的经验，帮助他度过了那四年没有口粮、没有工分的艰难日子。他摘树叶，采野菜，掺和着老伴省给他的口粮调成糊糊。他，不言不语、半饥半饱地继续精心培育树苗。好心人劝他说：“算了，常言说：‘五十不种树，六十不盖房’，你都快 70 啦！还守着苗圃干啥？”老汉激动地回答说：“俺哪是为自己，俺是为国家，为子孙后代！”

在这段飞沙走石的日子里，青年人一个个都被迫走散，老汉就像一棵大树，坚强地支撑着风雨飘摇的苗圃。他看到树苗齐齐崭崭地往上长，内心就有一种强烈的冲动，重树防风林的意志，像炽热的熔岩在奔突……但是，严酷的现实告诉他，他的想法在当时根本无法实现，因此，他的脾气就变得暴躁不安。有一天，他突然独自收拾工具，刨出一批树苗，要扛到万碧风口去栽。老伴连忙拦阻道：“你疯啦！你会栽，人家不会砍？！别把树苗糟蹋完了。”老汉暴跳如雷，推了老伴一拳大声嚷嚷：“你懂什么？他毁，俺栽，他再毁，俺再栽，俺要做给大伙看，到底谁正确！”

旧社会里和和睦睦的贫贱夫妻，也难免有个吵架怄气的事。可自从老汉入了党，不要说动老伴一个手指头，连



恶声恶语也从没入过她的耳。如今，平白无故挨了一拳，老伴委屈得不行，抽抽泣泣哭着上闺女家去了。

相依为命的老两口，还有什么不和不能互相谅解呢！老伴进闺女家刚坐定，气就平了，反挂念老汉一人孤单，担心他吃不饱。她在闺女家蒸了一屉馍，托人给老汉捎去。过了几天，老汉自己来了。老伴生气地说：“你能，你正确，来干啥？”老汉讷讷地说：“俺来承认错误，还不中！”老伴抹着眼泪说：“俺不是怪你，眼看人家把你闹腾的那样儿，谁心里能好受？活了一辈子，没听说种树的有罪，拔树的有理！”

从此以后，老汉再也不忍心去风口察看了，他变得特别严峻，更加沉默寡言……可是，尽管地冻三尺，难道能使富有生命力的种子死亡吗？

不久，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了，破坏之风稍有收敛，老汉的思想又开始活动起来了。他向公社提出再造防护林带的建议，这回得到了支持。公社派来 20 多个没爹没娘、由集体抚养的孤儿来协助他。

春天，老汉拄着拐棍，领着一群孤儿来到风口。尽管背阴坡地上的残雪尚未消融，早春吹来的风毕竟不像冬天那样刺骨了。这第三次造林比前两次要艰难得多，场地上乱七八糟突出许多树桩，地下还有无数盘根错节的树疙瘩。摆在他们面前的不再是一张白纸，而是必须在已经涂涂抹

抹的历史画布上重新画出新的图画。

老汉亲自教孤儿们种树：沙地植树要深刨、浅栽、根伸直，然后扶正踩结实。这样才能使幼树飞沙埋不掉，大风刮不倒。他无限感慨地说：“一棵树成材要十几年，说毁，一阵子就完了。种树、为人是一个理，你们要牢记人民抚养的恩情，学建设，不要学破坏……”

幼树又在风口成排立了起来。老汉一天要去那里察看几回，他给这棵扒扒沙，给那棵浇点水，速生的泡桐一年能长高一米四，老汉还嫌长得慢。他是多么希望，多么希望啊……

不幸的是，老人这个良好的愿望仍然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正当它冉冉上升的时候，又被一阵风刮破了。1976年“四人帮”大反所谓“回潮”“复辟”，保护林木的规章制度被攻击为资产阶级的“管、卡、压”，多灾多难的防护林带再一次遭到了大砍大伐。

这时候老人已经74岁了，他还能经受多少次这样惨重的打击呢？

三

今年4月，记者一行再访宁陵，由于十多年来的人事变迁，县里很多人已不了解“老坚决”的近况。直到我们



到了万庄，才发现老两口还像过去一样住在苗圃里。大队干部向我们介绍了这里防护林带三起三落的经过，再三叮嘱我们：“就别提风口的事了吧，老汉心都要碎了！”

推开苗圃树枝编成的篱笆，我们一眼就看到老人正弯着腰，在精心地整理树苗。听到人声，他抓起放在身边的拐杖，直起身来，惊讶地望着我们。他，颤颤地握着记者的手，激动地说：“十几年了，还没有人到这里来看过俺！”

也许是饱经忧患的缘故，老汉变得比过去更为消瘦而苍老了。但经过几次长谈之后，我们发现这个77岁老人的那股坚决劲儿，仍然不减当年。他似乎感到剩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几次表示不把万碧风口堵住，决不罢休！据他的老伴告诉我们：去年，儿子接他回家养老，老人在家里睡不安生，半夜从床上爬起来又跑回苗圃，儿子怕他无人照顾，只好让娘也跟来了。最近，老人病卧在床，儿媳恳求他说：“爹，回家吧！家里啥都有，孙男弟女们谁不盼着伺候你？”老人说：“你们伺候俺，谁伺候树苗呢？不走！”为了绿化沙荒，20年来老人抛家离舍，从住地窖子起，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岗位：风沙，吓他不跑；断粮，逼他不走；有病，他不肯离开；老了，他不享清福。任何打击和挫折，都不能使他放弃为国家、为集体、为子孙后代造福的事业。

这，不由得使我们联想起在风口织网的蜘蛛。狂风把

网撕破了，它重新开始；接着又来一阵风，网又破了，它仍然继续织下去；一次、再次、三次，生命不息，吐丝不止……这不正是“老坚决”百折不挠革命精神的写照吗？这不正是他一生命运的缩影吗？

当然，任何比喻都难免有它的局限性。就万碧风口来说，老人的树网至今尚未织成。但老人一生究竟培育了多少树苗，谁也算不清。有人说有三四十万株，有人说有五六十万株。今天，宁陵田野上洁白的梨花，紫色的泡桐花，以及村庄周围的层层新绿，无不渗透着老人的心血。面对着这样一幅满目春光的图画，老人身背布袋、拣拾树籽的形象，仿佛又呈现在我们眼前，是那么清晰，那么高大！



1982年9月，穆青和潘从正在一起。



正是这个老人，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在动荡的年代里坚持建设社会主义的榜样；树立了一种为国家、为人民“缀网劳蛛”的革命精神。无论他已经遭遇多少次失败，无论从播种到收获要相距多少年之久，这种始终不渝的努力绝不会枉费！他的劳绩和贡献，也绝不会被历史磨灭。

潘从正在万碧风口结织的林网，可以阻拦自然界的风沙，却挡不住一次又一次人为的破坏。这个历史教训，更启示人们：要建设，就要有一个持久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建设，必须坚决堵住那种人为造成的风口。老人无限感慨地对记者说：“俺不怕穷，只怕乱。今后可不能再折腾了！越折腾越穷，将来国家靠什么？只有大家齐心搞建设，国家才能富起来。”

这就是一位历尽沧桑、饱经忧患的老人在新长征路上的祝愿和希望。

现在，中国人民正在书写新的历史篇章，年近 80 的共产党员潘从正又开始了第四次结织新的林网。我国有亿万像“老坚决”这样勤劳勇敢的人民，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正充满信心向前看，向前进。人们要使森林覆盖沙荒的壮丽理想一定会实现。这篇没有写完的报道必将有一个美好的收尾。

1979 年 4 月

（本文与陆拂为同志合写）

心上的树

(一)

3月底，正是中原大地麦苗返青的时候，我从兰考绕道宁陵，专程去探望人称“老坚决”的林业劳模潘从正老人。一个月前，他的孙儿潘园林曾写信给我，说他爷爷听说我要去河南，希望能再到宁陵看看。老人的心意我是理解的。这位把一生的心血都浇灌在植树造林上的老人，算来，今年已经是84岁的高龄了。

那天，老人夫妻俩听说我要去，一清早就从苗圃回到家里，张罗着在家里接待我。当我走进他家的院子握着他的手向他问好时，我看见老人极力想直起那早已累弯了的腰杆，仰脸望着我，那激动的情绪似乎使他不知说什么好，只一连声地对我说，他身体好，光景好，啥都好！

1982年秋天，我曾去苗圃探望过他，比起那时来，老人并没有多大变化，脸上的气色反而比过去更好了。那年，



穆青与潘从正亲切交谈。

他被一头老公羊顶伤了腰腿，好几个月行动不便。经常跪在或趴在地里侍弄树苗。这回我重提这件事，问他是否落下毛病？他笑着说：“没有，没有，早就好朗利了。”

也许因为我是一个稀客，小院子里不一会儿就挤满了人。其中有老汉的家里人，也有村里的邻居们。老人的二儿子潘富修现在是村支部书记，恰巧，这次商丘地委和宁陵县委的负责同志也同我一起来看望老人了，大家谈起家常来亲热得很。老汉一再让我们到屋里去坐，我说：“人多热闹，屋里坐不下，还是在院子里敞亮。”于是人们纷纷从各处搬来了椅子、长凳和小板凳，一下子摆了一大片。

话还是从生活谈起，老汉告诉我：“这几年别提有多

好啦，家家一年到头一块面，想都想不到。”我说：“您老劳动了一辈子，给国家种了多少树，培了多少苗，谁能数得清呀？老了，该享享福啦。”他说：“我觉摸着贡献还不够。这都是党的政策好，是党让俺们老百姓享福哩。”我说：“光景好了，您多注意保养保养，我祝您老两口都活过100岁。”

老汉高兴地笑了。他说现在就保养得不错。接着他数着指头告诉我他每天三顿饭都吃些啥：“一天至少吃两三个鸡蛋，还喝一大碗麦乳精哩。”问他吃肉不吃，他说：“不爱吃，人老了，牙口不中啦。”

谈起种树的事，老人精神更旺了。平时好像老是睁不开的两只眼睛，忽然闪出光来。他告诉我，他老两口还住在苗圃里。苗圃，村里已经承包了，他大儿子一家都搬进了苗圃，承包了苗圃的大部分，成了林业专业户。他的孙子们除园林从洛阳林校毕业以后就在县里林业局工作外，其余都跟着他爹种树。

这时候旁边的邻居们也七嘴八舌地插起话来了。

有人说：现在潘家成了林业世家了，一家三代人侍弄树苗，代代相传，报上都登出来了。

也有人说，老爷爷给他五个孙子起的名字都带一个林字，除了园林以外，还有长林、忠林、森林、国林。

园林说：俺爷一辈子爱树，也希望我们能继承祖志为



人民种一辈子树，为国家林业做贡献。说到这里，园林还告诉我，这几年他爷爷卖树苗和更新大树所得的收入，已拿出 5000 元为村里办电，买了一台变压器，又拿出 3000 元给了小学支援教育。现在，村里种树的积极性很高，他爷一直到现在还天天拄着拐棍到处转，摸摸这家的树，看看那家的苗。

我问老坚决现在还有人毁树苗没有，他说：“没有啦！你看眼前这树木不是齐刷刷地都起来了吗？看着这些树木林樟，我觉得心里舒坦。”从这里，我想起那年我来采访他的时候，曾有这样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那时候老坚决一个人在苗圃里育苗，经常有些孩子跑到苗圃来糟践小树，每次都被老坚决拿着棍子撵跑。孩子们恨他，咒他，但也怕他。有一次，几个顽皮的孩子在去苗圃的路上堆了一个坟头，上面插一个白幡，写着“老坚决之墓”几个大字，企图用这种恶作剧来报复这个视苗如命的老人。

几十年过去了，老人的苗圃毁了种，种了毁，三起三落，但都不是毁于孩子，而是毁于那些人为的风暴；那些无法无天的岁月。每提起这些事，老人的心都碎了。他曾多次向我说过：“什么时候能看到林网长起来，风沙再不祸害庄稼，那该有多好。”如今，听他说，望着齐刷刷长起来的树木心里觉得舒坦，我是深深理解他发自内心的欢乐和慰藉的。

有人提议我们和老坚决全家合照一张相，一来庆贺老人一家四世同堂，二来也是欢迎我第四次来这里访问。照相时人们让我坐在老两口的中间，让老人的重孙们偎在我们膝前。对这一点，老太太显得特别高兴。她今年 88 岁了，比丈夫还大四岁，但身体好，记忆力也强。我采访老坚决时许多难得的材料，都是她向我提供的。至今她还记得我每次来访的情形。她对我说：“你这是第四回来俺家了。还能不能再来四回？”我说：“要是我能活到您这么大岁数，我还能再来四回！”老太太张开没牙的大嘴，笑了，连说：“那中、那中，那准能！”

(二)

从 1965 年冬我第一次采访老坚决开始，已过去了 20 年。这 20 年人世沧桑，我们都经历了许多磨难，但彼此心始终是相通的。1979 年初，我第二次访问他的时候，在《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中，详述了他的事迹，也倾注了我对他的深沉的热爱。我几乎是同他一起在文章的末尾，喊出了“不能再折腾了！”这一共同的心声。

也正是在那一年，我参观了宁陵县几处没有毁坏的梨园。当时正是梨花盛开的时候，雪白的梨花像一片云霞围绕着村庄。这些都是宁陵著名的品种梨，名叫“金顶谢花



酥”，是一种远销国内外很受欢迎的优质水果。当地群众说，他们这里的每一棵梨树，几乎都浇灌着老坚决的心血。为了发展这些优良树种，老坚决不知培育了多少树苗，走过了多少农家地头，嫁接和剪修过多少棵梨树……

记得，我 1965 年访问老坚决的时候，他的苗圃里正培育着这种梨树。当时，他曾移出两棵送给我，要我带回北京去种，但因路远不好带，我让种在郑州新华社河南分社的院子里了。谁想到不久就遇上“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结果，那两棵梨树也没有逃脱被毁掉的命运。

想起这些往事，望着那一林繁花，蜂蝶闹嚷的景象，我心想：如果不是那些人为的风暴，如果人世间多几个老坚决这样的种树人，我们的大地又将是一幅如何美丽的图画！

1981 年夏天，我接到老坚决一封来信，从字里行间，我看出了老人想来北京看看的愿望。当时，我立即写了一封信欢迎他来我家做客。我想，一个为人民种了一辈子树木的老人，在垂暮之年想看看北京，这一心愿无论如何应该得到尊重。

就这样，在那年的夏末秋初，老坚决穿着一身新衣服来到了北京，陪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儿子。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进京城。这件事，对于一个整年累月同泥土树苗相伴的老农来说，确实是件不平常的大事。过去，在他的心目中，开封和郑州就是天下最大的地方了，如今，来

到北京，亲眼见到向往已久的天安门城楼，游览了过去皇帝住过的故宫，参观了繁华的城市、著名的古迹，还受到了林业部部长的接见和鼓励，这一切，老人怎能不打心眼儿里感到兴奋呢？

有一天晚饭后，我同他坐在我家小院里闲谈，我问他在北京看得可好？他连忙说：“好，好，想不到我这老头子，土埋半截啦，还有这么大的福气。过去，俺庄户人，人老几辈谁想着能到北京呀，这回俺就来啦，真像做梦一样……”我说：“那您就多住几天，再好好看看。”他说：“够啦，够啦，都七八天了，该回去啦。”接着他又凑近到我跟前像说什么悄悄话似地告诉我：“你没看这阵子天没雨，我心里总不踏实，光怕地里的树苗渴着。”一句话使我仿佛见到他那颗跳动着的金子般的心。

不久，我便送他们回去了。

第二年秋天，我因事再去豫东，又顺路到他的苗圃看望了他。在参观他新培育的树苗时，老人指着几棵樱桃树苗对我说，这是专门给我栽种的，并且说，他已经培育了两年，都长得不好，只有今年这几棵最好。当时，我心里不觉一怔，后来才忽然想起，我1979年第二次访问他的时候，曾同他谈起过“樱桃好吃树难栽”的事。当时，他还说，“说难也不难，将来我给你栽两棵试试。”这件事我早已忘了，没想到他却当成一件大事在那里默默地试种



了好几年。

到1983年春天，老坚决果然托人给我送来了两棵樱桃树。据来人对我说，这两棵树苗，连带培育它的湿土，都是老人亲自包扎好，让他一路小心着用扁担挑过来的。老坚决并带话给我：“选个向阳的地方，趁季节赶紧种，只要种时浇足了水，能活。”

如今，这两颗樱桃树都种在新华社的大院里，虽然因为盖大楼迁移了两次，但始终长得很好，只是还没有开花结果。我每次打它们面前经过，总禁不住要停下脚步，深情地望着它们，就好像看着老汉正弯着腰、仰着脸、微笑着站在我的面前一样。

1984年和1985年两年间，我没有再见到老汉，只零星地听说，他的孙子园林进了洛阳林业学校。村里的苗圃已经承包到户。老两口还住在苗圃里……去年初冬的一天，我正准备出发到南方去的时候，园林忽然从河南跑到北京来，说非要见我不成。我当时吓了一跳，以为老汉出了什么事，便赶紧让他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见面我就急忙问他：“你爷爷奶奶可好？”

“好，爷爷身体可扎实啦！”

我一听，就放了心，然后问他：“那你有什么急事要跑到北京来见我？”

“是俺爷要我来的。”他说：“我从洛阳毕业回去，

俺爷就逼着我到北京来，说他好几年没见你了，想你啦，非要我来看看你啥样不可。”说着，他从包里拿出一包新花生和一瓶香油摆在我的桌上。对我说：“花生是今年刚收下来的，俺爷让你尝尝新，香油也是村里小磨磨的，爷爷说北京买不着……”

当时，我只觉得心里一股暖流涌上来，眼睛一下子湿润了。嗓子里像堵着什么东西说不出话来。半晌，才像自言自语似的说：“就为看看我，值得跑一趟北京？”

“就是来看看你，真的没有别的事。”园林怕我不相信又重复了一遍。并且告诉我，春上他曾因事到北京来过一次，老人要他顺便来看我，不巧，那时我出国访问去了，没有见着。回去他爷爷就把他狠狠数落了一顿，说他没材料。所以，这回就让他专门再来一趟。临来前爷爷还再三叮咛他，要是有机会，希望我再去宁陵，看看他们的好日子。

我说：“你爷爷的心意我清楚，可今年我太忙，明年再说吧！”随后，我从抽屉里找出一张放大的彩色照片交给了园林，要他带回去给爷爷，并且对他说：“这是我最近刚照的相片，让你爷爷看看，我现在不是很好吗？”

园林接过去照片高兴得什么似的，笑着说，“这回可好了，有了这张照片，保险俺爷不会再骂我了。”

看着他那天真兴奋的神情，我也忍不住笑了。



(三)

离开潘家的大院，我搀扶着老坚决一路说笑着来到了苗圃。这是老汉夫妻两人生活和劳动了几十年的地方，我几次访问老坚决，都是在这里和他交谈的。我知道，这里方圆几十亩的土地，每一寸都浸透着老人的汗水；苗圃里大大小小的树木，每一棵都是在老人的抚育下成长起来的。几十年间，这里一批批小树成长为大树，一批批大树又换成了树苗，绿色的生命循环不息。

我每次来到苗圃，总不免把老人的形象同满眼郁郁葱葱的林木联系在一起。正是这位佝偻的老人，从壮年到老年，年复一年地把自己的岁月刻进了树木的年轮，用满头的白发换来了大地的锦绣。他，为人间增添了多少青翠，带来了多少生机！

老人把我带进苗圃的新居，只见宽敞的堂屋里洒满了阳光，屋子里收拾得很干净，桌上摆着茶水和花生，墙壁上挂着政府授予他的许多奖状。在一个装满照片的镜框里，我发现让园林带回来的我那张彩色照片也端端正正地放在里面。据园林说这几年来这里参观访问的人多了，他们都照了不少的照片，有的人画了画，有的人还写了诗哩！

我说，“现在这里热闹起来了，老人再不觉得孤单了吧！”老人笑着点点头，然后说，“现在可不比往年啦，

那时候除了媳妇、儿，谁也不来踢俺的门限。”

我说，“我和陆拂为不是来过吗？”老人说：“那，除了你俩。”

一句话把全屋的人都说笑了。

记得，1965年我第一次来时，这里还没有房子，老人独自住在一个窝棚里，老伴整天从家里往这给他送饭，抱怨说，不知哪一天他还得被风沙埋起来。第二次我来看，房子倒盖起了几间，但黑咕隆咚，非常简陋。冬天屋里生着煤火也挡不住四面透进来的寒气。老人住的那两间，里间，除了一张床，一张小桌，一个煤火和两条长板凳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东西。外间却养着几只羊，实际上是个羊圈。



1986年3月，穆青看望植树模范潘从正。



一进门就是一股子羊粪和羊骚气。那时候，老汉身体不好还躺在床上养病，他的老伴为他煎药熬汤，一直在身边照顾他。就是那一年，他对我说，已经好多年没有人来看过他了，因此，我才在文章中把他形容为一颗尘封土埋的明珠。

如今，这里又盖了一排新房，他的大儿子也来安家落户了。苗圃里一片兴旺，早已今非昔比了。今年他们全家已种了1000多棵树，老人说不论大人小孩，指标是每人120棵。谈话中有人说现在苗圃有儿孙们接班了，老两口应该搬回家里享享福啦。他的二儿子连忙阻止大家，可别再提这件事。他说：“今年春节时，全家又劝俺爹搬回家去住。可他就是不答应。结果，还惹他生了一场气把全家数落了一顿……”说到这里，老人在一旁忍不住插起话来。他指着儿孙们对我说：“他们知道孝顺，可就是不知老人的心，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想望啥？我早就对他们说，这辈子我哪也不去，决心死在苗圃，埋在苗圃。死了，在坟里也要守着树苗！”

老人越说越激动，屋子里活跃的气氛，仿佛一下子凝结起来。我心想：一个多么可敬的老人啊！他的心简直像一潭纯净的泉水，容不得半点尘埃。在他的身上，我看到我国劳动人民许多纯朴和高尚的美德。对生活他无所奢求，对社会他只知奉献，他一心所想的无非是尽自己的一切，多做些于乡亲、于人民、于国家有益的事情，为子孙后代

留下一双勤劳的手，一颗洁净的心。

这时候，园林走进来，要求我和他爷爷在这里合种一棵树，留个纪念。我说这是好主意，就立即答应了。

树是棵泡桐树，就栽在老人房前路边的高坡上，人们说等这棵树长起来，这里就是个绿荫的庭院。到那时再有人来参观，就更有意思了。

人们已经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园林为我们扶着树苗，我和老人一齐往树坑里填土，并围着树苗用脚把浮土踩实，然后又浇满了水。有人为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孩子们也高兴得拍起了巴掌。许多人都围着这棵树议论，说这是棵友谊树，体现了一个老记者和一个老劳模多年深厚的友谊；



潘从正与穆青同栽友谊树。



也有人说，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篇有意义的文章，是《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的继续……

听着这些热情的话语，我的心情也很激动。心想，20多年来，我和老人的友谊都是通过这些绿色的树木沟通的，不论是那被毁的梨树，将要开花结果的樱桃树；还是这次新栽的泡桐树，都是我心中永生的树。因此，我对园林说：“这是一棵友谊树，也是一棵扎根在你爷爷和我心上的树。今后，这棵树就交给你了，希望你爱护它，浇灌它，使它枝繁叶茂，永远常绿！”

1986年9月1日

潘从正墓碑

长眠在这里的是一位普通的农民，他名叫潘从正，人称“老坚决”。

他在世 87 年，却有半个世纪抛家离舍，同妻子住在沙荒地里育苗圃植树造林。风沙曾掩埋过他，断粮几乎使他送命；病了，他不肯离开，老了，还趴在地上拖着土袋修了 50 米坡路。

他千辛万苦栽培的苗圃和防护林，历经劫难，几起几落，但他并没有气馁。他说：“他毁，俺栽。他再毁，俺再栽。俺是为国家，为子孙后代！”

此处原先有棵老柿树，年年都挂果，纵是压弯了腰也硬撑着。他常夸这老柿树不偷懒，说人生也是一棵树，也应该多结果。老柿树移栽到别处后，他对家人说：“我死了就埋在这里。”

如今，他的遗愿实现了。经他培育的树苗已经绿满宁陵大地，4 里长的防风林已堵住了万碧风口，2000 多亩风沙地也已变成良田。他年复一年地把自己的岁月刻进了树



木的年轮，用满头的白发换来了大地的锦绣。你看，那高大的树干，是他坚实的身影；雪白的梨花，是他高洁的灵魂；绿色的风涛，是他爽朗的笑声；郁郁葱葱的林带，是他生命常青的丰碑。

他默默奉献的一生，是我国一代农民的风范，他为国家为人民缀网劳蛛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

历史将会证明，他比我们更年轻。



孙 钊

孙钊去世后，县委书记高高举起孙钊那双凝着乌紫的血痕、断指还在发炎的手，向周围的干部、群众大声说道：

“大家看看，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这是双劳动的手，坚强的手，为人民造福的手，这就是一个共产党人的手……”

老孙钊没有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一点遗产，却给拍石头乡上万人的子孙留下了一片又一片崭新的山河……

难忘那双手

去年10月我到河南辉县访问时，正逢太行的秋天。温暖的阳光抚慰着峻峭的崖壁，山谷间云蒸雾涌，翻滚着金色的光柱，一树树灿黄的柿子，深红的山楂，衬着青蓝色的群峦叠嶂，就像一幅精心写就又漫不经心地留在这儿的油画。这是一块让我梦牵魂系的土地。早在十多年前，我曾几度报道过这儿的人民治山治水的情景，许多激动人心的人和事至今还深刻在记忆



河南辉县太行秋色。



里，有时清夜梦回、凭窗远眺，我都会猛然想起这些，虽岁月流逝亦难以忘怀。

抵达辉县的当天下午，我们就奔向县城东北方向的拍石头乡。这个乡当年是全县最穷困的山区，大部分处在一条干旱的郊东沟里，1969年8月才单独划出来，成为拍石头公社。一个在战争年代打过游击的老共产党员孙钊，带领十七八个干部来到这里开展工作。当时的拍石头，全境没有一块平川，也没有活水源，25道荒山野岭全是光秃秃的，13条大河沟乱石滚滚，土地是“瓢一块碗一块”地“挂”在山腰上。解放后20年间，这里年年吃返销粮，甚至连群众的吃水和烧柴问题都没有解决。

汽车沿着柏油公路飞驰，窗外掠过的已不是当年的荒凉景象，而是一片片绿林，一条条整齐的梯田。在连绵不断的梯田中段，有一处断裂带，几百米长的河滩原封未动地摆在那里。这是当年在这儿为子孙造福的人们，特意给后人留下的一块荒滩，它告诉人们什么叫当年的乱石滚滚。荒滩上竖了块醒目的牌子，上写“教育滩”三个大字。这鲜明的今昔对比不仅述说着郊东沟的变迁，更昭示人们不能忘记苦难的过去。看到这些，我不禁想起十多年前我两次到此采访的情景。那时千军万马筑堰造田的景象仿佛就在眼前。我永远忘不了，就是在改造这条郊东沟的工地上，我第一次看到那个一身补丁、两鬓斑白的公社书记孙钊同

志。以后，他不幸去世，我也是在这条沟里，沿着梯田，踏着青石，到处追寻着他的足迹。如今十多年过去了，往事依稀，更觉得这梯田仿佛就是他理想和生命的再现，老孙钊也许又会从这梯田里匆匆向我走来。

汽车把我们送到乡政府依山建成的院落。门口是一排两层楼的楼房，远比当年拍石头公社气派多了。但我没有走进这个院落，只急切地想寻找那个我采访过的公社旧址。我记得，那是一座用石块垒起围墙的破旧的小院，只有十来间矮墙小窗的旧式民房，其中五间原是供销社的旧仓库。后来成了拍石头公社干部们的宿舍兼招待所，地上用麦秸铺成大通铺，十几个人就这么挤着一起睡。那小小的办公室里，公社书记孙钊和党委委员们合用一张办公桌，每人一个抽屉放文件，屋里最齐整最显眼的东西是每人一个盛衣物的旧炸药箱。那些小屋冬天透风、夏天漏雨，要不断修补才能住人。县里几次拨款给他们盖新房，可他们都把钱用在造田修路上了。记得我第一次采访时，小院的大门上还贴着两条毛主席语录：“既当‘官’又当老百姓”，“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那是孙钊到任后不几天让人写的。

两位乡干部把我们带进那个小院。西斜的阳光洒了一地，带着谷香的秋风轻轻地摇着树枝，摇着窗扉。院里静悄悄的，所有的门都锁着，一如当年大战郊东沟时那样。



我借着阳光，从门缝向里张望，又把同行的年轻记者叫过来，让他看看当年拍石头的干部们在那场改变大自然的战斗中，是如何生活过来的。

现任乡党委书记霍永，今年 39 岁，当年是孙钊领导下的治山治水专业队队长。另一个乡党委委员路军昌，那时候还是个跟随孙钊的小通讯员。他们和孙钊刚来的时候，这里山穷水穷人更穷，老百姓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没烧的。孙钊到任的第一个冬天，县委书记郑永和为支持这个新建公社的工作，曾带领县委的干部们拉着架子车把煤从县城运到公社。然后再由公社的干部组成扁担队，挑进深山。从公社所在地到张泗沟一带，40 里高山陡坡羊肠路，空身走都很艰难。51 岁的孙钊每次都担上 100 多斤煤领头爬这条险路。那时候正逢下雪天，寒风中，人们外衣结成冰甲，内衣却被汗水浸透。他们上午翻过海拔 1000 米的宿羊台、阎王鼻等悬崖陡坡，下午又担上公粮踏碎河滩上的冰凌赶回公社。每天往返 80 里，整整担了一个星期。

这是一次真正的雪中送炭，他们不仅为群众送去了温暖，更送去了共产党员一颗颗炽热的心。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这无声的感情更能取得人们的信任呢？就这样，在第二年的冬天，拍石头的人民在孙钊的发动下开始了改造山河的战斗。经过两个冬春的苦干，他们在高山顽石上硬“抠”出了通往后山的公路，在前山建起一条石砌的盘山水渠。

从第五个冬天开始，孙钊带领全公社 15 个大队的干部、群众大战郊东沟，把乱石河滩改造成良田。整整两年间，他们在郊东沟里打起了 100 多条水泥浆砌的石堰，把乱石压平，然后从两旁山上取下大量黄土，平铺一米多厚，使 40 里长的千古乱石河滩变成了层层梯田。

孙钊在拍石头的 6 个冬天，一直住在工地上，其余时间就在各队蹲点。后山有个黑沟水，前山有个张飞城，是他抓的两个点。他就像老百姓的家里人，经常给五保户挑水，或拉车送病人去医院。在张飞城他住的小屋，低矮昏暗，烟熏火燎，而他却认为，老百姓的麦秸草铺睡着最安稳，最解乏。他吃饭不让专门派，收工后，看到谁家饭粗就到谁家去，揭开锅自己舀。

一年四季，他身穿补丁衣，脚穿打掌鞋，跟社员一样晒太阳，一样受风霜。夏日的骄阳把他黑色的衣服晒褪了色，蓝色的衣服晒得发白。他站在社员群众中，外人根本分不清谁是书记，谁是社员。无论到哪里，他总是一个布背包，一辆自行车，一副劳动工具。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办公室，哪里就是宿舍。他在郑州的姐姐来看他，不忍地问他：“你从小就受苦，这 50 开外的人了，还要这么苦下去吗？”他老伴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一个人拉扯着五个孩子，有一次跑到拍石头来，眼泪汪汪地对他说：“你就这么狠心，不管这个家了？”孙钊安慰她说：“咱家再苦，有吃有烧，



总比拍石头老百姓好得多。党把上万人交给我了，我能不管吗？”他亲手给老伴做下可口的饭菜，留她多住了几天，自己还是很少回家。有时老伴病犯了，他就派小通讯员往家里送药，一来二去小通讯员后来竟成了他的二女婿。

公社院门旁有一间小房，地势较低，屋顶平平的，比两三张双人床大不了多少。当年，我和郑永和、孙钊曾在上面铺上草席，喝着大碗茶谈了很久，从当时的苦干，谈到拍石头的未来。记得那一夜，我们三人就睡在这屋顶上。如今，房子犹在，小院如昔，唯独再不见老书记孙钊的身影，听不到他爽朗的笑声。一种悲怆的失落感，使我默默地走出了这个小院……

汽车沿着上山的公路，一直向深山中驶去。往日的荒山野岭，都改变了颜色。茅屋草舍已变成崭新的瓦房，层层整齐的梯田，一直向高山深处延伸过去。两旁山坡上、村路边，红果树、柿子树、黄楸树正挂满果实，发出诱人的色彩。也就是在这条山沟里，当年老孙钊曾领我翻山越岭到处查看，指点着将来哪是红果岭，哪是松树林。现在，我虽然已认不出这些地方，但遍山的青翠，满目的红果，不都是老孙钊他们心血的结晶吗？

我慢慢走上一座山头，极目四望，太行山峰峦叠嶂绵延无尽。在蓝天白云之下，远远近近一个个山头默默地耸立在那儿，它们是那么雄伟，那么庄严，那么令人神往。

我忽然觉得它们不就是我心目中那些默默奉献自己、造福人民的共产党员的群像吗！其中就有老孙钊那高大的身影。他们一个个昂首挺胸，千秋万代屏卫着大地，哺育着人民，任朝霞夕晖在他们身上，永远留下绚丽的色彩……

下山的路上，我提议看看孙钊的墓地，被同行的老书记郑永和阻止了。他说，路不好走，时候也不早了，不去了吧？我默默地看着他，没有再说什么，我理解他的心情，他是怕我触景生情，会过分激动。其实，我担心的正是怕他太激动。他和孙钊有着几十年并肩战斗的友谊，孙钊去世后，他每次向我谈起当时的情景，无不声泪俱下，难以自持。

那是1975年冬天的一天。孙钊4点半起来出早工，天黑路滑，不小心从两丈多高的崖头失脚踏下，摔得浑身青紫，右手断了一个手指。57岁的人了，哪经得起这一摔。他强忍着伤痛，用手绢扎了扎，又爬上山坡，坚持劳动。大家只见他干活出汗格外多，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摔断了手指。晚上，伤手肿到胳膊了，才被人发现，连忙送他去找老中医。医生给他接上骨头，要他用绷带把手吊起来，好好休息几天，可是孙钊坚决不答应，只把受伤的手插在上衣第二和第三个纽扣之间，像平常一样又回到了修筑大渠的工地。那时，工地上正急着用沙，他把伤手插在绳套里，去40里外拉沙，每天往返一趟，一连拉了五天。沙拉完了，他又去抬石头。



由于用力过猛，刚接上的指骨又脱开了。钻心的疼痛，使他难以入睡，只好再找医生接。老中医一看急了，对他说：“你还好意思来见我吗？像你这样，神仙也难治好你的手！”医生好不容易再次给他接上，没想到十几天后，干活时那手指又第三次折断了。这次，他忍住疼痛，没敢再去找医生。

11月20日，老孙钊离去的那一天，他跟往日一样白天在工地干活，晚上把村里的干部叫来开会。直到上了床他才说身上发冷、头疼。同屋住的公社干部老杜要给他找医生，他说：“天太晚了，别打扰他们了。”只喝了几口开水就躺下了。他对老杜说：“这是咱们在工地上过的第七个冬天了。一说起这，都说咱们是苦干。我看苦干总比苦熬好，苦熬没出路，苦干才能干出头。”他们唠了好一阵子，临到老杜要睡着了，孙钊还嘱咐他明天督促人们返工重修大渠渠线下的一段公路。

第二天早上四点半，到了老孙钊每天起床的钟点；老杜看他没醒，以为他太累了，就没叫他。早饭之后，老杜看他还没动静，进去喊他，才发现他不知在夜里什么时候犯了心肌梗塞病，已经在铺着麦秸的小木床上悄悄去世了。薄棉被上搭着他穿了好几年溅满泥水、石尘的黑棉衣裤，床边仍放着六年来从没离开过他的工具：一对铁锤和钢钻。

孙钊去世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周围山村的乡亲们翻山越岭跑来了，民工们放下工具赶来了，老人和妇女们也互相

搀扶着走来和自己的老书记告别。人们挤满了小院，一片唏嘘之声。乡亲们对自己爱戴的亲人离去，除了一行行滴不尽的热泪，又能说什么、干什么呢？当时，县委书记郑永和正在外乡工作，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急忙从百里外赶来。他轻轻地掀起薄被，望着老战友那安详的面容，泣不成声。特别是看到孙钊那结满铜钱厚老茧的双手，凝着乌紫的血痕，断指还在发炎，整个右手肿得老高，郑永和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他激动地把孙钊的双手高高举起来，向周围的干部、群众大声说道：“大家看看，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这是双劳动的手，坚强的手，为人民造福的手，这就是一个共产党人的手……”

郑永和这句话像炸雷一样，震颤了人们的心灵。小屋里低沉的啜泣声一下子像开了闸的洪水，哭号声响成一片……

孙钊逝世不久，我又到辉县采访，专门访问了孙钊的家。家人为我翻遍他的遗物，竟没有发现一件新的衣服。甚至家里也没有衣箱、衣柜。只有一张他老伴出嫁时带来的桌子，几十年烟熏火燎，早已面目全非了。老孙钊没有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一点遗产，却给拍石头上万人的子孙留下了一片又一片崭新的山河。荒寂的野岭通了公路，苦旱的土地有了甘泉，瘦黑的孩子们有了吃喝。他在拍石头6年，带领大家给苦旱的拍石头带来的是4座中小型水库，80多个大型蓄水池，十几个提灌站；85000多米石砌盘山大渠，使



这个过去吃水贵如油的地方，一半耕地成为水浇地；13条干河沟修成了良田。这些艰巨的工程，无疑给这个贫困的山乡打开了生路，奠定了脱贫致富的基础，但我觉得孙钊留给后人最宝贵的遗产，还不是这些，而是他那双令人永世难忘的手！

多少年来，这双布满老茧伤痕累累的大手，经常在我眼前晃动，它像一面火红的旗帜，引导我，激励我，给我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在我的心灵深处，这双手已成为共产党人热爱人民无私奉献的象征。无论走到哪里，也不管再过多少年，老孙钊的形象，他那双血迹斑斑、动人心魄的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永远，永远！

1992年6月1日



任羊成

“除险英雄任羊成，阎王殿里报了名。”

任羊成脱下上衣，露出了一圈厚厚的老茧，像一条赤褐色的带子缠在腰际。我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那条伤痕，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里早已充满了泪水。我紧紧握住他的手，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两张闪光的照片

不久前，河南《安阳日报》刊登了一幅新闻照片，反映当年修建红旗渠的劳动模范、如今已 65 岁的任羊成，又腰系粗绳，手执撬杠，攀援在悬崖峭壁排除险石的情景。看到这幅照片，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种肃然起敬的感情，使这位老共产党员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加高大了。

我第一次见到任羊成是 1966 年初。那年，我到林县红旗渠采访。当时工地上流传着一句顺口溜：“除险英雄任羊成，阎王殿里报了名。”那年任羊成才 30 多岁，担任工地除险队队长。哪里有险情，他就出现在哪里。他整天腰里系着一根粗绳，手拿撬杠和铁锤，让别人把他从山顶送到悬崖峭壁间凌空作业，打炮眼，除险石。长年累月地在崖间飞来荡去，他腰部被绳子勒出一条条血痕，经常血肉模糊地粘在身上，连衣服都脱不下来。妻子帮他脱衣服时，常常心疼得流泪。

我采访任羊成时，红旗渠工程已基本竣工。我问他身上是否还有绳勒的伤痕？他说，还有。他脱下上衣，果然



任羊成在修建红旗渠的施工现场。（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露出了一圈厚厚的老茧，像一条赤褐色的带子缠在腰际。我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那条伤痕，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里早已充满了泪水。我紧紧握住他的手，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还用说什么呢？那一圈老茧，已经说明，为了红旗渠，他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做出了多大的奉献！

我为他披上衣服，说：“羊成，你受苦了！”

一句话，他眼里也顿时闪出了泪花。

那次采访，还有一些事深深地打动着我们。

1960年秋，红旗渠修到鹤鹑崖，要从鹤鹑嘴下通过。那地方上不见青天，下面是滔滔漳河水。当地老百姓形容：

“鸪鹑崖是鬼门关，风卷白云上了天，禽鸟不敢站，猴子不敢攀。”就在这么个险要的地方，由于放炮开山，被震裂的石块还不住地往下滚落。如果不及时地把危石除掉，水渠就无法开工。正是在这种危难的情况下，任羊成自告奋勇下岭除险。当地两位老汉见他们在70多丈高的鸪鹑崖上观察地形，要从那里下岭，大声嚷道：“这儿上不得啊！那是见阎王的地方，上一个死一个。”任羊成一心扑在工程上，哪里顾得上什么危险！他让同伴们在崖顶砸实钢桩，看好大绳，自己便身系绳索下了悬崖。崖深风大，任羊成在悬崖峭壁间来回飞荡，多少次险些撞在石壁上，他都机智地荡开了。崖上的人为他揪心，崖下的人为他捏汗，可是他却成功地除去了一块又一块险石。没想正当他抬头往上了望，一块石头突然落下，正好砸在他的嘴上。一阵钻



修建完成的红旗渠。



心的疼痛，几乎使他昏迷过去。他想向崖顶喊号，但觉得满嘴麻木，怎么也张不开，舌头也动弹不得了。用手一摸，原来一排上牙全被砸倒，紧紧压在舌头上。他从腰里抽出钢钎，插进嘴里把牙别了起来，谁知用手一扶，四颗门牙都断在嘴里了。任羊成吐出断牙，又吐了一口血沫，摸摸嘴，整个嘴巴都肿了起来。

以后好多天，任羊成戴着个大口罩，坚持在悬崖峭壁间工作。

还有一次，任羊成在通天沟工地除险石。通天沟上伸出一道十多丈长、一丈多宽的青石崖，石崖两旁长满了带刺的葛榛。那天，任羊成把老绳搭在青石崖上，当他脚踏崖壁用力荡起的时候，因老绳滑动，任羊成整个身子被抛进了荆棘丛中。遽然，一阵钻心疼，仿佛要把他撕裂成无数碎片，半寸长的圪针扎遍了他的全身。

任羊成倒在荆棘窝里，动弹不得了，哪怕轻轻动弹一下都会引起全身剧烈的刺痛。过了很久，他咬紧牙关挣扎着荡了出来，忍着浑身的刺痛继续清除危石。

黄昏下工以后，任羊成回到住地，对房东大娘说：“大娘，找个大号的针给俺挑挑身上的圪针。”

羊成一脱布衫，大娘吓得打了个愣怔：“呀，孩子，你咋叫扎成这样！”她一边挑一边心痛地叹气：“这么多圪针，叫俺咋挑？”羊成说：“那就拣长的挑吧。”

不一会儿，大娘就挑了一手窝。羊成说：“大娘你歇歇，叫你儿子来。”

羊成脱下裤子，叫大娘的儿子挑下半身。小伙子一看，也吓了一跳，说：“去给领导说说吧，赶快请医生！”羊成说：“就是不让领导知道才叫你挑的，可不能说！”小伙子挑了一阵，两人又把扎在衣裳上的圪针摘净，撮在一起，好大的一堆。

冬天，红旗渠施工最艰苦，遇到风雪天危险性更大。当时工地指挥部有通知，为了保证民工的安全，风雪天暂停施工。可是任羊成怕耽误工期，总是看着风雪着急。有一次连下两天大雪，他实在坐不住了，悄悄率领三个民工，在四眉岭上燃起一堆篝火，让同伴们看好绳，便系上绳索一个人下岭了。

雪越下越大，任羊成在风雪中飞荡，不一会儿，他的头上、肩上便积起了厚厚的雪，衣服冻成了冰甲。从早上到晌午，他像一个雪人在半空悠荡着，等他除完危石下到崖底，手指都冻僵了。同伴们从崖顶下来帮他解下老绳，他两腿已经不能打弯，伙伴们把他扶到一个山洞里，用棍子敲去他身上的冰甲，又生起一堆火，好一阵才把他暖过来。

任羊成的事迹，我本想再深入采访后把它写出来，但时隔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此事也就无从谈起。为此，我心里一直不安。几十年来，每想到林县红旗渠，任羊成



的形象就在我眼前闪现。我忘不了他腰间的那一圈老茧，忘不了他那满身的圪针，更忘不了一个普通农民对党对人民的那颗赤诚的心。

1990年夏天，《中国记者》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我对任羊成的思念，河南《安阳日报》的两位年轻记者看到后，专程赶往林县采访，在群山环抱的任村镇古城村的偏僻山沟里找见了任羊成。当年英名传遍红旗渠的特等劳模，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开始，他对两位记者的突然出现感到有些茫然，记者问他过去修建红旗渠的情况，他只淡淡地说：“过去的事，提它干啥？”当记者转述了我对他的怀念之情时，他眼里立时泛起亮光，说：“穆社长还惦记着我这个大老粗？”接着他又说：“你们要是日后能见到他，一定代我问好。”

当年初冬，那两位记者专程来北京见我，从他们的谈话中，我才了解到这些年来任羊成的一些简况：

红旗渠修成后，任羊成作为一名护渠工，一直守护在红旗渠上。“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人和事被弄得黑白颠倒，林县也没有逃出那场劫难。当时，红旗渠被称为“黑旗渠”，修建红旗渠的人民功臣变成了“罪人”，任羊成和许多劳模一起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从没有离开红旗渠一步，每天仍不停地为红旗渠清淤、勾缝、治漏，直到他退休。

任羊成的家乡古城村，位于林县深山区，交通闭塞，土地瘠薄，红旗渠水一时还流不到那里。1987年，任羊成退休回到家乡后，眼看乡亲们吃水、用水困难，他便带头集资组织人员，昼夜打井。山区打井谈何容易，凿下去尽是石块。一口井打到15米深，还没有一点潮气。有一次，任羊成不小心失脚从井壁跌入井底，脚脖子被摔错位，他咬咬牙坐起来，忍着剧痛自己猛力将错骨扳正，然后让人用绳把他从井底拉了上来，没过几天，他又拖着伤脚系着绳索下井了。

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正为没有资金、井打到26米没法再打下去发愁。问他的生活，他什么也不愿说。据两位记者观察，他依然住在破烂不堪的土坯平房里，睡的是土坯上架的一块木板，家里空空荡荡，连一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记者说，任羊成每年还要上山开点荒，种点谷子、红薯，补充全家的口粮，看样子生活还很艰难。

听到这里，我不禁一阵心酸，没有想到，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林县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位为红旗渠出过大力气的劳模，现在还是这样清苦。

我对两位记者说，建议你们向市县领导反映一下，最好能支持任羊成把井打下去。不能让为人民筑渠引水的人自己吃不上水，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啊！

临分别时，我特意挑选了一张自己的照片，请记者转送给任羊成。我在照片背面签了名，并写上“送给人民功



臣任羊成同志”几个字。

两位记者重返林县古城村不久，就打来电话告诉我：“任羊成看到您的照片，感情非常激动，一边看一边流泪，老念叨着要去北京再同您见上一面。”

我说：“我欢迎他来，不过，天气冷，他年纪大了，你们最好能陪他一起来，路上也有个照应。”

1991年初，任羊成由两位记者陪同，来到了北京。

我在办公室里欢迎任羊成。一见面，我们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彼此的心情都非常激动。20多年没见面了，我从上到下打量着他。这位我心目中的英雄，还是当年那一身农家打扮，只是脸上多了一些皱纹，鬓角长出了白发。



20世纪90年代穆青在办公室与任羊成相见。

他比我第一次见他时瘦了些，但两眼还那样炯炯有神。他给我带了一些小米和绿豆，说是他自己种的，表示一点心意。别看那布袋上还打着补丁，但我打内心知道，那袋里所装的是山里人的一片真情啊！

我们促膝交谈了很久。我问他当年腰里的那圈老茧现在还有没有？他说：早就不显啦，全褪了。问他脚伤留没留下毛病？他说没有。为了让这位来自山沟里的农民一睹首都的新貌，我特意带他到新华社100多米高的新闻大厦顶层参观。任羊成做梦也没有想到能登上北京的高楼，观赏首都的风光，心情显得特别高兴。在楼上，我指着楼下大街上来往如织的车辆，问他：“你看这楼有没有你们林县的山高？”他说：“有。”我说：“羊成，现在再让你捆着绳子从这里荡下去，你还敢吗？”他看看我，毫不犹豫地说：“那咋不敢，敢！”那神情，那语气，简直跟年轻时一样。

任羊成这次来京，我本打算留他多住几天，让两位记者陪他在北京到处看看，可他住了两天，只参观了天安门和故宫，就急着回去了。临走前，我对他说：“眼看春节快到了，我给你带上点米、面，表示一点心意，回去后，见到当年红旗渠的劳模们代我向他们问好！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再去林县看望他们。”

1993年初冬，我同冯健、周原一起踏上去河南采访的旅程。原计划在豫西豫中采访后，再去林县，没想到由于



大雪封山，我们被困在安阳，去林县的计划未能实现。后来，任羊成等几位红旗渠的劳动模范听说我到了安阳，冒雪从林县赶来。他们的深情，着实令我感动。

那天，窗外下着鹅毛大雪，气温骤降到零下十多度。一大早，任羊成等几位老劳模就来到我的房间，其中有钻洞能手王师存，有当年的铁姑娘队队长郭秋英。20多年前，我在红旗渠采访时也都见过他们，这次重逢大家心情都非常激动。郭秋英拉着我的手，眼含泪花，说：“林县人民盼着你来，俺都盼着你来呢！”我说：“这么多年了，能见到你们我也高兴啊！”

在客厅里，我左手拉着任羊成，右手拉着王师存，一同坐在沙发上。我摸摸他们穿的衣服，问他们：“这么冷



穆青左手拉着任羊成，右手拉着王师存，谈到动情处，大家泪流不止。

的天为什么不多穿点衣服？”他们说，外面穿着大衣哩，不冷。我看王师存十分消瘦，问他是不是有病？他说：“前年作了食道癌手术，恢复得还好。今天已是土拥着脖子了，想不到还能见到你。”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

当我问到马有金、路银、常根虎和其他劳模的情况时，郭秋英哽咽着对我说，当年修建红旗渠的八个特等劳动模范，如今只剩下四个人了。有的劳模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磨难，含冤离开了人间；现在活着的人也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受了不少委屈。任羊成说：“俺三个也是代表他们来的，替他们说说心里话。”讲到这里，劳模们不禁失声啜泣，我和其他在场的同志也止不住热泪盈眶。

我一边尽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一边劝慰他们：“以前不愉快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不要再想它了，重要的是向前看。”

我说：“红旗渠是咱们中国人的骄傲，更是林县人民的骄傲。你们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业绩，为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人民的功臣，是值得尊敬的人。没有红旗渠，哪有林县的今天。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我请大家随便吃点水果，把话题引到当前林县的经济发展上。我说：“现在林县的经济发展很快，10万建筑大军分布全国，乡镇企业也取得很大成就，林县已成为全省艰苦创业的典范。现在河南省委正号召全省学习和发扬红



红旗渠精神，全省的县委书记都集中在林县开会，你们应该高兴啊！”

郭秋英说：“我们的命运是和红旗渠连在一起的，今天，林县还要再修一条新的‘红旗渠’，那就是‘争百强县奔小康’，我们还要起带头作用。”

任羊成说：“今年修整红旗渠我又上阵了，清淤、整堰、勾缝、补漏……我干了30公里。”

王师存说：“修整曙光洞，我身体不行了，儿子在工厂上班，儿媳就上去了。我还有两个孙子，我教子孙后代都要发扬红旗渠精神！”

这时，外面的雪停了，云散了，一缕阳光照射进来。我指着窗外，大声说：“你们看，太阳出来了！”一时，所有的人都面向阳光，脸上露出了笑容。

当天晚上，劳模们返回林县，我们也乘车回京。离别时，任羊成握着我的手依依不舍，从那股热乎乎的手温中，我似乎听到了那发自彼此内心的一声：“珍重！”

自那次分别后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在《安阳日报》上看到任羊成腰系绳索下悬崖除险的照片，知道他为家乡的建设事业，又重新披挂上阵，加入了劈山修路的行列。

我从过去的资料中找出任羊成当年在红旗渠工地凌空作业的照片，并把它同现在的一张放在一起。这两张闪光的照片，顿使我热血沸腾，心灵感受到极大的震撼。画面

上同一个人，同样在凌空作业，而时间跨度却长达 30 多年。由此，我深感岁月的更替，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关键还在于他是否有一颗为人民奉献的丹心。

从这两张照片中，我看到了我国一代农民的心境，也看到了蕴藏在群众中的无尽的力量。它给我许多有益的启示，更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它用最生动最形象的语言告诉我们：这就是红旗渠精神！

这就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1994 年 2 月 26 日



阎建章

阎建章曾多次激动地说：“共产党是从穷人堆里发展起来的，但共产党不姓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我们不能带领群众富起来，那还算什么共产党员，还要共产党干什么！”

他说：“我这颗心是党和人民给的，敌人的刺刀剜不去，‘四人帮’的棍棒打不碎，金子银子买不走……”

改革大潮中的老支书

冀中平原上的蠡县辛兴村，从来还没有像今天这样令人羡慕。

在这里，宽敞、明亮的新式农舍，一排接着一排，一栋连着一栋。那些造价几十万元的别墅式小楼，更显出辛兴人的气派。一些人家的家具，还铺着彩色地毯。

全村拥有各类私人轿车 39 辆。

这个共有 6700 口人的村庄，建起了 57 家工厂。农业实现了机械化，粮食亩产 800 公斤。1990 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 2 亿元，人均收入 2700 元。

村头，一个占地 70 亩的化纤毛线市场，已成为辛兴的“聚宝盆”。四方涌来的购销人员，每天多达一两万人，平均日交易额 300 多万元。

现代化的文化活动和卫星电视地面接收站给村里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生活。国家大事，世界风云，成了辛兴人关注的话题。



这情景，如果出现在我国沿海发达地区，也许算不上什么，但出现在历史上贫穷落后的华北腹地，就不能不令人惊叹了。

向当地人问起这一切，他们都深情地谈起了老支书阎建章。

“共产党不姓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事情要从 1977 年 7 月 1 日起。

这天一大早，村上小学校的院内院外就站满了人，选举村支部书记的党员大会正在这里举行。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不只是选支部书记，更是在决定辛兴村未来的命运。

消息传出来了：120 名党员一致选举阎建章为村党支部书记。全村人像过年一样地兴高采烈。

从冀中抗战最艰苦的 1943 年到“文革”开始，阎建章一直担任辛兴村党支部书记。战争年代，他领导群众打游击，敌人曾悬赏一万元要他的人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打成“走资派”，含泪离开了支书岗位。20 多年时间，辛兴的盛衰起落，把他和群众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的心是通着人民的。

第二天，他感触万端地来到了大队部。这里的房子是他亲手修建的。“文革”前的十几年间，他和战友们在这

所房子里领导全村人民治盐碱地，建丰产田，上技术课，红红火火地度过了不知多少个难忘的日日夜夜！今天，这里却变得这么冷清：年久失修的房子裂痕纵横，门窗上破旧的窗纸在沙沙作响。办公室内，地上堆着垃圾，墙上挂着蛛网。只有老会计还守在那张已经很破旧的办公桌旁。

阎建章问他：“队里还有多少钱？”

老会计拉开抽屉，找出了一枚硬币，说：“只有这两分钱。”

阎建章愣了。他知道，十年动乱把辛兴折腾苦了，可万万没想到竟穷到这个份儿上。

老会计又说：“库存现金是二分，实际上欠银行贷款是42万。”

一切都不必再问了，阎建章心里明明白白。眼下村里粮食亩产100多公斤，一个劳力一天只挣一角二分钱。生产队粮仓空空，社员饭桌上每日两稀一干：稀的可以数出米粒来，干的是红薯和菜窝窝。全村还有300多户人家在外讨饭。

在历史的新起点上，阎建章面前就是这样一条布满荆棘的路。

老贫农王眼章找他发牢骚：“从前跟日本鬼子和国民党打仗的时候，你是党支书。你叫我出钱出粮，我饿着肚子也往外拿；你说出担架，我站起来就走；你说给咱的队



伍送东西，我马上套车。我图啥？图的就是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有一天能过上好日子。万没想到，解放好多年了，闹得连肚子都填不饱，真叫人寒心。”

当年和他在地道里战斗过几个春秋的崔春峰，拉着阎建章的手，眼含热泪说：“建章啊，俺什么都不想，往后你能让大伙吃饱红薯，俺就知足啦。”

听了这些话，阎建章流泪了。干了这么多年社会主义，至今还让全村吃不饱，作为一个党支书，再没有比这更刺痛他的心了。

他永远也忘不了十岁那年，父亲惨死在天津一家工厂里，母亲拉着他们要饭，妹妹病饿而死，两岁多的弟弟被卖到山西。正是为了使自己和天下穷人都能过上好日子，他才参加了共产党。他也不会忘记，在革命战争年月里，和他一起浴血奋战的战友，不知有多少人献出了生命。可是几十年过去了，在这块血染的土地上，乡亲们的生活还是这么苦。他深感对不起乡亲们，对不起牺牲的战友。

在支委会上，在党员大会上，阎建章曾多少次激动地说：“共产党是从穷人堆里发展起来的，但共产党不姓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我们不能带领群众富起来，那还算什么共产党员，还要共产党干什么！”

这发自一个老共产党员内心的声音，像春雨滋润着人们的心田。它给穷困的辛兴人民带来了信心和力量。

“改革开放是个大舞台，就看咱能不能唱大戏。”

乡亲们的心心话，辛兴艰难的日子，使阎建章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他以十倍的辛苦工作着。除草灭荒，挖沟排水，他抢在前头。耕地、播种、田间管理，样样农活他都过细地安排。5000亩棉田是全村的“银行”，群众打油买盐全指望它，棉籽一下地，他每天都要去看一次，扒开浮土，仔细地察看棉籽是否发了芽。浇麦季节，他日夜巡视在田间地头，用步子丈量着每一块麦地。谁家浇了多少，谁家还有多少没有浇，他心里都一清二楚。

村头小河里来了大水，小桥被冲垮了。他第一个跳进冰冷刺骨的水里，带着大伙抢修。村子里打井，他在井口搭起窝棚，和大家一起吃住，一起下井。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可是群众生活依然困难。

他思索着：全村6000多口人，在人均只有一亩多一点的土地上绣花，绣得再好也只能混个温饱。如果不放开手脚发展工副业，把农民中蕴藏的生产潜力发挥出来，讲富民，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

他去到北京，向几个老战友倾吐了自己富民的愿望。人们告诉他，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想法，也是当时具有远见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深沉思考。



在一个亲戚的帮助下，他从北京合成纤维厂买回了5公斤氯纶，用弹棉花的旧弓弦弹好，交给村里的几个纺线能手试纺，居然纺出了很好的氯纶毛线。

阎建章喜出望外。他像捧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一样，把毛线捧给大家看。他和几名支委变卖家私，求亲靠友，集资1200元，很快带领全村搞起了纺毛线的副业。一年半时间，他们竟用手摇纺车纺出了100吨氯纶毛线。

这件事给辛兴带来了希望。但没过多久，又出现了新的困难——他们的毛线积压了。看着一捆捆凝结着大伙儿心血的毛线卖不出去，阎建章心急火燎。他坐上村里的卡车，走山东，下江苏，跑安徽，闯山西，行程几千公里，调查市场需求，寻找毛线销路。路上，他一连发了几天高烧，医生见他这么大年纪了，非让他住院不可。可他打了一针，吃了点药，就又出发了。

这次大江南北千里行，是阎建章第一次涉足于商品生产的海洋。透过这五光十色的商品大世界，他发现了商品生产和交换中的无穷奥秘，明白了自己生产的毛线一时找不到市场并不等于没有市场。回村后他亲自挑选了一批骨干，组织起一支上千人的推销队伍，背着五颜六色的毛线，走乡串户去了。

辛勤的耕耘终于结出了果实：毛线的销路逐步打开了，许多农户开始有了积蓄。村里欠银行的贷款也陆续在偿还

了。当女社员杨立格从大队会计手中接过上千元的加工费时，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她小声对别人说，自打记事的时候起，她手里还没有攥过这么多的钱。

可是，正在这时，从四面八方飞来不少的指责。一个和阎建章有着莫逆之交的老同志关切地提醒他：“快收摊子吧。这样干下去会走偏方向，对你不好。爆了豆大家吃，炸了锅可要你一个人赔上。”

阎建章笑着说：“我不怕。咱们这样做是为了把辛兴几十年的穷根挖出来。群众欢迎的事，我相信党和政府会支持。”

他硬是撑着劲儿，挺过了三中全会前那段非常困难的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阎建章感到像彻底解放了那样痛快。他逢人便说：“改革开放是个大舞台，就看咱能不能唱大戏。”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在村里开办纺织厂，用机器代替手工。他跑了四个省，东拼西凑，买回了几台旧机器。但要把这些旧机器组装起来，没有工程技术人员不行。他又西跑保定，东奔天津，到处打听一些棉纺厂工程技术人员姓名、住址，一次次登门恳请人家能利用星期天或节假日去为他们安装机器。有时候，为了请上一个人，他一连几天冒着严寒，甚至顶着大雪，蹲在人家宿舍的胡同口上，默默地等待着。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一些技术



人员被这位老支书为群众致富的苦心感动了，表示不要报酬也去帮忙。

机器安装过程中，工程师们来来往往，阎建章都亲自陪在现场忙上忙下。半年多时间，他累得人瘦了、嘴唇裂了口子，有时嗓子肿得说话都很困难，但他一次也没有离开过现场。小儿子病得几天吃不下饭，老伴田素花叫他三次，他都不回家。到他家里串门的人问阎建章哪里去了，老伴气得说：“他不要这个家了，跟机器结婚啦。”

话虽这么说，但田素花对老伴的心地秉性还是理解的。当年，她同阎建章结婚那天，花轿刚抬到门口，就碰上黑压压的一大片敌人前来扫荡。阎建章连新娘的模样都没有看清，就把手一挥，叫她跟着乡亲们转移，自己带着游击队打仗去了。从那以后，她跟着阎建章风里来雨里去，几十年共同生活，她深知老阎为了大伙的利益，干起事来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纺织厂开工的那天，村里一帮老太太来看稀罕，阎建章笑着对她们说：“别看这堆铁疙瘩，纺起线来，能顶你们几百个老太婆！”

1988年，工厂办多了，生产发展很快，阎建章又开始了建立大型毛线市场的壮举。他深知，发展商品生产没有发达的市场不行。他要把全国各地生产、经营毛线的大客户、小商贩，都吸引到辛兴来，在家门口进行交易。他要主动

把自己的企业推向商品经济的海洋，参与竞争，接受检验。为此，他在村边划出了70亩地，从县里村里集资80万元，在上级的支持下，创建了冀中平原上第一个设备齐全、具有相当规模的毛线大集。经过几年艰苦的经营，现在这个集市已成为全国中低档毛线的集散地，不仅为辛兴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从四面八方带来了各种信息，打开了千百条与全国各地经济相沟通的渠道。辛兴人眼界开阔了，经营水平提高了，集市的繁荣促进了全村百业兴旺，辛兴愈来愈红火了。

阎建章是一个农民，文化仅是“扫盲班”水平。他自己常说：“耨地，我行；办企业，不会。”可是，商品生产这所大学校，给了他许多前所未有的知识和经验。改革开放十多年来，他那现代经营思想和商品竞争意识，他那尊重人才、善用人才的领导艺术，他对科学技术的信赖和追求，他那争分夺秒的时间观念，已使他判若两人：他是老支书，也是“头裹着白毛巾的企业家”。

这张企业家的“证书”是阎建章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跑出来的，干出来的，闯出来的。

为了发展辛兴的事业，他的老伴说，他一年要穿坏四五双鞋，双双鞋的帮底都磨出了大窟窿。

儿子们说，他骑坏了四辆自行车，有红旗、飞鸽，燕牌，还有外国出产的“富士”。



阎建章陪同穆青参观村办工厂。

支委们说，村里没有汽车时，他坐着“铁牛”跑；有了汽车，又跑坏了好几辆。

他不仅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同几百家公司、企业、经贸和科研单位建立了联系，还东渡日本，学习人家的管理经验，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如今的辛兴村，旧机器大部分已更新换代，产品的花色品种已增加到上百种，同北京合资生产的纯毛毛线，已成为全国市场的抢手货。全村拥有熟练工人 5000 多人，一大批技术和管理人员也已成长起来。他把一个封闭落后的穷村庄，跑成了一个工商发达、惠及四方的“小城市”。

富民——阎建章半个世纪的执著追求，终于在改革开

放的今天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共产的目的就是共富，共产党员要永远姓共。”

辛兴村富了。1400户人家，住小楼的130户，住新式平房的1000多户。可阎建章仍然住着土改时分的土房。房间低矮昏暗，室内一铺土炕，待客、吃饭都在炕上。家里摆的依然是老伴当年陪嫁的老式板柜和土改时分的方桌、条凳。一部电话和一台电视机，是仅有的现代用具。

辛兴人都很有钱，万元户已很平常，几十万元户也不稀罕。就连老太太在毛线市场上帮别人捋捋线，一天也能挣上几十块。可阎建章的工资，每月仅有100元。

村里男男女女不少人穿戴着“新潮”服饰。但阎建章，仍然是冀中农民传统的打扮：一条白毛巾裹头，一身老式布衣裤。许多人家吃饭都讲究个新花样，可阎建章还是老习惯：烩饼、疙瘩汤。老战友来了，往炕上一坐，叫老伴煮上小米绿豆粥，弄上饽饽炸小鱼，喝上两盅好酒，掏掏知心话，这就是他的乐趣。

“群众富了，你还是这个老样子，大伙儿看不下去呀！”上面来人这样说，辛兴人更是这样念叨。党支部、村委会每次劝他搬出那间土房，都被他坚决拒绝。四个儿子也多次商量为他盖新房，还设计了新房的式样，但每次都挨他



一顿骂。

近些年，人们发现老支书脸上的皱纹多了、深了，头发稀了、白了。大伙儿心里都感到不安，总觉得欠了他一笔账。

可是，阎建章从不这样看。每当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他总是说：“究竟谁欠谁的账，我看这个大问题可不能含糊。”

阎建章 16 岁担任党支书，在冀中抗战最艰难的时刻，他带领游击队打鬼子，捉汉奸，在炮楼下与敌人周旋。有一回，敌人突然包围了辛兴村，把全村人集中起来，逼着交出阎建章。当时，阎建章就在人群里，可辛兴人都说：阎建章早跑了！敌人施尽各种办法，折腾了一整天，也没有把他抓到。

“文革”期间，阎建章被打成“走资派”。全家人受到牵累。造反派连续一年多不给他家分口粮分柴草，老伴气不过，到大队说理：“阎建章‘走资’，我和孩子不‘走资’，为啥没有俺们的粮？”结果，不但没要到一粒粮，还被打成了脑震荡。1972 年年关将近，缺吃的少烧的，一家人愁眉不展。一天夜里，忽听屋外有声响，出去一看，院里竟飞进了大包小包的猪肉和白面……像这样的事，发生过好多次。有时，早上一开门，门口堆满了柴草。至今，阎建章也不知这些都是谁送的。

想起这些往事，阎建章总是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

他常常这样对人说：“从抗战到现在，老百姓豁出命来保护咱，图个啥？不就是看咱是个姓共的，指望咱带着大伙过上好日子？共产党几十年前赴后继又是为的啥？还不是想让大伙都富起来？依我看，共产的目的就是共富，共产党员要永远姓共。我宁愿一辈子吃苦受累，也要使辛兴人过上好日子。”

阎建章这些朴素的语言和执著的信念，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更喊出了一个老党员对党、对人民的全部忠诚。

阎建章在精神上是一个富有者。他曾荣获“全国劳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农民企业家”等光荣称号。但在成绩面前，他却不是裹足不前的人。他说：“不能当



阎建章与穆青在一起。



上万元户、几十万元户就心满意足了，还要看到周围还有很多没有富起来的群众。”近几年，他曾出巨资帮助贫困地区建立工厂；也曾亲自出马，带着本村优秀的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到外地传播致富经验。辛兴的工厂，每年能容纳 5000 多名就业者，他总是优先接收省内外贫困地区的年轻人，因此每年给这些地区带来上千万元的劳务收入。

他说：“说心里话，俺已是 60 好几的人了，有时真想过几天清闲日子，可是，撂下群众交给咱的担子，心里不踏实啊！”

这就是阎建章向党和人民捧出的一颗赤子之心。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颗心是党和人民给的，敌人的刺刀刺不去，‘四人帮’的棍棒打不碎，金子银子买不走。”正是因为这，阎建章在群众中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从来不减，大伙服他、敬他、知他、爱他。

在辛兴，谁也不怀疑共产党的先进性，谁也不怀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为他们看到了：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领导他们翻身求解放、奔富路的，都是他们的老支书，都是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

1991 年 6 月 16 日

（本文与孟宪俊同志合写）



郑永和

郑永和一副山里农民的形象。如果不经介绍，谁也不会认为他就是辉县县委第一书记。

“文革”中，全国大乱，辉县大干。他顶着逆风恶浪，带领全县人民开山筑路、修渠造田，为辉县的经济起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在当时阴云翻滚的政治气候下，简直是透出云层的一束阳光。

离休后，他带领一群离退休干部深入山区帮助群众嫁接果树、防治病虫，一心牵挂着能解决山区几万人吃水、用水的北干渠工程。他说：“我都70出头了干不了多少年了，修不成北干渠，我死有遗憾，死难瞑目啊。”

情系人民

近几年我每次到河南采访，都听到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两句话：“走遍河南山和水，至今怀念三书记。”这里群众所说的三位县委书记，是指兰考的焦裕禄、林县的杨贵和辉县的郑永和。

焦裕禄的事迹早已家喻户晓，杨贵同志虽然年轻人可能不太熟悉，但 60 年代他领导修建的红旗渠至今仍是林县人民艰苦创业的骄傲。只有郑永和同志在辉县的业绩，由于当时正值“文革”那段荒诞的岁月，不仅未能很好地宣传，反而被埋没了。

我与郑永和相识已将近 20 年了。70 年代中期，我曾四次到辉县采访，近几年我与他又两次在辉县相聚，在多年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钦佩他那股艰苦创业的干劲，更敬重他处处关心人民热爱人民的赤子之心。不管人世间经历多少风云变幻，在我的心目中，以他为代表的辉县一代共产党人带领群众创造的辉煌业绩，已经与那巍巍太行融为一体。我忘不了辉县的山山水水，忘不了那



些动人心魄的往事。

(一)

我最早听到郑永和的名字，是在国务院一次讨论生产的会议上。有人反映，社会上有个说法：“全国大乱，辉县大干”，说辉县县委书记郑永和为了发展生产、挖掉穷根，带领全体县委委员在一片乱石滚滚的河滩上安营扎寨，改土造田。这一消息在当时阴云翻滚的政治气候下，简直是透出云层的一束阳光。我不仅为之感动，更为之向往。不久，我便带着几个记者匆匆赶往辉县。

那时正值严冬，寒气逼人，在县委大院一间简陋的平房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郑永和。他大约50岁出头，中等个子，黑红脸膛，壮壮实实，一副山里农民的形象。如果不经介绍，谁也不会认为他就是县委第一书记。

我们围坐在火炉边烤着火，喝着热茶。郑永和介绍说，辉县是个穷山沟，三分平川七分山，特别是北部，大面积被山占了，好地被河滩占了，当地老百姓说是“光山秃岭干河滩”，耕地是“瓢一块碗一块”地“挂”在山腰上。解放20多年了，山区里还有群众缺吃少穿，有些地方吃水都困难。“不过，县里也有有利条件：造地有河滩，绿化有荒山，修水库有山沟，修渠道有石头，修电站有水有落

差。”他说：“过去没能改变面貌，只怨我们没干好。想想焦裕禄，看看林县的红旗渠，我心里感到惭愧呵！这几年，我们发动群众，让大家明白了‘苦熬没有盼头，苦干才有奔头’的道理，这就干起来了。”最后，他激动地说：“再干不出个模样，我这个书记还有什么脸面去见老百姓啊！”

短短几句话，使我们看到了这位县委书记的胸怀。

第二天，我们便同他一起去了洪州城。

位于辉县西北部的洪州城，传说是个古战场，是几条山洪汇流的地方，方圆几十里乱石滚滚，荒无人烟，就像一片小戈壁。据郑永和介绍，1972年冬天，他领着县委全体委员和各级干部200多人来到这里，在乱石滩中安营扎寨。他们住帐篷，睡地铺，每天起五更，搭黄昏，用铁镐、钢钎给荒滩“开膛破肚”。他们把大石头起出来垒堰，小石头深埋于地下，然后取土造田，开路筑渠，植树造林。苦干一冬春，就造出600亩良田。群众看到干部带头大干，深受鼓舞，一队队人马从四面八方开来。人多地少的城关、梁村等公社专门组成了造田远征大军，元旦、春节也不回家。一时，沉睡千年的荒滩上地窖成排，窝棚林立，宛如鼓角连天的古代军营。

我们登上一块高地，俯视洪州城的情景，只见广阔的石海中浮出了一排排石砌的房舍，一片片平整的田畴。郑永和指点着告诉我，那边的15000亩土地已经长出了小麦，



这边的防护林也已成活。在那正在修整的河滩上，更是一幅千军万马战天斗地的沸腾场面。寒风中，林立的红旗漫卷；深山里不时传来开山炸石的炮声。那雄浑壮观的劳动场景，着实令人激动。

这半天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今难忘。事实雄辩地说明，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人们硬是用自己的双手把一片乱石滩改变了面貌。正像郑永和说的，再过几年，这里将是一片新的农田，新的村庄。

在从工地返回县城的那天晚上，县里的一位同志悄悄对我披露了洪州大战的背景。他说：就在大战即将拉开序幕的时候，“上面”突然派来了工作组。他们撇开县委，分头下到各公社“突出政治”去了。一时间，什么“郑永和光说干干干，不抓纲和线，脱轨转向不称职”的小道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县。几天后，郑永和跟往常一样，背起锤钻下乡，有人把他拉到一边小声说：“风声不妙，你把工具收起来吧！”郑永和笑道：“毛主席说过，‘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谁敢反对这最基本的活动呀！”

他来到拍石头公社。公社书记孙钊像遇到了救星，拉着他焦急地问：“他们说我‘宁愿下地流身汗，不肯坐下把书看’，是典型的‘生产党’……这‘生产党’，我怎么检查呵？”郑永和告诉他：“你就这样说：我学得不够，

干得更不够；今后要认真学，更要下大力气干！”

回到县城，郑永和与工作组发生了正面冲突。工作组给他扣上一大堆帽子，逼迫他检讨“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郑永和回答说：“真革命，假革命，要到生产实践中做鉴定！”不久，他就组织起 200 多名干部，顶着逆风恶浪开到了洪州城。

这是一段荒诞的历史插曲。但人们从中看出了当时郑永和的胆略和气质。

那些天，从断断续续的交谈中，我了解到郑永和的一些经历：他是当地人，出身贫苦，母亲饿死在家里，父亲死在外边被狼吃狗拖，兄弟几个都流离失所没了踪影。1944



郑永和与穆青在河南辉县家中。



年，他参加了革命队伍，就在辉县一带的太行山上打游击。

有一次，我们坐在山坡上小憩，他对我说，老百姓曾这样批评我们干部：“过去在一起逃荒要饭，受压迫受剥削，一起打日本打老蒋，提着脑袋闹革命。现在胜利了，你们坐上小汽车了，我们山区还是肩挑人抬，连个小推车都进不了山。难道毛主席、共产党就光解放你们吗？”他说，他听了这话非常痛心，有生之年，决不会忘记！

我们渐渐地熟悉起来，彼此了解更多了。尽管郑永和谈起辉县人大干时，只谈群众从不谈自己，但他的许多生动感人的故事却在干部、群众中广泛流传着。

那是兴修陈家院水库的时候。大坝急需石料，工地的6000多名民工中只有300多人会石匠活，几十万方石料靠这些石匠锻，要锻到哪年哪月？工地指挥部心急火燎，一天三遍给县委打电话，要求增派石匠。

郑永和背着锤钻来到工地，把干部和施工人员一齐叫到山坡上。他对大家说：“有太行山，就有石匠。群众可以当石匠，干部为啥就不能？”他号召干部都拿起锤钻，跟石匠师傅学手艺，限期掌握基本的锻石技术。

20多天后，还是在那个山坡上，一场别开生面的考石匠的比赛开始了。20几名县和公社一级的干部背着锤钻来到了考场。郑永和宣布：“今天考试破石头，20分钟一个眼，看谁锻得好，锻得快！”赶来观赛的群众把考场围了

个里三层外三层。那时正是三伏天，树枝纹丝不动，岩石热得火烫。一声令下，干部们围着两间房大的岩石叮叮当当干起来，顿时火星飞迸，石屑横飞。经石匠师傅组成的“监考组”评议，20 几位干部，只有两个不合格，县委书记郑永和考了个第三名。

消息传到各工地，群众学石匠的浪潮涌遍全县，全县的石匠很快从 3000 人激增到 40000 人。许多群众举起铁锤自豪地说：“俺是在陈家院水库工地学的手艺，跟郑书记是师兄师弟。”妇女们也组织起“石姑娘队”，喊着“男女都一样，姑娘当石匠”的口号来到工地参战。从此，郑永和又被群众亲昵地称为“石匠书记”。

另一件事发生在一个春节的前夕。那天晚上，大雪纷飞，北风呼啸。郑永和刚躺上床，就想起明天是大年三十，原定明天一早要给深山里的黄道水群众送煤，这大雪一封山，群众没有煤怎么过年呢？！他连忙披衣起床，叫醒县委常委王合保、李灿等同志，又召集起一批干部，连夜拉起板车冒雪送煤去了。

山高路陡，雪大风紧，黑夜沉沉，人们外衣结成了冰甲，内衣却被汗水浸透。40 多里的山路，他们走了七八个小时。第二天清晨，当他们到达黄道水大队时，整个山村沸腾了。群众纷纷拥到村头，迎接为他们雪中送炭的亲人。许多人从满身冰甲的雪人中认出了郑永和，感动得哭了起来。他



们说：“当年的老八路回来了！”

这真是一幅感人肺腑的、名副其实的雪中送炭图。每次想起这件事，我都为像郑永和这样关心群众的县委书记感到骄傲！

(二)

半年之后，我第二次到辉县采访。

两名上次同来采访留在这里蹲点的记者听说我来了，赶来与我会合。这一段时间，他俩积累了不少采访素材，也学会了打钢钎、锻石头的本领，脸晒黑了，手上结出了厚厚的老茧。

他俩告诉我：郑永和经常身穿补丁衣、脚蹬打掌鞋，深入山村为群众办实事。他下乡时总是带着劳动工具，沿途为群众挑担、拉车、嫁接果树，走到哪里干到哪里。每一个村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每一项工程都倾注着他的心血。辉县的男女老少，几乎无人不认识郑书记，一些群众说，郑永和就是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有一年种麦季节，郑永和在固村蹲点。县里规定麦地必须深翻一尺以上，每个干部要翻一亩半地。正在这时，地委通知郑永和去开了两天会。会刚开完，他就连夜赶回固村，一清早扛着三把抓钩下地了。一把抓钩他自己用；

另外两把放在地头，有干部来找他商谈工作，拿起抓钩跟他边刨边谈。与他一起蹲点的青年干部说：“你那点活，我们捎带着就完成了，你何必那么认真呢？”郑永和说：“领导不能欠账。领导欠一笔账，就得允许群众欠十笔账。”为了追回耽误的时间，晚上，他提着马灯去翻地。一个星期下来，郑永和超额完成了任务。

这次采访，我提出系统地看一看山区的交通。此后的几天，郑永和便带着我驱车穿行在崇山峻岭之中。蜿蜒的公路在群山之间伸展，深沟峡谷间飞架起长虹般的石桥，汽车载着水泥、砂石、粮食、山货，奔跑在山腰；骡马大车、平板车、小推车逶迤迤迤，宛如舞动的长龙。让我特别振奋的是，辉县人民在基本没有机械和设备的条件下，就是凭着钢钎打、炸药崩，凿通了十几条公路隧道，总长达9300多米。郑永和告诉我，县里有个“愚公移山专业队”，只有200多人，当时全国最长的公路隧道——800米的愚公洞，1200米的友谊洞，1400米的向阳洞，1800米的胜利洞，都是以这支队伍为骨干打通的。打向阳洞时，原想总得三四年的时间，结果只用一年零十个月就奇迹般地打通了。

公路修起来了，隧道打通了，急需培养一批年轻的汽车司机。郑永和培训司机的故事，也是非常感人的：1974年秋天，国家拨来18辆解放牌汽车，县里选出80多名青



年组成了“第二汽车队”，郑永和兼任车队的队长。他先把这些汽车全部封存，然后带领司机训练班的学员翻山越岭，拉起平车给水库工地运材料，担起箩筐给山区群众送煤。许多人心里纳闷：放着汽车不开，用这种“落后工具”来培训司机，简直是“出洋相”。郑永和说：“这是要求他们日后进城不要忘了农村，当了工人不要忘记农民，开了汽车不要忘了拉平车、担箩筐的艰难。”经过85天的培训，这批学员学会了驾驶、修理技术，而更重要的是，牢牢掌握了为人民服务这个正确的方向盘。他们提出：生活不搞特殊，开车不要补助，新人、新车、新思想，开车要开出新风尚。他们在辉县的建设中，干得非常出色，正像一位司机所说：“郑书记一心牵挂着群众，也培养我们心里想着农民。”

一天，途经石门水库，我们下车休息。站在90米高的水库大坝上，郑永和遥指巍巍耸立的石门峰说：在战争年代，我们一个班12名战士被敌人围困在峰顶上，他们打尽了最后一颗子弹，集体跳崖，全部壮烈牺牲。他说：“解放这块土地，需要流血牺牲；建设这块土地，同样需要这种英勇不屈、无私奉献的精神。”接着，郑永和充满激情地给我讲述了一家普通农民的动人事迹。

在石门水库施工过程中，发生了一场塌方事故，民工白永义不幸牺牲。他的老伴流着泪对前来慰问的郑永和说：“俺难过的是，永义的任务没有完成，俺家不能欠着。”

她把大儿子白福才送到了工地。白福才继承父志，接连三次被评为模范。后来工地推荐福才去小煤窑当工人，这位老大娘又把二儿子送到工地，拿起父兄的工具接着干。不久，工地接到白福才寄来的一笔汇款，他在信中说，自己不能直接参加水库建设了，愿将节余的工资寄给工地，尽一点心意。

“比一比群众的贡献，我们干部做的那点工作算个啥呀。”说到这里，郑永和沉默了，目光久久凝视着巍峨的大坝，凝视着那一层又一层洒满群众汗水的数不清的石块。

谈起辉县群众的功绩，郑永和有说不完的话语。他还对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傍晚，我们一起察看了郊东沟的大片造地之后，攀着山间小径来到拍石头公社党委办公地。这是一座用石块垒起围墙的破旧小院，有十来间矮墙小窗的旧式民房。小院门旁有一间小屋，地势较低，屋顶平平的。公社书记孙钊在屋顶铺上草席，端来大碗茶，我们三人席地而坐，畅谈了很久，从当时的苦干谈到拍石头和辉县的未来。

晚风驱散了炎热，蝈蝈在低吟轻唱。郑永和说，太行深处有个营寺沟，历来被认为是“鸡蛋壳里发面——没啥发头”的穷地方。这里有位三代扛长工出身的老汉元家清，从土改分得一面山坡起，就不声不响地刨土造田。20多年过去了，他硬是把一沟石头变成了一沟庄稼。他都近80岁



了，身子骨种不得地了，还常常告诉队里人：“东山有咱队二分地，看节气种上”，“西坡插上红薯了，操点心管管”。队里的家业不断增加，却从未见他找会计记过工。老汉临终前还挣扎着让儿孙们扶他到地边，捧起一把土，留下遗言：“东山的树，我没栽完，后山还能修块好地，你们要接着干啊……”

郑永和说：“我永远也忘不掉这个可敬的老人……老汉造的地，后来成了县里的样板，我们在洪州城和郊东沟大规模地造地，就是照他的办法干的。他的精神一直鞭策着我们。”

不知什么时候起，风停了。树叶纹丝不动，山岩肃立在静穆之中，连蝓蝓也不再吟唱，似乎都在倾听一个共产党员的心曲。

其实，元家清老汉的那股韧劲，就生动地体现在郑永和身上。辉县的干部告诉我，全县第一支绿化荒山突击队就是由郑书记带上山的。由于有1958年造林失败的教训，有人认为荒山难变绿，石头山上难长树。郑永和不信这个邪，偏偏选择石硬、水少、土薄的方山来试点。数九寒冬，他带着30多个共青团书记，背着行李，带着工具，攀过艰险的鸡冠峰，登上了方山顶。他拿起镢头刨坑，垒起石头棚上草，教青年们盖窝棚。山上缺水，吃水用水都要到山下挑，饭后他就拔起一把白草把饭碗抹干净，说：“这样洗碗就

节省下水了。”白天，他和青年们一道把石山炸出一个个深坑，筑起一条条长坎，担进黄土，栽下幼树。夜晚，点起篝火，青年们围坐在他的周围，听他讲当年游击队的战斗故事。他们一连好多个日夜吃住在山上，郑永和的眼熬红了，脸冻肿了，青年们心疼地说：“郑书记，你脸肿了。”他摸摸脸笑着说：“不，是吃胖了。”

春风再起时，光秃灰黄的方山顶上泛起一片新绿。人们从这里看到了希望。第二年冬天，郑永和在方山顶上搭起的那种窝棚，在大大小小的山梁上成群出现，一年全县就造林数万亩。几年下来，一些光山秃岭都陆续披上了绿装。

在此后直到“文革”结束前的一段时间里，我又两次踏访辉县。这四次采访，辉县人民在郑永和领导下改天换地的壮举，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经过8年的艰苦奋斗，这里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山坡上，支离破碎的小片耕地变成了层层梯田；河滩里，几十里长的乱石沟中长出了绿油油的庄稼。大小山沟中，星罗棋布着水库、大型蓄水池，加上电灌站、截流坝、暗渠、渡槽，组成了巨大的山区灌溉网，全县粮食产量由2亿斤逐年增加到6.8亿斤。与此同时，全县大部分地区实现了水通、路通、电通。化肥厂、水泥厂、炸药厂、发电厂、轴承厂、机械厂、动力修配厂等骨干企业也兴办起来了。这一切，为辉县经济的起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

从80年代开始，其间有七八年时间，我没有见过郑永和。工作繁忙，人各一方，尽管总念着他，却始终未能相聚。后来，听说他离休后，在辉县组织一批离退休老同志，成立了一个“老头林果病虫害防治队”，无偿帮助群众治虫。这越发引起了我对他的思念。

1991年10月间，我又一次去了辉县。今日的县城已与昔日判然两样：宽敞的街道，高大的楼房，使我几乎找不到过去的印象了。

郑永和听说我专程前来看望他，急忙从深山区赶回来。在百泉宾馆，我俩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一时间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好多年不见，我发现郑永和并不显老，快70岁的人了，头上竟不见白发，那种精神劲，还和当年一样。半晌，他打破了沉默：“多少年不见了，我们想你啊！”我说：“我也忘不了你，忘不了辉县。”

当天下午，我们一道沿着郊东沟向深山走去。就是这条沟，我曾多次来过，那时候乱石滚滚，一片荒凉；如今层层梯田长满了庄稼，从沟底一直向深山里伸延。汽车驰过一段山道之后，再也爬不上去了，大家徒步向山上攀去。

位于山顶上的山道绝村，只有几户人家。由于这一带黄楝树较多，被郑永和选作治黄楝蜂的试点基地。他每次来，

都在老百姓家吃住，一住就是一二十天。

我们走进郑永和借住于老乡家的那间小屋。屋内光线很暗，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张挂着蚊帐的单人板床。与过去不同的是，桌上没有文件，只零散地摆放着一些防治果树病虫害的科普书刊。他的劳动工具也由镐、锤、钎、钻换成了喷雾器、短梯、剪刀和放大镜了。

郑永和领我们到山上去看黄楝树。他指着树枝上的楝子对我说：“治好了的，没有虫的楝子是绿色；没治好的，有虫的是红色。”他还说：“从1952年到1969年，这一带的黄楝树一直不结籽，生了一种黄楝蜂，很顽固。它们每年春天繁仔繁到楝子壳里，随着楝子一起生长，正好到



郑永和向穆青介绍治黄楝蜂的情况。



楝子熟的季节，它也把楝子全都吃光了。你来采访的那两年，我们曾治过黄楝蜂，没想到近些年，它又猖狂起来了。”听他说得头头是道，我打趣地说：“没想到这些年没见面，你这个治山治水专家又变成治虫专家了。”

郑永和笑了，大家都笑了。

谈到“老头队”的情况，郑永和对我说：“人老了，干不成多少大事啦，但我们都是老党员，有生之年总还想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他说，“老头队”于1989年初春成立，开始时只有几个人，请了几位大学教授、治虫专家和林业技术员来当老师，向他们学习治虫知识与治虫技术。掌握技术后，他们便从防治柿蒂虫起步，继而又对山楂、黄楝、核桃等果树进行病虫害防治。治虫三年，“老头队”不断壮大，试点村已从8个增加到46个。

第二天，我们又去常村乡燕窝村看柿树。那里是郑永和防治柿蒂虫的试点基地，他还义务承包管理着一个小柿园。

汽车在山谷间奔驰。我轻轻地摇下车窗，让秋风吹动白发，尽情地浏览着山区的风景。温煦的阳光抚慰着峻峭的崖壁，峰峦间云蒸雾涌，翻滚着金色的光柱。一树树灿黄的柿子、深红的山楂，衬着青蓝色的群峦叠嶂，缓缓地从车旁移过。秋风中送来阵阵谷香，十月的太行，到处充满着迷人的魅力。

我转过身对郑永和说：“这么多年没来，没想到，这

里的山水变得这么迷人。”他笑着说：“这里的景色原来就很美，那些年，你怎么就没注意到呢？”我说：“那时，光注意这里的人美、工程美了，哪有心思观赏风景啊！”

到了燕窝村，我们走进郑永和管理的小柿园。柿园里只有12棵柿树，每棵枝头上，都挂满了黄澄澄的柿子，有的枝条已被压弯得快接近地面了。看到这喜人的情景，大家都很兴奋。我在树下左转右转拍了不少的照片；后来又拿起一个喷雾器要老郑教我如何给柿树喷药。那一看就是外行的架势，把很多人都逗笑了。

我们坐在柿树下休息，村里的乡亲们围拢过来。一个老乡说：“前些年，这小柿园只能摘200公斤柿子，老郑来的第一年，就摘下350公斤。今年看这模样，少说也能摘下1000公斤。”又一个老乡对我说：“郑书记来俺村，就住在俺家。村里为照顾他的生活，说要给俺家补贴。可郑书记不同意，他从自己家里给俺带来了两袋面粉一袋大米。”

谈到治虫的效果，辉县随行的同志说：“1988年，辉县柿子产量才99万公斤；1989年上升到220万公斤；1990年，达到360万公斤；今年，怎么也能收450万公斤。这里面，就有‘老头队’很大的功劳！”

郑永和说：“我们‘老头队’最近制定了‘星火计划’，争取用三年时间让治虫活动在全县林果区普及，我们的长期目标是，山楂无虫，楝子不红，核桃不黑，柿子不落。”



离开燕窝村时，老郑让人找出一套治虫工具交给我。他说：“送你一套工具，等你离休后，侍弄侍弄花树吧。”我接过了工具，笑着说：“我退下来也参加‘老头治虫队’，你们要不要？”老郑说：“那当然欢迎。”

回到县城的那天晚上，郑永和把方圆几十里内我熟悉的老同志都找来了。我们一起围坐在宾馆大会议室里，说不完当年的人和事，掏不尽心窝窝里的知心话。我发现当年一些县乡级的干部，大都已白发苍苍，其中许多人也都是“老头治虫队”的队员。过去我采访过的一些石姑娘如今都是中年妇女了，她们当中有些人已成为工厂和企业的骨干。

我对他们说：在辉县的建设中，你们都是出过大力的人。没有你们当年的苦干，就没有今天辉县的兴旺。你们的贡献展示在辉县的山山水水，深刻在人民的心中，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这次难忘的聚会，直到午夜12点，人们还不愿散去……

(四)

1993年11月，我又一次去河南采访。听说郑永和的老伴去世了，我担心他因悲伤而影响身体，在回京途中，特意绕道辉县去探望他。那天晚上，郑永和已在宾馆等我。

我进房刚刚放下行李，擦了一把脸，他就把我拉到一边，掏出一张图纸摊开在沙发上，急急忙忙地说起修建北干渠的事来。这件事，我上次来时，他就多次向我提起，说他离开辉县时有两件事没有完成，心里很不安。一是宝泉水库没有建成，二是北干渠始终未能上马；特别是北干渠，因为关系到山区几万人口的吃水、用水问题，至今未开工修建，简直成了他一块心病。他说：“这是北干渠的图纸。原来的方案修这条 90 华里长的渠，要打 14 个洞，花上千万元；现在的方案只需打 9 个洞，渠长缩短到只有 70 多华里，有个五六百万元，发动群众起来干，准能修成。”他还告诉我，七八月伏天，他带了几个老头和水利勘测人员沿着渠线来回走了 6 趟，重新勘测、丈量，搞出了这张新图。修成北干渠，可以解决山区近 4 万群众吃水和 4 万多亩耕地灌溉问题，还可成为 8 万亩荒山发展林果业的水源。说着，他又指点着图上的一些标记，详细地解释起来。我屏声静气地听着，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采访他时的情景，完全忘记了此行是来安慰他的。

夜深人静，他跟我说起妻子去世前的一些事情。他说：“去年 4 月里，我去张村乡平岭村的尖山洼治虫。那里原有 52 户人家，因为北干渠没修，他们长期没有水吃，已经搬走了 30 户，只剩下 22 户了。我到了农民王明富家，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围来了。他们说，有门路、有本事的都搬



2002年4月，穆青与郑永和在北干渠的通水仪式上，热烈握手相庆。

想我能在家陪陪她、照顾照顾她啊。可是，当我把尖山洼群众盼水的情况告诉她后，她却对我说：‘听说愚公移山专业队在方山打洞生活很苦，你最好想办法弄些食品，‘五一’去慰问慰问，给大家鼓鼓劲，也好加快点进度。’听了她的话，我随即找了一些有关单位，筹集了一些肉、油、大米等，并同他们一道于4月30日下午送到了工地。这之后，我满脑子装的都是‘七一’通水，而妻子的病却越来越重。6月9日，她在医院动了手术，17日就去世了……”

走了，连原来的队长也走了，只剩下他们这些穷庄户人没人管。他们围着我哭，我也掉眼泪。”

“那时，作为北干渠序幕工程的‘方山引水工程’已经开工，我是这个工程的顾问，完成这个工程，就可以解决尖山洼一带7000多人的吃水、用水问题。回到家，妻子已经生病，她多

停了一会儿，郑永和又说：“一想到老伴，我就想到《十五的月亮》这首歌，想到‘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这句歌词……她生前也和我一样，关心群众的吃水，关心北干渠。修不成北干渠，我对不起乡亲们，也对不起去世的老伴。”窗外，风声萧飒，我低头听着郑永和的絮语，不敢抬头注视他的眼睛，我怕我俩的泪水会同时冲破感情的闸门，越发使他难过。

第二天清晨，空中飘着雪花，我同郑永和在北干渠的湖边散步。我劝他说：“你要是心情不好，就上北京我那里住些日子，看看北京的变化，散散心也好嘛。”他说：“不用啦。最难过伤心的时辰已经熬过来了。现在慢慢适应了。再说，县里的同志都对我关心备至，用不着担心。”雪花越飘越大，湖面上又刮起了小风，我俩沿着小径缓缓地走着，走着。半晌，郑永和又对我说：“其实，我现在的身体还是很好的，老伴的去世，虽然对我打击太大，但更使我揪心的还是北干渠至今仍没有修起来，县里还有几万人吃不上水。我都70出头了，干不了多少年了，修不成北干渠，我死有遗憾，死难瞑目啊。”

听了这些话，我激动地握紧他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但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真正出自肺腑的心声。岁月的更替，可以改变他的年龄，可以改变他的职务，却永远改变不了他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分手之前，郑永和要我写几个字留作纪念。我毫不犹豫地挥笔写下了八个大字：“心怀河山，情系人民”。我看到他的眼睛又一次湿润了……

1994年5月30日



1996



新华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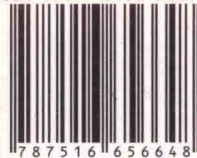


新华出版社
天猫旗舰店



新华出版社
京东旗舰店

ISBN 978-7-5166-5664-8 564-5664



9 787516 656648 >

定价：58.00 元